



甘肃社会主义学院
Gansu institute of socialism

甘肃统战理论研究

GAN SU TONG ZHAN
LI LUN YAN JIU

2020 年
第 4 期
总第58期

准印证号（甘）LK000092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编辑手记

本期推出的文章中,有几个主题颇具时代意义。

其一、“学习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主题。2020年12月7日,我院党组书记焦玉兰同志在甘肃社院举办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读书班开班式”上分享了自己对全会精神的一些认识和体会,认为社会主义学院学习贯彻五中全会精神,一是要从两个视角——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视角和五年规划的视角加以理解;二是要在“两个大局”的统筹谋划中进一步把准前进方向;三是在服务“大统战”工作格局中进一步贡献智慧力量。

其二、党外人士助力意识形态工作大有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全党特别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略任务”,而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一个从多方面推进的复杂过程。即需要理论武装工作,还需要建设有效支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更需要一支活跃于意识形态工作领域的中坚力量。长期以来,各级党委(党组)成为贯彻和推进意识形态责任和工作的主体力量。事实上,党外人士作为党的统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的政治意义使他们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常常发挥着功不可没的正向作用。针对这一问题,中共荆门市党校刘良军教授指出,党外人士助力意识形态工作大有可为、大有作为,应该赋予党外人士推进意识形态工作的责任,为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积极作用搭建平台提供渠道。

其三、强化新兴商会的统战作用。商会作为我国市场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国民经济有序健康发展、促进社会治理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院王雄刚老师立足于商会组织的治理作用,指出了当前一些通过“自筹自建”模式运作的地域性商会、行业商会一定程度上缺乏“桥梁和纽带”的“联系”意识,未能彰显其统战性作用,与统战工作的实际需求存在一定差距。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这类商会应该在承接原有经济性、社会性(民间性)等基本特性的基础上,特别强化其统战性历史使命,对于商会组织精准定位其自身、明确其在新时代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以及对统战部门“精准引导”非公经济领域的“两个健康”良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其四、注重挖掘新乡贤的现代治理价值。善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推进国家治理是中华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期的中华文化研究栏目,安徽临泉县委党校彭建涛老师关于乡村如何发挥新乡贤治理作用的文章,是对皇权不下乡的传统社会乡贤治理作用的现代透视。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我们必须重视新乡贤文化的建设,发掘新乡贤的时代价值,探索新乡贤文化的意义和培育措施,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焕发新生机。

其五、建国以来我国政府加强藏传佛教寺院管理、推进中国宗教化的相关经验。在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宗教理论的指导下,在推进藏传佛教寺院管理、推进我国宗教的中国化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与经验。基于大量的调研和思考,我院闫脑吾老师梳理了甘肃省政府推进藏传佛教寺院管理取得的成绩和相关经验规律,认为在甘肃藏传佛教寺院管理工作中,中央的宗教政策和法律法规提供了价值论基础,而甘肃省委省政府严格落实中央有关精神并探索适合地方的管理路径为甘肃藏传佛教寺院管理取得巨大成就奠定了方法论基础。未来的藏传佛教寺院管理,应该侧重于在构建完善党领导的组织载体以加强党对藏传佛教工作的领导、优化顶层设计、创新藏传佛教寺院管理体制、加强宗教管理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进一步加强,推进寺院管理再上新台阶,为宗教中国化发展奠定良好局面。

其六、注重民族地区的社会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民族地区的社会工作在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推进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为此,地方政府要对民族地区社会工作服务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重视,在社会政策方面给予其发展机会,有利于更好地推进民族地区社会治理。

张凤玲

甘肃统战理论研究

GANSUTONGZHANLILUNYANJIU

2020 年第 4 期(总第 58 期)

封面题字：何鲁鹿

甘肃统战理论研究

目 录

主办单位：

甘肃社会主义学院
甘肃省统战理论研究会
中国统战理论研究会民族
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

编委会成员

主 任：马廷礼

副主任：张世珍

尚勋武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万泽刚 马虎成

宁崇瑞 石岱千

朱万全 宋 健

李晓霞 张文学

张耀宇 赵金云

姬安岳 郭天康

焦玉兰 蒲晓贞

霍卫平

统战理论新思维

坚定党的领导 重视规划的制定和执行 实现中国之治等三则 (4)

学习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辅导报告 焦玉兰(6)

甘肃社会主义学院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 李富坤(10)

统战理论与实践

充分发挥党外人士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正向作用 刘良军(11)

新时代商会组织统战功能实现路径探讨 王雄刚 邹平慧(16)

“一带一路”视角下侨务工作的新形势与新思路 林少红(20)

民族宗教理论与实践

民族地区社会工作发展的困境及创新路径 任 敏(26)

改革开放以来甘肃藏传佛教寺院管理的成就与经验启示
..... 闫脑吾 曹永萍(32)

中华文化研究

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及其培育路径
——以安徽省阜阳市为例 彭建涛(38)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的必要性及路径研究 汪 倩(42)

崆峒山《老子八十一化》及壁画的文化意蕴 于贵平(47)

2020年第4期(总第58期)

2020年10月28日

推进“一带一路”倡议

-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日经贸合作 刘 巍(51)
- 构筑阿拉善国际经贸新通道 打造新的亚欧大陆桥 陈 岩(55)
- “一带一路”与西部发展新机遇 李晓艳(60)

资政建言

- 以“飞地经济”模式设立兰州—白银都市圈国家东西协作产业转移试验区的建议 民革甘肃省委(64)
- 关于制定我省“十四五”规划的几点建议 民盟甘肃省委(66)
- 关于我省“十四五”规划编制中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若干建议
..... 民建甘肃省委(69)

社会治理

- 视角与路径: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文献综述 ... 任文启 姚 平(71)
- 社会治理视域下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彭丽丽(76)

学员风采

- 民革班学习感言:走——河西走廊 任文海(80)

主 编:李晓霞

副 主 编:张凤玲

执行编辑:卢婉春

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
安宁西路818号

邮政编码:730070

电话:0931-7783804

0931-7634019

传真:0931-7783804

电子邮箱:

GSTZLLYJ@126.com

印 刷:

甘肃兴方正彩色数码
快印有限公司

坚定党的领导 重视规划的制定和执行 实现中国之治等三则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辛鸣指出:坚持党的领导,重视规划的制定和执行,是实现中国之治的重要法宝。我们党历来重视规划的制定和执行,党的领导是规划顺利实施的坚强保障。党的领导在规划的制定和执行上主要体现在:一是引领方向。大国发展一定要有方向,方向错误就会南辕北辙。中国为什么70多年能保持一以贯之的发展,并不断创造奇迹,就在于能始终坚持坚定正确的方向。十九届五中全会制定“十四五”规划,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就是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二是汇聚民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制定规划中充分彰显出领导国家、治理国家的政治智慧与领导绩效,使得规划制定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生动实践,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重要体现。三是遵循规律。制定规划一定要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来办事情。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十四五”规划提出一个重要战略判断和重要战略要求,就是要构建新发展格局,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这样一个科学判断,来自党中央高屋建瓴、高瞻远瞩的科学决策,来自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知和自觉遵循。四是推动执行。一个好的规划出来,一定要体现在实践中。党已经领导人民制定并成功执行了13个五年规划(计划),形成了一套推动计划、规划实施执行的有效方式:通过中央全会为制定规划提出建议、指明方向,再通过全国两会,正式审议通过国家规划,接着各部门各地区把具体规划实施方案拿出来,然后执行实施。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强大的领导力和执行

力,来推动规划实施,让宏伟蓝图变成现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是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的纲领性文件。中国的五年规划,其实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品格的集中体现、完美体现,通过制定、执行规划,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越来越好。党的领导,是实现规划的制定和执行的有机融合、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二者有机统一的重要法宝。——摘编自《中国纪检监察报》(2020-11-05)

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徐清泉指出,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深入分析大变局中的文化发展时代特点,谋划“十四五”文化发展建设。第一,坚持人民性与导向性的辩证统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新时代开展一切工作包括文化工作的基本原则。必须看到,滋养文化、创新文化、承载文化的原动力和支撑点来自人民。同时,在听取民意的过程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导向性尤为重要。第二,坚持公益性和市场性的辩证统一。文化的生产供给在消费上虽然比不上“衣食住行”的刚需,但毕竟事关人的精神引领和灵魂塑造,所以保障基本文化供给消费的公益性是应当不断强化的原则。与此同时,也不能对坚持市场性有所淡化甚至偏废。市场性是确保文化生产供给实现更有效、更广泛配置资源、资本要素的制胜手段之一,也是促进文化事业、产业实现扩大化再生产的依托所在。在此过程中,行政管理和规划调控应当与其实现正向组合,从而进一步激发文化发展建设的全要素生产率。市场性与公益性要在文化产业、文化事业的交集互补中确定共赢的、弹性的操作边界。第三,坚持娱乐性与教育性的辩证统一。休闲娱乐是人类寻

求身心愉悦的自然天性,教育教化是人类求得文化正义与文明延续的根由所在。不能放任“泛娱乐”成为脱缰的野马。展望“十四五”时期,谋划文化娱乐产业做大做强的时代旨归,还得坚守娱乐性与教育性相统一的原则,力求让娱乐不越界、不出格,力争让教育、教化细雨润无声。——摘编自《解放日报》(2020-10-20)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有关专家指出: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故事,把内含其中的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实践基础生动揭示出来,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信、可敬、可亲的光辉形象进一步丰满起来,既是对历史的最好纪念,也是对当下的最好激励,更是对未来的最好昭示。一要讲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厚底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厚底蕴,源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真理也需要在发展中获得持久生命力。从马克思主义到列宁主义,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真理发展的每一步都是守正基础上的大胆创新,既体现了理论渊源的一脉相承,又彰显了理论品格的与时俱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厚底蕴,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感染熏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承载历史、引领当下、昭示未来,就在于它深深植根于中国大地,得到了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丰富滋养,从而涵养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纵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因子始终蕴含其中。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赋予了《汉书·河间献王传》中“实事求是”新的内涵,并使之上升为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从《诗经》中“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获得启发,借用“小康”概念为人民群众描绘了富有温情的奋斗目标;习主席引用《庄子·秋水》中的“邯郸学步,失其故行”典故,向我们生动阐释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道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不断丰富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生长土壤,使得其既深接地气又底气十足。二要讲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欲究其理,必寻其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势是一种全方位、整体性优势,其中党的领导是最大优势。长期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形成并不断发展,之

所以能够赢得中国人民的广泛认同和充分尊重,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之“治”,从本质上说,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之制。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十分清醒、十分坚定。正是有了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才在命运转折关头走上了社会主义正道。正是有了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才在中国大地上不断开辟新境界。正是有了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得以在中国确立并不断完善。三要讲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伟力。实践彰显伟力,事实胜于雄辩。从1978年到2019年,我国经济总量由3678.7亿元攀升至990865亿元,人均GDP由385元增至70892元。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进程,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和发展,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并且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国和来源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着世界。四要讲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140年前,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系统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必须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夺取并保持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时代条件和具体国情,赋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以鲜明的中国特色,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放眼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发展态势正在悄然变化。中华大地上,源源不断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使社会主义持续焕发出强大生命力,为世界社会主义开创了新局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成为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引领。——摘编自《解放军报》(2020-11-09)

责任编辑:闫丽红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辅导报告

焦玉兰

2020年12月7日,甘肃社会主义学院举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读书班开班式”,主要任务是按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要求,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对全院上下学习全会精神进行再动员、再安排、再部署,目的是切实把全体教职工的思想统一到党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上来,真正做到思想同心、目标同向、行动同步,努力画出最大同心圆,聚强向心力,叠加正能量。

11月2日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林铎书记就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强调了4个方面的意见(即充分认识全会的重大意义,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推动全会精神深入人心;坚持以全会精神为指引,深入谋划我省“十四五”时期的发展;抓紧抓实今年各项工作,确保“十三五”圆满收官、“十四五”顺利开局)。省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通知》后,我院党组立即印发了《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工作方案》,从理论学习、教学科研、宣传教育等方面作出安排部署,明确责任领导、责任处室和完成时限等,切实增强了学习宣传贯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使全院教职工进一步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期间统战理论教研部王雄刚老师也为全院教职工作了全会精神专题辅导,使广大教职工在学习中加深了理解、增进了认识。

作为政治学院、“联合党校”,我们必须毫不放松地把学深学透全会精神摆在首位。如果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比作“指南针”的话,这次全会审议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厦的“施工图”。当前,我们甘肃正处在“滚石上山”和“爬坡过坎”关键时期,在这种背景下学深悟透并贯彻执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我们在思想上就拥有了“定海神针”,在实践上就拥有了“压仓石”。如此,我们则有了一种“乱云飞渡仍从容”“不畏浮云遮望眼”“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自在、自信、自强、自觉。“给人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就我们社院而言,要给党外代表人士讲好、讲深、讲透全会精神,首要的任务就是自身学懂弄通做实全会精神。对此,我们举办这样一个读书班,通过多种形式的学习交流,进一步加深对全会精神的理解认识,从而将全会精神融入到社院各项事业发展中去,对谱写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贡献智慧和力量具有重要意义。最近,我认真学习了五中全会《公报》,研读了中央《建议》,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所作的说明,深刻感受到,五中全会做出的顶层设计、擘画的宏伟蓝图,顺应时代和实践要求,反映人民意愿和期待,立足现实、鼓舞人心,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历史性意义,对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就此谈谈自己对全会精神的一些认识和体会,与大家一道学习思考。

一、在“两个视角”的广阔维度中进一步坚定信心决心

学习和研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及其通过的规划《建议》,有两个重要视角。

第一个视角,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视角。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的全部奋斗,一言以蔽之,就是为

作者简介:焦玉兰,女,甘肃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甘肃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分管日常工作副院长。

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在1954年、1964年、1975年曾3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反映了中国人民致力于国家富强、跻身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雄心壮志。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在设计“三步走”发展战略时,把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设定在21世纪中叶。

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不懈努力,到2000年,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又经过20年奋斗,我们迎来了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乘势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的到来,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大跨越”,意味着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由全面建设、建成小康社会转变为聚精会神、一心一意、锲而不舍地全面建设、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这样的历史交汇点上召开,就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如何开好局,就如何走好“大跨越”的第一步进行顶层战略谋划,这对于做好未来5年的工作,推动更长远发展,为全面建设、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

第二个视角,是五年规划的视角。要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既需要提出“三步走”“两个一百年”这样的战略目标,更需要步步为营,制定具体、可操作的阶段性规划并扎实推进。编制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依据规划的要求引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和重要制度安排。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学习借鉴苏联经验,从1953年至1957年,组织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划),取得巨大成功,初步奠定了中国工业化基础。我国至今已先后编制并实施了13个五年规划,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8个五年规划,把我们党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阶段性落实落定,推动我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从“两个视角”的广阔维度中深切感受到,我们面临的形势极不寻常,付出的努力艰苦卓绝,取得的

成绩来之不易,锻造形成的精神财富弥足珍贵,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这些伟大成就的取得,靠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竞争力,这是我们的显著优势;靠的是各民族团结向心力,这是我们的执政之基石;靠的是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创新力,这是我们的硬核与法宝。社会主义学院要以全会精神为引领,把党领导我们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形成的宝贵经验更好地转化为砥砺前行思想共识,进一步坚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信心、底气和决心,凝聚起续写“两大奇迹”新篇章的奋进伟力。

二、在“两个大局”的统筹谋划中进一步把准前进方向

规划《建议》立足“两个大局”,通篇贯穿了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要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发展观,认清世界“东升西降”大趋势,认清全球治理大变革,认清中美战略博弈长期性,认清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认清中国人民实现伟大复兴梦想的脚步谁也无法阻挡,引导广大统一战线成员全面准确把握全会精神的核心要义,自觉把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判断和深远的战略考量上来。我认为,重点要从以下六个方面去认识和把握。

一是新发展成就奠定了新征程的坚实基础。全会高度评价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的决定性成就,认为“十三五”时期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全面依法治国取得重大进展,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大成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进一步彰显。这些成就谱写在中国大地上,是党和人民艰辛奋斗的成果,激励我们继续前行。

二是新发展阶段揭示了我国所处的时代方位。新发展阶段的提出,表明我国即将胜利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任务,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进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期,开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我们要不断引导广大统一战线成员积极投身于建设具有“五个鲜明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主动服务国家

战略,担当使命责任。

三是新发展理念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方向引领。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新发展理念坚持问题导向、回应社会关切,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个重大问题。这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发展中赢得优势、赢得主动的重要法宝。我们要把新发展理念贯彻到统一战线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积极献计出力。

四是新发展目标描绘的宏伟蓝图催人奋进。规划《建议》中提出了两个未来的发展目标,一个是“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六个新”的近期目标,还有一个就是到2035年“九个方面”的远景目标。近期目标充分考虑了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和发展潜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是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的基础。远景目标规划了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壮丽景象,一连串重要的、肯定性的新提法,彰显了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五是新发展变化给开创新局提供历史机遇。全会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尽管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但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和条件。我们要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保持战略定力,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六是新发展格局为构建双循环明确战略重点。全会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这是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动作为,是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做出的重大决策,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全局部署,是发挥比较优势重塑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是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持续奋斗构建的战略棋局,它构成了“十四五”规划的重要内容和突出特色,为展望2035年更长远的发展提供方向性引领。

此外,要在统筹“两个大局”中实现安全发展。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中国“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等判断提醒我们,未来各种风险和考验只会增多,各种影响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不会减少。如何在安全的环境下实现更好、更快发展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这就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让“中国号”巨轮在“十四五”时期行稳致远,斩浪前行。

三、在服务“大统战”工作格局中进一步贡献智慧力量

全会公报和中央《建议》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国内市场、深化改革、乡村振兴、区域发展、文化建设、绿色发展、对外开放、社会建设、安全发展、国防建设12个重点领域,深刻阐述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重点任务,提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贯彻落实这些目标任务,统一战线既要在建言献策上发挥“智囊团”的作用,更要在服务甘肃高质量发展上“主动作为”。

一方面,要深化建言“十四五”行动,紧贴全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和战略举措,结合总书记指出甘肃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积极引导广大培训学员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一带一路”协同共建科技自立自强、区域经济发展、产业供应链优化升级、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等事关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开展调查研究,为我省“十四五”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建言有用之言、献管用之策。要围绕推动民营经济“两个健康”,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更好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改善营商环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助力打造承接国内产业有序转移的新模式和新高地。要围绕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服务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引导民营企业由扶贫向致富深化,推动社会扶贫常态化可持续。要畅通有序政治参与渠道,发挥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联合党校”的

基地作用,进一步创新履职平台和交流渠道,更好激发党外知识分子、新的社会阶层等的创新创造活力,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汇聚更广泛的创新人才和力量。

另一方面,要紧跟使命任务,强化社会主义学院的责任担当。社会主义学院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学院,共识教育的政治责任始终是第一位的。社会主义学院虽然不是社会生产力的一线生产者,但思想武器是我们的看家本领。为此,我们切实要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巩固“社院姓社”共识教育主阵地,不断强化意识形态的斗争本领,扎实做好厚植“四个意识”和“四个自信”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引领广大统一战线成员始终做到“两个维护”,为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政治基础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最后,我就进一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再提3点要求:

一要始终坚持学深悟透。学院广大教职工要按照中央、省委和省委统战部的安排部署,切实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院党组成员要发挥“关键少数”作用和“头雁带队”效应,率先垂范,原原本本学、反复系统学、结合实际学,在学习上先行一步、在领会上更深一层。把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与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与学习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结合起来,与学习中央领导和专家学者的解读文章结合起来,与学习《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结合起来,精心组织教职员工开展多形式、分层次、全覆盖的学习,真正把统一战线发展好、把统战工作开展好,在新时代推动爱国统一战线事业不断巩固发展。各处室、各支部要充分运用“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等,通过集体学习、个人自学、线上线下联学等多种

形式,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开展学习,努力做到理解透彻、融会贯通。

二是要切实做到知行合一。各处室要把贯彻落实五中全会精神与做好当前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对照学院确定的年度目标任务和工作要点,查漏洞、找差距,赶进度、补欠账,全力以赴抓好年度各项重点工作。要以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紧密结合服务甘肃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甘肃统一战线工作实际,进一步牢牢把握全会对统一战线工作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谋划好明年工作思路,把全会精神转化为推动学院工作高质量发展的举措。

三是要立足加强共识教育。积极推进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学员头脑。主动作为,认真规划,做好教学专题开发、教学计划安排等工作,及时在各类班次开设全会精神专题,确保把全会精神讲清楚、讲明白,让学员听得懂、能领会、可落实,不断夯实统一战线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引导广大统一战线成员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围绕全会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探索创新服务大局的工作思路和重点,不断提升服务统一战线工作大局的能力,彰显新时代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作用。要针对十九届五中全会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解读,力争推出高质量、有价值的精品课程和理论研究成果,并计划好、开展好全会的理论阐释、宣传宣讲等工作,当好全会精神的传播者和理论研究的先行者。要紧紧围绕“十四五”时期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坚持问题导向,组织教师深入开展调研,科学研究论证,聚焦产业体系、生态环保、民营经济、民族宗教、治理体制等重点任务,积极建言献策,为省委决策提供有益参考。

注:本文系作者在2020年12月7日甘肃社会主义学院举办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读书班开班式”上的讲话。

责任编辑:张凤玲

甘肃社会主义学院认真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李富坤

十九届五中全会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科学总结“十三五”,重点谋划“十四五”,并将“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统筹起来,描绘了未来五年乃至十五年间中国发展的宏伟蓝图,发出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动员令、集结号,影响深远,意义重大。会议召开后,甘肃社会主义学院党组高度重视,迅速兴起了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热潮,及时将全会精神纳入教学科研宣传等工作。

一是强化责任学,提高政治站位

十九届五中全会召开以后,我院党组第一时间制定印发了《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工作方案》,从理论学习、教学科研、宣传教育等方面作出安排部署,明确责任领导、责任处室和完成时限等,切实增强了学习宣传贯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强化全院教职工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二是线上线下学,坚持思想引领

学院党组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来抓,不断增强学习贯彻的实效性和坚定性。11月12日,召开了院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组织全院副处级以上干部和副教授以上教师参加,重点学习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传达了省委《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通知》等精神,并就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提出明确要求;11月16日,再次组织全院教职工参加党组理论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辅导报

告),学院统战理论研究部王雄刚副教授作了专题辅导,使教职工在学习中加深理解、增进认识;为37名副处级以上干部和教师发放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等学习书刊,组织培训学员、教职工650多人踏踏实实坐下来,通过互联网、“学习强国”“甘肃党建”等载体,原原本本学习了《建议》、公报和评论文章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

三是聚焦主业主学,推动“三进”工作

学院及时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纳入教学培训重点内容,积极推进“三进”工作。组织教师围绕全会精神认真开展研究阐释,设计开发新课程,不断提高政治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新开设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解读”“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等课程,并在甘南州藏传佛教中青年教职人员政治理论培训班、甘南州民营经济代表人士理想信念教育专题培训班等主体班以及安宁区委党校进行了深入宣讲,切实肩负起了全省统一战线人才培养的神圣使命。

四是多措并举学,突出学习实效

为持续推动全会精神落地见效,不断推动全院教职工增强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学院及时制定印发《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工作方案》,遵照方案要求,于12月7日—9日,举办专题读书班,发起了“六个一”活动,即:院主要领导作一场宣讲报告、学院教师作一次专题辅导、全体教职工观看一次电视政论片、院领导班子成员分享一次学

(下转第31页)

作者简介:李富坤,男,甘肃社会主义学院宣传信息中心主任。

充分发挥党外人士 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正向作用

刘良军

【摘要】新时代党外人士须始终不忘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合作初心,不忘与中国共产党继续携手前行的历史使命,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正向作用,使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等主旋律越唱越响亮,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

【关键词】党外人士 意识形态 正向作用

“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如果说经济工作是我们党不变的中心任务,意识形态工作则是我们党面临的一项极其重要,需要长远考量与认真谋划、切实贯彻落实的工作。不仅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由此,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让更多的人参与、助力意识形态工作是题中应有之义。事实也是如此,今天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的变化林林总总、出现的问题纷繁复杂、面临的挑战严峻尖锐,仅靠党员干部“单打独斗”难以为继,应该也必须依靠党外人士的力量,激发党外人士的能量,调动党外人士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具体说来,就是党外人士须始终不忘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合作初心,不忘新时代与中国共产党继续携手前行的历史使命,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正向作用,使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等主旋律越唱越响亮,进而为新时代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1]

一、党外人士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正向作用的重要性 and 必要性

(一)做好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党外人士不能缺位

对于党外人士的界定,不能简单等同于一般民间所泛泛而谈的非中共人士。须知早在2012年,中共中央研究下发的《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中,已经对党外人士做了明确界定,即严格意义上的党外人士,是指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作出较大贡献、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非中共人士。其中包括民主党派代表人士、无党派代表人士、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宗教界代表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港澳台海外代表人士等。^[2]由此,党外人士的核心要义有三:一是愿意与我们党团结合作;二是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作出了较大贡献;三是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与代表性。要而言之,党外人士具有政治属性,属于政治团体,政治先进性是第一位要求。显然,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党外人士不能缺位,应该、也必须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基础上,于意识形态领域积极发声、主动作为,如此才能彰显其核心要义,体现其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伟

作者简介:刘良军,男,中共荆门市委党校教授。

大进程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

(二)协助中共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是党外人士的初心所在、使命所在

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过程中,始终坚持与党外人士团结合作,并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仅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地位、民主党派参政党地位的基本制度,更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作为看待、处理党与党外人士关系的重要原则方针。换言之,党外人士的初心和使命,就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党开展密切合作,紧密团结在党的领导之下,共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由此折射于意识形态领域,就是党外人士必须为党“鼓”与“呼”,协助党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确保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厚植共产主义的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进而戮力同心、众志成城,推动“中国号巨轮”稳中求进、行稳致远。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因此,坚守初心、担当使命,党外人士应将协助中共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作为新时代履职尽责、干事创业、再立新功、再创辉煌的一项重要任务,做到真正摆上议事日程,纳入日常工作部署,付诸火热的社会实践。

(三)党外人士助力意识形态工作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首先,“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党外人士因其在党外的先进性与代表性,使得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成为所联系与代表群众的风向标,其主张什么、倡导什么、反对什么、抵制什么等等,都会成为模仿与效仿的标杆。其次,实践已经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外人士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与时俱进、蒸蒸日上。完全可以说,党外人士助力意识形态工作功不可没、成效显著。最后,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正处在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关键时段,必须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付出更加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使全国各族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任尔东西南

北风,我自岿然不动,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走共同富裕之路。由此对党外人士助力意识形态工作提出新要求,也决定了党外人士只要决心不衰、信心不减、毅力永存,越是困难越向前,就能在助力意识形态工作方面取得更大成绩,展示“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效应。

(四)党外人士及其所联系与代表的社会阶层、社会人群自身存在的意识形态领域问题,要求党外人士勇于“清理门户”、甘于“自我革命”

一方面,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当下,各种思潮甚嚣尘上,种种观点、看法与主张交流交融交锋,不可避免会对党外人士及其所联系与代表的社会阶层、社会人群产生冲击,稍不注意,就有可能被“洗脑”。要求党外人士越是乱云飞渡之时,越保持战略定力,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另一方面,经济体制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社会阶层深刻变动、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今天,党外人士及其所联系与代表的社会阶层、社会人群中,已经开始出现不良思想倾向,已经出现“噪音”“杂音”,已经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带来严重影响,要求党外人士直面现状、正视现实,检视问题、分析问题,进而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3]“打铁必须自身硬。”党外人士不讳疾忌医,不文过饰非,既勇于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自我革命”,又推而广之,对其所联系与代表的社会阶层、社会人群进行“社会革命”,确保“门户”“门派”风清气正、海晏河清,才能巩固、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大中国梦凝聚高度共识、汇聚磅礴力量。

二、党外人士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正向作用应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引领

(一)党外人士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正向作用存在的问题分析

首先,部分党外人士不重视意识形态工作。诚然,党外人士来自各行各业,且大多从事具体岗位、基层一线工作,没有时间和精力开展意识形态工作,是导致意识形态工作缺乏起色的主要原因。但正所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好多时候,意识形态工作并非专项、专门工作,而是如同一根红线贯穿于日常工作生活的全过程与各方面,要求功夫在平时、努力在平常。

什么“好”,是今天党外人士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首要任务,要求丝毫不含糊、半点不动摇。^[5]

其次,党外人士须向其所联系与代表的社会阶层、社会人群讲清楚中国梦,推动所联系与代表的社会阶层、社会人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孜孜以求、执着奋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诚然,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经受了太多的屈辱,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以至于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民族复兴魂牵梦萦、殚精竭虑,不仅有流泪,更加有流血。对此,让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包括党外人士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梦想。中国梦的实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基于此,党外人士不但要讲好中国梦的来龙去脉,更应该身体力行,通过各自工作岗位上踏实、求实、扎实、务实,为梦想的实现而日有所进、月有所积,奠定雄厚物质和精神文化基础。同时,中国梦是国家梦、民族梦,也是你我他每一个中国人的个人梦想。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寄语,生活在伟大祖国和时代的中国人民,人人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由此党外人士讲好中国梦,就是带动所联系与代表的社会阶层、社会人群,以个人梦想成真、人生出彩为契机,为中国梦添砖加瓦、锦上添花。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个人幸福、家庭美满,定然引致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最终中国梦不仅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为全人类对美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促世界和平、繁荣与美好。

最后,党外人士须向其所联系与代表的社会阶层、社会人群讲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不仅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也同步推动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鲜明体现,代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使其“飞入寻常百姓家”,并落细落小落实。尤其对于党外人士而言,爱国是前提,创新是动力,既要求“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也同步以创

新为引领,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干事创业,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譬如经济战线的党外人士,应该看到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变到高质量发展阶段,无论是提供商品,还是提供服务,都必须深入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另一方面,道德是公民内心里的法律,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柱。对此,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如箭在弦上,要求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实现德法并举、相得益彰,共同推动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外人士要按照《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要求,向所联系与代表的社会阶层、社会人群大力宣介、宣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使大家勇做、争做一名好社会公民、好工作人员、好家庭成员,以道德立身、道德立业、道德立命。唯有崇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新时代公民道德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才有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才能让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与深厚的阶级基础。

三、党外人士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正向作用的对策与措施

(一)党外人士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应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对此,党外人士做意识形态工作,首先必须把握这一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绝不能犯方向性错误。增强“四个意识”,要求党外人士做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时时刻刻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站稳政治立场,坚守政治原则,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做到任何时候都不能漠视政治、轻视大局;坚定“四个自信”,要求党外人士立足于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

士必须与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既从思想上、政治上、理论上、情感上自觉认同,更在具体的意识形态工作中切实践行,矢志维护,全力捍卫。毋庸置疑,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是党外人士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定盘星与压舱石,是确保党外人士同其所联系与代表的社会阶层、社会人群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准绳和指针。

(二)党外人士应借鉴中共“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目标、要求、经验与做法,以不忘团结合作初心、牢记携手前行使命为主题主旨,搞好本党派、本界别、本团体、本组织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进而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方面提高认识、达成共识,增长水平、提升能力

譬如,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前不久提出在全盟开展“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要求全体盟员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学习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实践表明,这一主题教育不仅有利于让全体盟员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还带动盟员所联系与代表的社会阶层、社会人群进一步增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决心。^[9]由此,党外人士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深刻认识到唯有理论上的清醒,才有政治上的坚定,要求从现在起,迅速掀起学习领会、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热潮。“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比如,对于经济战线的党外人士,还应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从事“三农”工作的党外人士,则应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发展、尤其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学懂弄通。党外人士将理论学习作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必修课”,才能心中有沟壑、干事创业敢担当,行动有章法、为民服务解难题。

(三)各级党委统战部门应发挥总揽、协调作用,对组织、推动党外人士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正向作用有“顶层设计”、统一部署、详细规划和具体要求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各级党委统战部门是代表各级党委(党组)履行统一战线领导职责,开展具体统战工作的党委(党组)重要职能部门,因此在组织、推动党外人士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方面责无旁贷,应该先行一步,及早谋划、及时行动。首先,党委统战部门应先期制订、出台如何推动党外人士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正向作用的规划与方案,确保党外人士有所指望,知所趋附。“路隔十里,风俗有所不同。”除了统一的目标要求之外,统战部门还应针对不同党外人士所在的党派、所属的阶层、所联系与代表的界别群众,对症下药,有的放矢,而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其次,党委统战部门应搞好集中教育与培训,让党外人士明晓为什么要在新时代注重意识形态工作,怎样抓意识形态工作,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价值取向和目标要求,等等。如此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党外人士才能张弛有度、井然有序地开展意识形态工作。最后,党委统战部门应注重调查研究与跟踪考察考核,确保党外人士助力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不偏、不虚、不空。譬如建立定期座谈制度、完善调查研究制度、建立健全考察考核制度等,有了一整套相对成熟、定型的制度,才能使党外人士助力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成为“新常态”,确保新时代全社会意识形态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旨归,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线,以实现中国梦为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 [1] 陈勇军.引导党外人士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作用研究[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7(11):28-33.
- [2] 汪守军.新形势下关于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思考[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04):20-24.
- [3] 于连锐等.坚定不移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N].内蒙古日报,2019-03-19(8).
- [4] 吕娉婷.新时代引导党外人士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作用的问题研究[J].经济师,2017(1):35-37.
- [5] 秦飞.立体讲好三个“为什么”[N].宿迁日报,2019-06-27(1).
- [6] 包松娅.中国民主同盟“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活动动员部署会举行[N].人民政协报,2019-08-27(1).

责任编辑:马霞

新时代商会组织 统战功能实现路径探讨

王雄刚 邹平惠

【摘要】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稳步推进,中国商会组织发展日趋成熟。商会组织的运作范围已然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多领域,其传统上依附于行政机构的“管理型”运作模式被迫转变,转向自主化、市场化、服务型。在此进程中涌现出大量的自筹自建商会,这类商会凸显为经济性和民间性,而商会组织本有的统战性似乎并未得到充分彰显。鉴于此,在新时代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视域下,探讨商会组织统战功能的实现路径显得尤为必要。

【关键词】商会组织 统战功能 路径

现代经济生活的典型特征为商会经济。中国商会是近代伴随着西方的经济入侵,从传统的商帮转变而来的。近代,商会对于发展民族工商业,抵御西方列强的盘剥有着重要意义。新中国建立后,在国民经济恢复期,商会更体现出为社会主义建设倾心注力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商会为新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建设注入强大的组织协调和助推效用。进入新时代,商会在承接原有经济性、社会性(民间性)等基本特性的基础上,其统战性的历史使命仍须进一步强化。

一、中国商会及其统战功能

近代以来,随着工业革命席卷西方,商会兴起于工商业团体和手工业领域当中。在西方发达国家,商会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即行会时期、商会和商会国际化^[1]。20世纪以来,商会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渗透到政治、社会、文化等多领域,其基本特征为经济自治和利益集聚,学界通常将其定性为“第三部门”。商会组织在当代的发展是全方位的,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仅适应了变动中的社会经济生活,也积极调整适应特定历史文化、族群心理等因素。与此相关,当前发达国家的商会组织呈现出三种类型:即自由型(英美)、法团型(法德)、复合型(日本)。

中国“现代性”意义上的商会始于清末,起初仿照西方国家商会的运作模式,用来协调官商之间的关系,后来演化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表团体”。新中国建立以后,旧式商会改造为“工商业联合会”,长期承担着政府与工商业群体之间的沟通与协调,并组织教育相关人群。然而有一点需要指出,在反右倾斗争扩大化和“文革”时期,由于单一计划经济体制主导的缘故,商会存在和发展的市场环境不复存在。在特殊的“总体性社会”大背景中,政府部门直接介入管理工商业领域,当时的商会作为“政治组织”,其主要职责在于对工商业群体的“统合”。

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商会获得长足发展,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商会呈现出大发展大繁荣景象。与此同时,国内学界也积极展开了对商会理论的相关研究,主要引入组织理论、社团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信息经济学等理论视角对之进行有效分析,将商会组织定义为“独立的经营单位、事业单位或由自由商人、企业职员等自愿组成,保护和增进全体成员既定利益的非盈利性组织。”^[2]据2016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全国范围内乡镇商会和街道商会覆盖率已达51.4%和61.5%。”^[3]截至2017年12

作者简介:王雄刚,男,甘肃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博士。

邹平惠,女,甘肃社会主义学院民族宗教教研部讲师。

月,“全国共有县级以上工商联组织 3411 个,各级工商联所属商会共有 45806 个,已形成覆盖全国的组织网络。全国工商联同世界上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400 多个组织、机构、商会建立了广泛联系和友好合作。”^[4]鉴于此,可以说当前商会对国内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生活的影响举足轻重。与此同时,国内商会的健康发展也面临巨大挑战,主要表现为统战工作并未完全覆盖到各类别商会组织,造成了部分真空地带,从而影响到“两个健康”的发展大局。

2015 年 9 月,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下称《条例》),《条例》第四条明确规定了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十二类主要对象:即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少数民族人士;宗教界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及其在大陆的亲属;华侨、归侨及侨眷;其他需要联系和团结的人员^[5]。其中对第六大类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联系主要由各级工商联及商会组织完成,即各级各类商会是党和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桥梁和纽带。

回溯非公经济领域统战的现实,其基本目标是实现“两个健康”,即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强调非公经济自觉转变发展方式,推进自主创新,加快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强调必须拥护党的领导,坚定“四个自信”,忠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二、转型社会视域下商会统战工作的困境

近年来,学界将中国取得的巨大进步概括为“中国之治”,即经济长时间保持持续增长,社会保持长期稳定。事实上,这样的巨大成就的取得无疑出自于中国成功的转型发展,也因此使有关“转型社会”的研究成为国内的热点话题。面对中国的转型社会,需要把握与“经济奇迹”并立的“体制奇迹”^[6],即积极回应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

在社会转型当中,各地各类商会组织进入快车道发展,涉猎者更是趋向多元化,大多数地域性商会、行业商会通过“自筹自建”模式运作,一定程度上

缺乏“桥梁和纽带”的“联系”意识。当然在传统的统战思维和机制当中,新的商会组织似乎并未得到充分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商会组织统战功能的有效发挥。具体缘由分述如下:

(一)商会组织制度化运行有待提高

商会组织是社会组织的一种特殊形式,具有一般组织的共性。“组织是一个基于权力关系之上的社会体系,而这些权力关系是围绕形式组织结构发展起来的,它们具有自身的逻辑。”^[7]当前国内的商会组织主要分属于两个领域:一是各级工商联系统;另一个是自筹自建的各地各类商会。工商联作为“人民团体”,很长时期内其运行行政化色彩浓厚,对所属商会的指导活力不强,难以充分发挥统战效能。自筹自建的商会则过于专注“利益和权益”的获取,以地域性商会为例,其通常将“籍贯”作为入会的基本条件,实际当中往往降低了入会条件,使得“人情”“面子”“关系”参入其中^[8],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商会本有的协调联通效用。

(二)商会组织统战观念淡薄

在组织社会学的视域里,“组织共同体的实践,对于组织认同的建构是关键性的。”^[9]从广义上讲,商会组织属于新社会组织的一类。就新社会组织而言,近年来非政府组织和慈善公益组织等受到了较多关注,相比较对商会组织的统战工作覆盖明显不足。究其缘由,一方面,随着商会组织的大力拓展,大量普通工商业者加入其中,他们虽“代表性”不强,但其日常活动影响力大,然而这些人士恰恰又不在传统统战工作涉猎的主要范围内;另一方面,就商会组织统战的具体工作而言,通常将其职责归结到工商联,而随着各类商会组织规模和数量的剧增,工商联的指导作用明显乏力,久而久之造成了事实上的工商联对商会组织的影响力下滑,这进一步导致对商会组织统战意识的疏忽。

(三)商会组织统战途径不顺畅

当前国内商会组织的合法性身份通常是通过民政部门登记注册而获得的,其基本运行是按照自身的组织章程来开展。对工商联来说,似乎仅有备案程序,这使得相关的指导服务缺位,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统战部门对部分商会组织的具体活动不甚了解。由

于这种潜在的信息不对称,相关统战部门仍停留于关注商会组织上层人士,却忽视了新时代背景下不断涌现的新现象、新问题,更有甚者,一些普通工商业者的意见建议没有较为顺畅的途径得以传递,最终造成对商会组织活动本身的有效衔接的疏忽。当然这种趋势在未充分暴露出其不利后果之前,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充分发挥商会组织统战效能的路径探索

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商会组织与统战工作的实际需求存在较大张力,面对这样的现实困境,新时代的商会组织须立足充分发挥自身桥梁纽带作用,致力于完善商会治理体系,积极构建政府、商会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良性互动机制,从而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向好发展。具体路径探索如下:

(一)规范商会组织“制度化”运作

近年来商会组织建设虽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其“粗放式”运作模式亟待解决。具体而言,商会数量增长十分可观,然而其质量参差不齐,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不相适应。现实当中,商会过于追逐“利益和权益”,使得商会的引领力受到质疑,其运作的规范化、制度化水平得不到有效提升。鉴于此,从“制度化”运作的长效机制角度而言,建议加快《商会法》立法进程,明确商会组织经营管理范围及其成员行为的法律后果^[10]。当然在《商会法》未出台之前,各级各类商会组织应准确把握新时代商会建设所面临的新任务,坚持培育发展与规范管理并重,完善商会组织管理制度,强化对商会组织登记注册的指导服务,健全商会组织运作评价体系,推动商会组织致力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二)推进新型政会合作关系

新时代的大背景,要求商会组织融市场经济、保障民生、维护权益、协调社会治理于一体^[11],不断推进商会组织建设走“中国化”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必须掌握规律、坚持原则、讲究方法,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12]鉴于此,当前加强商会党组织建设须致力于构建新型政会合作关系。提升商会党组织的战斗力,其抓手在于以“党建”促“会建”,充分体现商会统战功能的政治性,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学理逻辑,“政治

发展应积极主动地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其中主要与作为社会发展核心的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13]在此基础上,形成健康向上的政会关系,推动各级各类商会组织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职能,在政会之间建起党纪国法的“防火墙”,为新型政会关系的构建营造良好氛围。

(三)增强商会组织统战意识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地球上很少有单独的“个体”存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结构是“协作关系”。“协作”在表象上看,可以通过制度加以规范,但深究其效用却值得深思。良好的协作关系一定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信任和可信赖行为(trustworthy behavior)对任何经济而言都是关键的资产,因为它们会引导人们进行合作,使他们相互间产生比纯粹自利动机更善良的行为。”^[14]鉴于此,做好新时代商会组织统战工作,从深层次上讲,需要改变传统的落后理念和狭隘思维,深化领会商会统战工作的重大意义,积极引导非公领域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思想意识层面破除商会组织统战的一些陈旧观念和错误认识,切实增强做好商会组织统战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15]。

(四)构建商会组织统战工作新机制

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多元化、群体分化和社会自组织能力的增强,国家与民众关系这一主线日益明朗凸显,正在成为国家治理的主要场域。”^[16]在各种新社会组织井喷式发展的当下,“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治理理念须植入商会统战工作领域,切实提高统战工作对商会组织的全面有效覆盖。当然在具体工作机制应进一步贯彻落实“大统战工作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说到底,统一战线是做人的工作,搞统一战线是为了壮大共同奋斗的力量。”^[17]鉴于此,做好新形势下商会统战工作,需创新工作机制。具体来讲,应进一步完善“政府—商会—企业”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完善相关制度保障,健全商会统战工作的监督机制;注重对商会组织先进人士的接近、交流和“树标杆”,构建激励机制;通过对基金会、公益组织、个体私营协会的充分关照,深化协同机制,等等。

四、结论与探讨

新时代背景下,商会组织体系建设,不仅是重大的经济议题,更是重大的政治议题。不论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还是社会的长期稳定,以至国家的长治久安,抑或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多维度来讲,商会组织的现代化建设与发展均至关重要。

在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语境中,社会治理现代化成为题中应有之意。在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里,当代经济社会运行有三大主体:即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其中商会组织对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有着广泛而深刻地影响。换言之,商会组织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互为“正相关”,即一个地区商会组织较为成熟,其经济社会发展必然向好,反之亦然。有鉴于此,商会组织的培育、发展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党的领导,积极引导其服务于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

事实上,就我国当前的实际状况而言,“商会建设不仅明显滞后于其他两大要素,其与政府和企业间的互动方式也缺乏深入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已阻碍了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18] 鉴于此,时下探讨商会组织统战功能的实现路径其意义非凡,一方面,对商会组织自身来说,可准确定位新时代商会组织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另一方面,对统战部门来说,可做到“精准引导”,推动“两个健康”良序发展。

参考文献

- [1][3][18] 汤蕴懿.中国特色商会组织体系构建——以上海为视角[M].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20、2.
- [2] 范笑天.加强商会组织统战工作研究[C].进一步加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2016 统一战

线前沿问题研究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16:102.

- [4] 统一战线知识简明读本[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8:141.
- [5]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EB/OL].
http://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9/22/c_1116645297.htm, 2015-09-22.
- [6] 李友梅等.转型社会的研究立场和方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23.
- [7] 李友梅.组织社会学与决策分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234.
- [8] 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97.
- [9] 张静.社会治理——组织、观念与方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120.
- [10][11][15] 柯育芳.新时代商会统战工作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01).
- [12][17]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03、304.
- [13] 王沪宁.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526.
- [14][美] 马克·格兰洛维特.社会与经济——信任、权力与制度[M].王水雄、罗家德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91.
- [16] 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439.

基金项目:甘肃社会主义学院招标课题“商会组织促进甘青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研究”(GSSYZB202003);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甘肃深度贫困区高价彩礼治理研究”(19YB179)。

责任编辑:马霞

“一带一路”视角下侨务工作的新形势与新思路

林少红

【摘要】新时代是侨务工作大发展的重要机遇期。“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使中国成为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参与者、引导者,为新时代侨务工作创新发展带来新机遇。“一带一路”倡议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影响及其带来的国际形势变化、经贸环境、人文交流等,这些必将对沿线各国、沿线华侨华人及侨务工作带来新的挑战。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提供了理论指导,面对国内外的机遇和挑战,新时代侨务工作大有作为,可以从创新中寻找增长点。

【关键词】“一带一路” 侨务工作 新思路

十九大报告强调,“广泛团结联系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给海内外侨界巨大鼓舞,也对新时代“一带一路”建设下做好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分布于“一带一路”沿线的海外侨胞,是连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天然桥梁和纽带,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资源与力量。“一带一路”的建设与实施,离不开归国侨眷和海外中华儿女的鼎力支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服务大局,事关以新的更大作为开创改革开放新局面,事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落地见成效。

一、国家发展战略带来侨务工作发展的新机遇

(一)新时代是侨务工作大发展的重要机遇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十九大提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战略目标,以全方位对外开放为途径,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统筹协调发展,促进国际

合作。“一带一路”是中国促进内外联动发展的总抓手。建设“一带一路”就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就是中国对于世界发展理念的创新;在建设“一带一路”过程中,要达到内外联动发展的效果,在内部治理和外部合作方面也需要创新。总而言之,新的社会矛盾是对新时代特征的总结,也是开展各项工作的总动力,“一带一路”是解决新的社会矛盾的具体计划。因此,十九大报告说明“一带一路”既是经济建设的主要成绩,也是未来对外开放的工作重点。同时,“一带一路”还写进党章,成为党的核心工作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如何适应新时代新要求,如何继续更好地发挥侨资侨智的作用,成为摆在我们面前迫切需要思考、解决的问题。在这个伟大进程中,广大海外侨胞一定能够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5月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统一战线是做人的工作,搞统一战线是为了壮大共同奋斗的力量。”这为新时代侨务工作的创新发展带来新机遇。

作者简介:林少红,女,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教学部主任、教授。

(二)“一带一路”建设新成效为侨务工作提供新平台

“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使中国成为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参与者、引导者,为新时代侨务工作创新发展带来新机遇。

第一,“一带一路”建设进入了顶层设计新阶段,自由贸易升级是机会。汪洋副总理在《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一文中具体指出做好战略对接,建成“和平之路”、促进发展,建成“繁荣之路”、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建成“开放之路”、科技与产业的创新合作,建成“创新之路”、人文合作,建成“文明之路”等五方面顶层设计。其中建设高质量的自由贸易体系成为亮点。对外投资重在渠道、品牌 and 创新能力等方面的提升。2016年11月,联合国大会第A/71/9号决议首次写入“一带一路”倡议,欢迎“一带一路”等经济合作倡议,该决议得到193个会员国的一致赞同,体现了国际社会对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普遍支持。“一带一路”进入国际话语体系,成为国际性关键词。^[1]

第二,高层互动成果多。作为倡议的发起国和主要推动者,中国对于“一带一路”未来发展形成了新的指导思想,这充分反映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中国希望通过各种平台与对话第一时间将这些新想法介绍给世界,让世界尽快了解中国方面的构想,并同本国发展形成互动对接,以便落实推进。

第三,多边拓展新空间,与相关国家地区经济合作提速。“一带一路”进入“全面实施的新阶段”,中方“将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推动构建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深化各方面互联互通,通过APEC会议,“一带一路”正在向亚太特别是拉美地区迅速延伸,未来中国同该地区的经贸合作将提速。2017年11月9日至11日,“中国-拉美国际博览会”在珠海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总25亿元的“横琴中拉经贸合作园”在此期间也正式揭牌。这种“支点”国家和产业园区的合作模式未来有望继续增加。除了拉美地区,日本、韩国、菲律宾同中国的经贸合作也将提速。“实现协同联动发展,朝着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我们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货物贸易额累计超过5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超过600亿美元,为当地创造

20多万个就业岗位,我国对外投资成为拉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重要引擎。^[3]

“一带一路”五年成就获十国主流媒体高度评价。多国高度肯定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于沿线国家发展的贡献,将其评价为“最具变革意义的项目之一”,认为其在调节地区争端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正在构建“全新的全球经济秩序”。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对未来的合作提出了新诉求和新希望:一是从注重高层合作转向兼顾民众获利,希望促进贸易均衡发展,维护合作国中小企业的利益,增强当地民众的获得感和认可度。二是从主攻基础设施建设转向兼顾新经济转型,扩大数字经济和新技术领域合作,推动交流合作升级。三是从注重经济互惠转向深化各领域全面交流,特别是文化和教育领域的互通。这些转变将是未来开展侨务工作的方向,也为创新侨务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抓手。^[2]

二、世界侨情面临新形势与新问题

“一带一路”倡议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影响及其带来的国际形势变化、经贸环境、人文交流等,这些必将对沿线各国、沿线华侨华人及侨务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一)国外形势演变对侨务工作提出新挑战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涉及国家众多,有世界上多种类型的国家,也是多民族、多宗教的聚集区域,有近65个国家,人口达40多亿,50多种不同语言,数十种以上不同宗教派别,各国投资环境参差不齐,普遍存在安全、政治、经济和法律等方面不容忽视的阻力和各类安全的威胁,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海外侨务工作面临的外部挑战和压力有增无减。主要体现在:

一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地缘政治复杂敏感。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8月出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共建“一带一路”是经济合作倡议,不是搞地缘政治联盟或军事同盟。^[4]“一带一路”作为中国首倡,旨在平等的文化认同,以最大的诚意和友善谈合作,体现的是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但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一些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的现象时有发生,“中国崩溃

论”一度甚嚣尘上。全球恐怖活动频度和烈度上升,一些国家民粹主义和极端化倾向上升,“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抬头。有些区域大多数为发展中国家,处于政治转制、经济转制、社会转制的时期,矛盾突出,政局不稳,国内环境较为复杂。有的区域国家政局动荡或局部热点冲突,国际经验和风险防控能力不足,涉及领土或主权方面的掣肘,非传统安全等多种因素交织,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这些将随“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地缘政治生态。

二是警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意识形态及文化差异带来的不利影响。由于各国之间的利益诉求存在较大差异,沿线国家的政治体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宗教信仰、风土人情存在差异,文化差异巨大而复杂,较为深入的共识不易达成。警惕“一带一路”沿线异域不良文化思潮的趁机入侵,警惕美国等西方国家借助“一带一路”文化通道对中国实施“和平演变”的图谋,警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政治分离主义的渗透,警惕沿线国家与地区多元异域文化对中华民族凝聚力和民族国家认同感产生不利的影响。

三是沿线各国法律体系存在较大差异、地区风险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针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和法律不同,在国家安全、反垄断、环保、劳工、税务以及行业限制等方面都有完全迥异的规定,同时相关政策和法律还经常因外部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一些国家的法律体系受历史、文化、宗教和地缘等因素影响带有鲜明的宗教色彩,对投资与风险承担的模式有着严格的规定。

四是警惕境外排华势力和破坏分子的影响。侨务工作要对“台独”、“东突”、“藏独”等分裂势力有清醒的认识。加强侨务工作是遏制分裂势力、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重要手段。确保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国家核心利益,实现国家统一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夙愿。长期以来,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大是大非问题面前,广大侨胞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他们自发成立200多个反“独”促统组织,举办16次全球华侨华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大会及多次区域性会议,通过开展各种形式反“独”促统活动,遏制了“台独”分裂势力的

活动和影响。他们积极行动、主动发声,坚决反对达赖窜访、抵制“藏独”分裂行径。^[5]

(二)国内侨务工作面临新情况新问题

一是大侨务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一直以来,侨务工作在推动改革开放、国家统一、和平崛起方面的成就突出,贡献巨大。但统战、外侨、侨联、台办等相关部门工作未能深度融合凝成有效合力,侨务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及充分共享。各相关部门在管理体制机制上、工作规划又不太一样,没有集中统一领导,对侨务工作统筹协调的水平不高,不充分,力量整合不够,难以形成合力适应新时代大侨务工作的需要。此外,“一带一路”作为一项宏大的系统性工程,涉及各个领域,牵涉多个部门,需要参与各方之间通力合作。当下缺少必要的联席会议对工作统一指导、分工、开展,有些地方建立了联席会议,会议也只存在沟通信息,缺少对整体工作的规划。

二是海外侨务力度有待加强。侨务工作是一项群众性、特殊性的工作。目前仍然停留在以传统侨社、老一代侨胞为主。对普通海外侨胞的工作,面对面的接触少,这方面工作比较薄弱。每年出访的机会少,给调研带来一定的难度,导致不能全面、深入的了解他们在旅居国的发展状况,不能更好地拓展统战工作面。调研手段方法方式比较陈旧,有待改善和创新。

三是社会力量参与力度有待增强。目前的侨务工作主要是国内政府侨务部门在开展相关工作。随着华人华侨侨眷对美好生活向往需求越来越高,越来越需要专业化的社会力量为海外侨胞、国内侨胞服务,切实解决他们的权益方面的需求。习近平侨务思想开辟了侨务工作新的境界,引领侨务工作进入新时代,为进一步做好海外侨胞工作指明了方向,是我们开展侨务工作、联系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共同奋斗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

四是服务引导和国家政策信息指引不够。对相关国家政策指引不够,导致没能准确了解祖国发布的最新动态和信息,推介宣传中国故事方面力度不够,沟通联系缺乏统筹协调和具体措施,在凝聚侨心、发挥侨智方面出现短板;而且侨务部门在发挥侨

务工作优势、服务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缺乏前瞻性和开拓性,有时还存在被动应对的情况。这些问题都使得侨资、侨智、侨力的作用难以恰当和充分地发挥出来。

五是把握侨情善用侨务资源优势还不够。“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让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和企业走向海外发展,也让更多的海外华侨华人回到祖(籍)国定居兴业,使得侨务工作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海外华侨华人数量的增加、结构的变化、经济科技实力和政治社会地位的整体提升、利益诉求的日趋多样化,使得侨务工作面临更大挑战。

六是侨务干部队伍自身建设有待增强。目前,侨务干部队伍是有责任担当的,积极开拓性地开展工作,但力量和素质仍可进一步提高。政治理论学习有待提高。新时代新思想,如何用新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侨务思想指导新的侨务工作,侨务干部在政治理论水平、熟悉大政方针上要加强学习的空间还有待提升。侨务工作的氛围还不够浓厚。部分基层对侨务工作缺乏足够的重视,对开展侨情调查,涉侨联谊活动,保障华侨、侨眷合法权益重要性的认识尚显不足。对开展侨务活动业务素质和工作实战能力有待提升。侨务工作是一项特殊的群团工作,是做人的特殊工作,增加联系人民群众,统筹协调群团组织,整合资源,加强宣传工作,与人打交道的工作开展形式比较单一,内容创新性还有改进的空间。

三、大统战视野下创新侨务工作新思路

(一)围绕中心,协同并进,树立“大侨务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期的侨务工作要打破地域的界限,跳出侨务部门的范围,使之成为党和各级政府的大事,成为全社会共同关心、参与的大事”。一方面,按照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统筹协调、整体规划和顶层设计,打破部门、地区的局限,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发挥各方优势和积极性,推进侨务工作顶层设计,整合侨务工作资源,形成侨务工作合力,构建大侨务工作体系,将侨务工作纳入政府中心工作,使侨务工作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与当前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提出的“坚持优化协同高效”高度契合,保证了党对侨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其他机构协同联动、高效运行。另一方面,把华侨

华人工作放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格局中,让华侨华人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与成果共享者。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出访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为当地华侨华人带去了信心与勇气,也让当地华侨华人释放出了极大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改革开放40年,我国在侨务工作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要最大限度把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中蕴藏的巨大能量凝聚起来、发挥出来,发挥极致效能,凝聚力量共筑中国梦。

(二)加强海外侨务工作力度

“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让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和企业走向海外发展,也让更多的海外华侨华人回到祖(籍)国定居兴业,使得侨务工作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侨务工作是一项基础性工作,需要大量的同国内调研和海外调研获取第一时间的信息和资讯,侨务工作一般要做代表性人士的工作,海外的侨领、侨商的工作做得很多,这是需要的,也是必须的。只有和新、老华侨华人面对面地交流、密切亲情乡谊,加强和他们的感情联络,了解他们在海外工作和生活情况,能更有效地、有针对性地做工作。因此,要加大大海外调研的时间、拓宽调研的内容、拓展调研的思路,以更好做牢基础性工作。同时,聚焦“民心相通”,讲好“中国故事”。要进一步加强侨务外宣工作,增进海外华侨华人和国际友人对中国和“一带一路”的认识和了解,提升国际影响力和传播力。建议合作举办涉侨文化活动,与海内外媒体合作,组织开展部分涉侨文化活动。

(三)增强社会力量参与

海外侨务工作是一个涉及全社会的工作。习近平早在地方工作时就强调,新时代的侨务工作要打破地域的界限,跳出侨务部门的范围,使之成为党和各级政府的大事,成为全社会共同关心、参与的大事。在工作力量上,要从侨务部门唱“独角戏”,向各级各部门共同参与转变;当前,社会力量参与侨务工作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侨务工作社会化是新时期侨务工作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必须创新工作机制,探索建立完善有效覆盖各省各类涉侨群体的为侨公共服务平台,调动基层社区、志愿者队伍、社会组织和企业各方面积极性,拓展为侨服务内容,创新为侨

服务形式,更好地满足归侨侨眷日益增长的需求。建议鼓励设立涉侨社会组织,在加强对社会组织指导、培训和服务的基础上促进涉侨社会组织到沿线国家从事公益服务,使之成为侨务工作新的增长点,实现侨务工作格局的突破、创新。

(四)加强服务引导和国家政策信息指引

加强侨务工作是助力对外交往、促进中外友好合作的天然渠道。海外侨胞中不乏商界、政界、学界、文化艺术界精英,他们较好较深融入当地社会,熟悉住在国政治和社会环境,熟悉住在国民众思维模式、语言习惯和文化背景,普遍期盼住在国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并愿贡献力量。他们向当地社会和民众介绍中国国情、文化传统,易于被当地社会接受和认同。我们要加强联谊服务引导工作,在积极推动住在国政府营造有利于侨胞生存发展良好环境的同时,引导侨胞树立守法诚信、举止文明、关爱社会、团结和谐的良好形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主动参与社会事务,融入回馈当地社会,用辛勤劳动、诚信经营赢得住在国与当地民众的尊重和赞誉,努力做住在国的好居民、好公民。同时,运用互联网+侨务工作模式,创新宣传方式,打造侨乡品牌。广交朋友,联络友谊,宣传改革,争取人心,加强对外联络,夯实海外工作基础。比如,把侨刊作为对外联络的有力阵地,结合新时代新任务新期盼,发行侨刊杂志,在传统基础上,打造“一群、一号、一书”为重点的网络对外宣传平台。及时宣传国家最新的大政方针、家乡要闻、乡情乡讯等,不断传播祖国家乡经济社会发展正能量,扩大对外宣传的影响力,讲好中国故事。加强省内法律界与沿线国家华人法律界的联系、对接与合作,促进我国企业在沿线国家熟悉政策环境、规避法律障碍,推动海外华商、专业人士更好在国内发展。

(五)精准把握侨情,涵养巧用侨务资源

“海外中华儿女有共同的根、共同的魂、共同的梦”,努力当好侨胞之友。精准把握海内外侨情深刻变化对侨务工作提出的新课题。华侨华人群体人数众多,联系松,且各住在国国情各异,情况复杂特殊。华侨华人的认同、居留和活动范围愈加多元化,专业性、职业化能力也日益高端化,其生存发展面临许多新问题,对祖(籍)国也寄予更多期望。^[6]不可忽视的

一个现实是,现在的6000多万华侨华人中,绝大部分已经是外籍华人。根据国务院侨办的调查,华侨约占10%。这就意味着有5400多万是华人。从法律上讲,这5400多万华人是外国人,与中国公民有着身份上的重要区别。现在,很多华裔新生代已经是第三代、四代了,很多人已经完全不懂中文。由于他们出生、教育、生活、工作在当地,在国家认同、政治认同上,已经完全在地化。^[7]基于以上情况,我们的侨务工作必须严格把握华侨与华人的政策界线。

从国内侨情变化来看,改革开放40年中,侨资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所起的作用有目共睹。新侨的崛起、壮大是新时代最大的侨情变化。在工作对象上由主要做老一代华侨的工作,转向同时重视新一代侨裔和华侨新移民的工作,尽快弥合部分年轻华侨对故土亲谊感情上的断层。^[8]当前,海内外侨情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变化:一是海外侨胞数量持续增多,具有高度流动性的跨国公民、“两栖”侨胞越来越多。二是海外侨胞整体经济科技实力稳定提升,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数量持续稳定增长。三是海外华人在住在国的参政意识和维护族群整体权益的意识增强。四是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利益诉求更加多样。^[9]因此,做好新侨工作是涵养侨务资源,促进侨务工作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重点所在、希望所在。以新华侨华人、华裔新生代、社团新力量为主要标志的新侨大量涌现,尤其是新侨高层次人才,已成为参与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不可替代的重要生力军。随着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归,新侨队伍不断壮大,成为最具活力的侨务资源,侨智成为最突出的优势,他们中蕴藏着丰富的创新创业资源。多形式、多渠道地引进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鼓励支持他们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参与我国创新发展,是侨务工作为国家大局服务的重要任务。“没有梧桐树,招不来金凤凰”,进一步加强在永久居留、出入境等方面的法规政策等“软环境”建设。加强政治上有影响、经济上有实力、学术上有造诣侨胞的掌握,更主动地开展海外联谊、海外侨务工作,更好为开放型经济中发挥“侨牌”的优势。

(六)发挥“三宝”作用

华人社团:随着国家“走出去”战略的进一步实

施,将有更多的中国企业到海外直接投资创业。由于“走出去”战略实施的主要内容需要在海外直接操作和需要与所在国的政府管理、行业管制及与法律、金融、营销和知识产权等有关的机构发生联系,海外华侨华人专业社团在这方面的优势和功能则更为直接和明显,也会充分发挥其特定的积极作用。

华文媒体:海外华文媒体拥有丰富的媒体资源,是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重要载体。华文媒体生于侨、长于侨,对居住国有一定的了解,可以有的放矢、细水长流地通过多种形式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沟通交流,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华文教育:华文教育事业任重而道远,同时也是一项长期、宏大、艰巨的系统工程,既需要有更多专业的华文教育工作者参与,也需要得到海内外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应该协调争取周边国家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支持华文教育工作,将华文教育纳入当地国民教育体系。国家应该出台更多有利于华文教育的政策。比如说学历互认,周边国家的学生来我们国家接受了我们的教育,中国颁发的学历别国要认可,别国的学历中国也承认,给华文教育一个合法合规的宽松环境等等。支持华文教育发展,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大业,充分发挥桥梁作用。

(七)着力培育高素质侨务干部队伍

2017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希望侨务战线的同志们坚持胸怀全局、坚持为侨服务、坚持改革创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10]切实推进建设一支大局意识强、整体素质高、侨界群众信赖的侨务干部队伍已刻不容缓。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加强党对侨务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侨务工作的论述指导工作。紧密结合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考和谋划侨务工作,努力建设一支政治素质过硬的侨务工作队伍。二是加强学习,做好干部的教育培训。掌握好海外侨务工作的看家本领,优化各级干部知识结构,放宽视野,广交朋友,长期打

算,以诚相待,以凝聚侨心、汇聚侨智、发挥侨力为目标,提高干部队伍的理论素养、政策水平,努力建设一支懂侨务、爱侨务、业务能力强的干部队伍。三是不断创新工作方法,实现侨务工作精准化、精细化。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华裔新生代、侨界代表性人物、留学生、政策对接落实、各国国情研究、侨情研究、讲好中国故事、国内群众性基础建设等都能精准开展工作。广泛地联系海内外侨胞,更加精准地服务海内外侨胞,更加牢固地凝聚海内外侨胞,开拓侨务工作新思路,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创新工作,努力建设一支侨界群众信赖的工作能力强的侨务干部队伍。

参考文献

- [1]翟崑,曹岳.十九大后“一带一路”高位运行开启新征程【EB/OL】. <https://www.yidaiyilu.gov.cn/ghsl/gnzjgd/37747.htm>.2017-11-30.
- [2]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国际传播所.“一带一路”建设的新机遇与新挑战【EB/OL】. <https://www.yidaiyilu.gov.cn/ghs/gnzjgd/61741.htm>.2018-8-2.
- [3][4]习近平.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造福人民【EB/OL】.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08/27/c_1123336562.htm.2018-8-27.
- [5]杨洁篪.当好贴心人 成为实干家 凝聚侨心侨力同圆共享中国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EB/OL】. http://www.gov.cn/guowuyuan/2017-05/16/content_5194391.htm.2017-5-16.
- [6]裘援平.华侨华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大有可为【EB/OL】. <http://www.zijing.org/2016/0330/691722.Shtml>.
- [7][8]田家.习近平侨务思想与新时代侨务工作思考之二【J】.中国侨联工作,2018(5):14.
- [9]杨洁篪.当好贴心人 成为实干家 凝聚侨心侨力同圆共享中国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EB/OL】. http://www.gov.cn/guowuyuan/2017-05/16/content_5194391.htm.2017-5-16.
- [10]田家.习近平侨务思想与新时代侨务工作思考之一【J】.中国侨联工作,2017(4):12.

责任编辑:常海哲

民族地区社会工作发展的困境及创新路径

任 敏

【摘 要】民族地区是我国边疆建设的重要阵地,而社会工作对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和民生建设具有积极作用。本文在厘清“民族社会工作”概念的基础上,指出民族地区社会工作发展遇到重重“阻力”,诸如社会工作发展体系尚未形成、社区自治能力较弱、社会组织发展动力不足、社会工作者缺乏多元文化敏感性等等。对此,结合民族地区多元文化特点,试从链接学科、职业和行政三个板块推动社会工作体系化发展;发展社区社会工作,激活社区能量助力社区自治;借用生态视角推动社会组织发展,形成社会工作的行业支撑;建构多元文化理念提高社会工作的效率质量。

【关键词】民族社会工作 社区社会工作 社会组织 多元文化

2017年我国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这体现出人民群众的追求重心已经由原来的物质层面提升到精神层面,但是仍然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状。这样的现状在东部与西部地区、城市与农村地区、富人与穷人之间差异中呈现出来,而西部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民族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在发展的过程中,实际上陷入追求经济增长和实现美好生活的双重困境。民族地区想要摆脱困境,不仅需要自身的发展,也需要在党和国家的政策推动下获得其他社会力量的支持。尤其是在民族关系维护、民族心理建设、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等方面,社会工作有其优势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分析民族地区社会工作发展的“阻力”,找出其内在发展脉络,对于进一步推动民族地区社会工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关于民族社会工作

目前关于民族社会工作的概念界定,学界侧重不一。从制度层面,一些学者认为民族社会工作是依据国家少数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个人和群体开展的救助服务^[2];从发展角度,一些学者认为民族社会工作应该是关注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3];还有从文化层

面,一些学者强调民族社会工作应该具有文化敏感性和跨界视角^[4]。笔者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按照地域界定,指在民族地区开展社会工作服务。如王思斌谈到“民族社会工作就是在民族地区开展社会工作,民族社会工作像其他领域的社会工作一样”^[5]。另一方面按照服务群体界定,针对少数民族群体为服务对象的社会工作。如“民族社会工作是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的价值观和社会工作理论方法,依据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和民族政策,对面临困境的各民族群体和个人实施救助服务的活动”^[6]。

本文是以地域视角来界定民族社会工作的,对此缘由给出如下解释。首先从词汇角度,“民族”这个词语不同于“老年”、“妇女”、“青年”等,它不是一个“单一概念”,而是一个包含丰富内容的“类概念”,是一个集合了多种主体要素的综合体。若将其作为研究对象来命名恐有歧义。其次,从实践经验来看,社会工作的扶助活动可以在不同地区不同群体间开展。社会工作服务既可在汉族地区进行,也可在民族地区实施。而服务对象不仅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当前社会流动性不断增大,使得少数民族群体在不同地域进行生产生活,民族间的交流进一步融合。如果仅从服务少数民族群体来定义民族社会工作会出现很多误区,甚至可能会产生如“藏族社会工作”、

作者简介:任敏,女,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维族社会工作”等错误引导趋向。再者,由于民族地区的敏感性,过于强调社会工作的“族性”和“客体性”,可能会对社会工作服务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如涉及国家安全、政治环境方面。过多地强调社会工作的“民族性”还会对社会发展产生不良后果。按照服务群体划分还有可能强化民族间的区隔,也有可能因突出民族间的差异而忽略民族内部弱势群体的需求,还可能放大社会工作的责任领域而导致不必要的纠纷。过多地讨论民族关系、民族之间联系和区别等都会对社会工作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而从地域角度界定民族社会工作会更具包容性和多样性,既涵盖了全体服务对象,也能体现出民族地区的独特性——“民族性”,也保留了社会工作的专业性。

二、民族地区社会工作发展的阻力

(一)社会工作发展体系断层

跟随全国社会工作的发展速度,民族地区也在加快脚步。社会工作服务逐步走入人们的生活。如笔者所在城市甘肃兰州,就出现了诸多社工的身影:以特殊儿童为服务对象的甘肃欣雨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提供社工培训、以驻校社工身份帮助贫困大学生的甘肃兴邦社会工作机构;致力于社区服务设计、社会救助等服务的良助社会工作机构。近些年民族地区出现了诸多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但是从体系和规模的角度来看,民族地区的社会工作仍处于摸索阶段,困难阻力仍然制约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的发展。

对比其他地区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径,西部地区缺少一个健全社会工作发展体系,而一个健全社会工作发展体系内含学科、职业和行政三个板块。

第一,学科板块是社会工作获得专业技能的重要板块。与东部地区相比,民族地区的社会工作教育在学科方面如教学理论、教学方法体系以及人才培养方式等还处于起步阶段。截至2005年,西部地区152所高校中有社会工作专业的院校34所,占比22.4%,而且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6]。西北民族地区仅有6所院校开设社工专业。由于起步晚,发展慢,加之经济发展等因素,造成民族地区社会工作学科整体实力薄弱^[7]。出现了培养方向单一,人才队伍不足,就业难等问题。以重庆某大学为例,2001级学生就业率为75.6%,专业对口率不足20%^[8]。以西北某高校为例,2008级社会工作就业率仅70%,而对口

就业几乎不到10%^[9]。在东部地区社会工作发展呈现“上海模式”、“深圳模式”时,西部地区却是“有教育无就业,有专业无行业”的现状^[10]。再者民族地区存在多元文化,在具体实践层面,还需要再本土化。尤其是社会工作理论发展不足,还会进一步制约社会工作的发展,社会工作实践能力的提升。

第二,职业板块是社会工作体现社会工作实践价值的组成部分。相比东部发达地区,民族地区的社会工作职业认同度则更低,尤其在农村牧区。其问题表现为:社会大众层面对社会工作的认同度低、职业评价体系不健全、职业合法性问题;社会工作层面存在激励机制与职业认同的张力、高校培养与实际部门不衔接等问题;而国家层面则出现“双轨制”、专业服务组织发展迟滞、本土化发展尚待探索等问题^[11]。更关键的是民族地区社会工作还存在合法性问题,如何判断关键是看其是否具有实践价值^[12]。因此,职业化是推动社会工作迈入实践,走向市场,检验其能力和价值的关键路径。而就服务模式而言,民族地区还是以依靠国家行政推动占主导模式,缺乏现代型专业模式^[13]。

第三,民族地区现代型社会工作发展模式还处于起步阶段,发展力量薄弱,需要国家力量的扶持,尤其是需要纳入社会治理的行政体制中,给予其一个“合法”的身份。西方国家社会工作的发展最开始也是国家层面的社会政策给出了大力支持才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如英国的《济贫法案》,美国罗斯福新政中的综合性福利国家计划,这不仅推动了社会工作的发展,还保障了其合法性^[14]。我国政府虽然也支持社会工作发展,但是人力、资金及相关的法律政策支持度依然不足,尤其是针对民间社会工作机构的发展。以新疆喀什地区为例,从某种角度政府与社会工作是一种“体用逻辑”关系,存在一种“承认脱断”的现象^[15]。其后果就是社会工作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容易被忽视,出台的一些社会工作相关制度也未见成效。究其原因是社会工作还没有完全纳入我国行政体制之中,处于“局外人”,而且在具体实践中行政工作与社会工作分工难以明确。

显然,我国西部地区民族工作体系不健全,或者说构成部分不完整,尤其是职业和行政这两个板块发展严重不足。

(二)社区自治能力较弱

社区是一个地区社会的缩影,也是社会工作的重要实践平台。民族地区由于社会经济欠发达,社区发展也面临挑战,尤其是少数民族群体较多的民族社区。在民族地区社区发展面临如下问题:在立法层面,立法体系不完善,内容不明确。缺乏与民族社区相关的法律法规,无法保障民族社区稳定建设,并且社区中对社会工作立法监督少有涉及^[16]。在治理层面,政府角色定位不准,缺乏法治理念,社区治理理念滞后。街道社区领导体制不完善,人员素质较低,“钱随权走,费随事转”的问题依然存在^[17]。在社会大众层面,公众参与度低,社区自治能力弱,社区发展不均衡,社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缺失,并未形成多元文化的现代社区。因此,社会工作也未能有嵌入的可能。

(三)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发展动力不足

社会组织是一个地区发展的润滑剂,其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和公益性,与政府、盈利性组织相比,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社会组织发达的程度、社会发展的指标也是社会工作发展的行业支撑。与发达地区相比,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呈现为数量少、种类少、圈子小、服务少的特征^[18]。在西部地区注册组织中的社会组织占24.9%,而非社会组织的比例超过3/4;这其中,非民族地区占到30%左右,民族地区仅占6%。就社会组织分布范围看,城市较多,农村较少,并且服务领域窄,主要以教育、扶贫和医疗救助为主。

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出现“内忧外患”。“内忧”,即指资金投入不足,管理落后。民族地区的社会组织发展虽然有政府的扶持,如扶贫互助组是与扶贫办对接,妇女组织是和妇联对接,社区社会组织与街道对接^[19]。但由于地区特殊,经济欠发达、政治敏感,手续申请繁琐严格,其社会组织的资金来源多数是基金、企业、私人捐助等,政府的资金投入仍显不足。这也造成组织内部的人才流失,组织生存困难;社会组织内部缺乏一个完整的运行机制,管理方式落后,各种规章制度不完善,如人力管理、财务管理等。社会组织独立性差,依赖性较强,加之管理水平低、合作精神缺乏,组织之间缺少合作意识,导致组织间合作率较低。

“外患”包括社会认可度及国家的支持和监管。首先,社会组织的社会认可度偏低,包括自我认识和

社会大众认识。民族地区社会组织本身由于经验缺乏,定位不清,未能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加之经济地域文化差异以及社会组织的影响力弱,社会大众对社会组织感到陌生,甚至质疑其合法性。其次,国家关于社会组织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社会对其监督体制不完善。尽管国家建立了一套对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监督政策法规,但是缺乏进一步地深入和细化。民族地区还存在一些未注册的社会组织,缺少合法性,不仅难以被政府部门监管,同时也制约了社会大众对其有效的外部监督。最后,发展民族地区社会组织还缺少国家和政府对其的培育和孵化。从现有的政策来看,民族地区较少出台培育和孵化社会组织的相关政策。在税收、财政资助、人事管理、社会保险等各方面也缺乏相关扶持政策。尤其一些草根社会组织难以得到资金、项目、技术、人力的支持。西部地区的社会环境和行业环境都制约其发展,造成其动力不足,发展迟滞。

(四)社会工作服务缺乏多元文化敏感性

民族社区社会工作的发展离不开对多元文化的思考。不同于普通服务对象,少数民族群体在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文化艺术、宗教信仰等方面都有其特殊性。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如果不能理解和尊重服务对象的文化背景,也将难以理解问题的成因,影响服务质量,甚至会产生一些矛盾纠纷,影响社会工作专业在民族地区的声誉。社会工作属西方舶来品,在我国发展属本土化阶段,由于民族文化、地区风俗等环境差异,民族地区社会工作陷入再次本土化的困境。同样的问题,在其他地区可能并不凸显,但是在民族地区有可能就是一个忌讳的事物。社会工作者如果不能充分理解服务对象的文化背景,服务中就容易产生偏差。民族地区是一个多元文化地区,民族地区文化形式多种多样,从衣食住行,到观念价值、宗教信仰等,都不同于其他地区。社会工作就要具备多元文化性,学会运用潜在社会资源,以实现社会工作服务目标。

三、发展民族社会工作,需从四方面着手

面对社会工作发展的这些“阻碍”,推动社会工作发展,综合分析,笔者认为需从四个方面着手。

(一)建构社会工作发展体系:链接学科、职业、行政三个板块

民族地区发展社会工作,就需要形成一个健全

的体系,这其中离不开学科建设、职业规划和行政助力三个板块。民族社会工作的学科发展是提升社会工作专业能力的关键。依照实践经验,民族地区社会工作人才培养应就地培养,将专业特色与地区发展联系起来,做到“对口”培养,按需培养。尤其是近几年民族地区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数量不断增加,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向好,对人才的需求量增加。对口的培养不仅能够推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能解决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在课程设置上可以将地区多元文化、地区社区实践加入进去,使课堂学习与社会实践有机结合,更有利于学生的职业转变。当前是一个信息化时代,不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拥有大量的经验知识可以分享和借鉴。为了更好地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社会工作需要有自己的发展特色,需要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发展经验,探索自己的发展路径,形成中国特色社会工作。

职业板块是检验社会工作专业能力及体现其社会价值的重要部分。如何推动职业发展,需要将其放置到整个社会治理之中,嵌入到地方社会治理之中,社会工作是有专业技能的服务者,与其他行政工作相比在社会治理中有其特殊的功能。其次,经过学科培养,社工专业学生拥有了多元文化敏感性及对地方知识的了解,面对服务者及其问题,能够更容易充分做出“诊断”,更好地提高服务质量,在工作中做到游刃有余。最后,建立科学专业的职业评价指标体系,是推动社会工作职业走向成熟的标志。

行政助力是国家和政府推动社会工作的力量,不仅与行政工作功能进行互补,也有利于提高其合法性。我国的社会工作主要是在民政系统下发展,但是由于功能重叠、政策支持力度不强等原因,呈现出社会工作角色和地位不明确的问题。民族地区社会工作服务地区发展,需要地方政府对其充分的肯定和重视,以各种方式给予其发展机会。特别是体现在社会政策方面。当前社会政策逐步由政治性向民生性转变,社会政策制定也需要与社会工作服务相结合,间接推动社会工作的发展^[20]。社会工作也是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重要手段^[21]。社会工作因其服务于弱势群体的特点,一方面具备一定专业性,另一方面可以弥补刚性政策和刚性管理的不足。社会工作也可以推动平等的社会福利政策,完善社会保障体

系。在市场转型和社会变迁背景下,社会工作应当是以专业为基础、以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为取向的社会工作^[22]。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也需要将社会工作纳入公共服务中,由于民族地区的特殊性,社会工作在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中也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社会工作的行政板块是为其提供合法身份的重要因素,给予行政工作以专业能力辅助国家和政府进行社会治理,也是推动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最有效的力量。

(二)社区社会工作:挖掘本土资源,激活主体能量,服务现代社区

首先,挖掘本土资源,提升少数民族的社区能力。社区能力提升包括经济能力和文化能力。前者是社区发展的物质基础,后者是社区凝聚力的精神基础。少数民族提高社区能力的关键在于提升其运用各种资源创造财富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赋予一个民族以创造性,帮助它实现自主发展。从内源性发展即本土知识的改变与外源性发展即外来知识与外来人在社区能力建设中的角色及作用的辩证视角看待社区能力提升^[23]。民族社区本土知识的运用,对社区长远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民族社区居民在语言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等都存在契合,社区社会工作需要有效利用本土资源激发社区活力,提高社区凝聚力。

其次,社区社会工作需要激活主体能量。社会工作是内外合力推动的结果,外部依靠现代技术、理念、方法,邀请有经验的专家、学者顾问进行指导,内部借用社区本土知识、资源,注重社区居民的主体性,发挥其自主创新能力,实现社区自治发展。关于社区社会工作,中山大学张和清教授指出近二十年的实践经验证明,不论是社区个案扶助还是社区发展都离不开社会工作,尤其是在社区贫困、文化建设、互助组织等方面,社会工作都发挥了重要功能^[24]。可见,社区社会工作是推动社区自治的重要力量。社区社会工作的行动主体是社区居民,社会工作者需把主动权交给社区居民,发挥他们的创新力,转变观念,意识到建设社区就是建设自己的家园。通过外在支持和内在激发,从“赋权”和“充权”角度,扶助和支持社区居民发展社区。

最后,社区发展要注重社区文化建设,形成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社区文化。民族文化所表现的精神特质是其他技术与文化不能替代的,是真正的根植于

民族文化与地方知识土壤中的一种能力。

(三)推动社会组织发展,形成社会工作行业支撑

社会组织属于服务型、公益性组织,发展社会组织可形成社会工作发展的行业支撑。推动民族地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就内部而言,需要完善已有社会组织的内部发展机制,规范其发展路径,组建社会组织运行发展的“硬件”和“软件”。就外部而言,资金需求是当前社会组织发展的最迫切的问题。地方政府可以购买社会组织在教育、医疗、文化、社区服务、社会领域开展的多种服务,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可在不涉及国家安全情况下,适当放宽对社会组织资金渠道的管理。对于社会组织的审批程序,应尽量降低门槛,简化注册手续。尤其是一些草根组织,其由于资金、人力不足等原因不能与一些较大规模社会组织相抗衡,可鼓励社会组织孵化与成长,推动民族地区形成社会公共服务生态环境机制。对于社会组织的监管,地方政府出台相应法规政策,形成有效地监管机制,监督社会组织的服务质量;并将社会大众监督纳入政府监管中,形成双向监管机制,推动社会组织程序的公开化、透明化。由于思维惯性,群众遇事一般是找政府,而对社会组织的服务比较陌生。政府部门应宣传社会组织的作用,推荐大众尝试接受社会服务,认识到社会组织的意义和功能。民族地区志愿者队伍规模并不大,志愿服务意识不强及社会志愿体制还不够完善。为此,政府应倡导志愿服务理念,完善志愿者服务机制。最后,发展社会公益事业,鼓励地方企业对社会组织的支持及帮助。这既有助于企业发展,也有利于推动社会组织发展。

(四)关注多元文化知识,提高社会工作服务质量

民族地区的社会工作服务,需要结合地区实际,关注多元文化背景。首先,对于少数民族服务对象,社会工作者需要充分认识民族文化传统的特殊意义。如藏传佛教是藏区信教群众生命活动的重要内容,是其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服务者需认真对待和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其次,提高社会工作者的服务质量,学会挖掘灵活运用本土资源开展服务。如在少数民族重要的文化节日,社会工作者可以借助这些文化传统观察服务对象,了解服务对象,借助节日形式开展服务。通过社区调查了解民族地区的社会网络支持状况,除正式组织、

非正式组织、家族关系之外的宗教信仰结构外,要了解对社区、家族有影响力的重要人物,如活佛、高僧、阿訇等重要组织资源,如教会、寺院、团契、兄弟姊妹等。最后,打破惯性思维,灵活调整社会工作服务模式,可借鉴其他领域经验知识。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发展滞后,但是宗教组织影响力大,在一些领域承担着与社会工作相似的服务功能。但它肯定不是现代的、科学的专业的社会工作^[25]。宗教的服务功能虽然不够专业,但是其累积经验和问题可供社会工作借鉴和反思,辅助社会工作者了解熟悉民族地区的多元文化、本土知识。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0-27.
- [2]郑杭生.民族社会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2.
- [3]王思斌,赛牙热·马木多.民族地区发展社会工作的族群视角【J】.甘肃社会科学,2013(4):1-4.
- [4]王旭辉,柴玲,包智明.中国民族社会工作发展路径:“边界跨越”与“文化敏感”【J】.民族研究,2012(4):17-25.
- [5]任国英,焦开山.论民族社会工作的基本意涵、价值理念和实务体系【J】.民族研究,2012(4):8-16.
- [6]王思斌.民族社会工作:发展与文化的视角【J】.民族研究,2012年(4):1-7.
- [7]陈世海,肖德芳.浅谈西部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困境【J】.社会工作,2006(11):18-19.
- [8]周绍宾,周林波.从西部地区社会工作职业化谈社会工作教育的境遇【J】.社会工作(学术版),2006(10):40-42.
- [9]古小波.西北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困境探析【J】.社会工作,2009(10):27-29.
- [10]李迎生.西方社会工作发展历程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学习与实践,2008(7):120-127.
- [11]罗兴奇,宋言奇.社会工作职业制度体系的本土构建——基于社会治理的视角【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5(5):185-190.
- [12]王旭辉.民族社会工作的合法性、实践价值及策

略性发展重点【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68-73.

[13]李迎生,方舒.中国社会工作模式的转型与发展【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3):101-108.

[14]王婴.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的发展历程与启示【J】.江苏社会科学,2002(3):48-52.

[15]张海.承认视角下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工作职业化研究——以喀什市为例【J】.社会工作,2018.6(3):11-22.

[16]薛荐戈.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法治化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5(3):41-44.

[17]唐文娟.民族地区社区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构建模式研究——以四川凉山彝区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2):24-28.

[18]李俊清,陈旭清.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发展及社会功能研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0(6):73-78.

[19]陆春萍.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发展的特点与治理【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135-138.

[20]王思斌.社会政策实施与社会工作的发展【J】.江苏社会科学,2006(2):49-54.

[21]徐永祥.社会工作——现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手段【J】.河北学刊,2007(5):67-69.

[22]王思斌.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新取向【J】.学习与实践,2007(3):5-10.

[23]钱宁.对新农村建设中少数民族社区发展的思考【J】.河北学刊,2009(1):138-141.

[24]张和清.社会转型与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J】.思想战线,2011(4):38-39.

[25]段继业.宗教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工作功能【J】.青海社会科学,2005(6):122-125.

责任编辑:常海哲

(上接第10页)

习体会,处级干部进行一次交流研讨、各党支部组织党员开展一次自学活动。以此推动全体教职工深入学习全会精神入心入脑。省委统战部副部长、院党组书记、常务副院长焦玉兰同志在读书班上作了宣讲报告和总结讲话,强调学院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人才培养基地、理论研究基地、方针政策宣传基地的重要作用,努力当好全会精神的学习模范、宣传模范、推动模范、践行模范,教学培训上出成绩、科研智库上出成果、管理服务中上水平。在全会精神引领下,努力加快我省统一战线人才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真正彰显政治学院的政治本色和政治担当。通过专题辅导学习,全院教职工充分认识了全会的重大意义、精髓要义,准确把握了2035年远景目标和“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的指导方针、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在读书班学习的交流研讨中,副处级副教授以上从理论、工作实践等多个角度阐述了自己对五中全会精神的理解。通过深入系统学习,进一步认识到《建议》的重大政治意义

总之,通过学习五中全会精神,甘肃社会主义学院全体教职工对全会的重大意义有了深刻全面的理解,切实坚定了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之上的决心和信心。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一个重要战略判断和重要战略要求,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远景构想,为未来我国应该怎样谋划发展指出了方向。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大国,其发展一定要有方向,方向错误就会南辕北辙。我国为什么在70多年的治理中不断创造奇迹,就在于能始终坚持坚定正确的方向。规划《建议》无疑具有指南针的引导意义,而坚持党的领导是保持社会沿着正确方向行走的指南针,是实现规划《建议》的制定和执行的有机融合、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重要法宝。我们要坚定跟党中央走的决定和信心,把思想、行动统一部署到党中央和省委的重大决策部署中,在服务“大统战”工作格局中进一步贡献智慧力量,一如继往地推动社会主义事业更好地发展。

责任编辑:张凤玲

改革开放以来甘肃藏传佛教寺院管理的成就与经验启示

闫脑吾 曹永萍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在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指导下,深刻总结我国宗教管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与时俱进研判国内外形势,进行了一系列具有伟大创新精神的探索和实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理论和政策体系。甘肃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因地制宜,根据甘肃藏区具体情况制定相关的地方政策和管理措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本文梳理甘肃藏传佛教寺庙管理的成绩并总结经验规律,以期对进一步提升藏传佛教寺院管理工作水平有所启示。

【关键词】改革开放 藏传佛教寺院管理 成就与经验

新中国成立以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协调处理好宗教与我国政治社会的关系,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并发展的基础性工作。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国际国内不断变幻的局势,党中央在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指导下,深刻反思管理宗教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进行了一系列伟大的探索和创新,正确研判形势并制定科学的宗教政策、法律法规,推进我国宗教的中国化发展,形成了我国宗教发展的良好局面。甘肃省委省政府因地制宜,认真贯彻落实宗教工作方针政策,推动藏传佛教管理向科学化、法治化方向发展,促进了甘肃藏区的和谐稳定和跨越式发展。实践证明,中央的宗教政策和法律法规是推动甘肃藏传佛教管理发展和甘肃藏区和谐稳定的价值论基础,甘肃省委省政府严格落实中央有关精神并探索适合地方的管理路径是取得巨大成就的方法论基础。

一、改革开放以来藏传佛教寺院管理的实践

甘肃藏区是我国五大藏区之一,藏传佛教主要分布在甘南州、武威市天祝县和张掖市肃南县等8个市(州)、27个县(市、区),现有藏传佛教寺庙239座,教职人员11000多人,活佛126人,信教群众约50余万。藏传佛教在甘肃的传播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

形成了分布广、教派全、寺院多、影响大的显著特点。特别是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拉卜楞寺系全国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六大寺院之一,历史上曾是安多藏区藏传佛教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现在仍为这一地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重点地区,在安多藏区乃至藏蒙地区有着很大影响,对甘肃藏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探索我省管理方法:1982年—1991年

1.积极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恢复藏传佛教寺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拨乱反正,制定正确的宗教政策。1982年3月《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通称“19号文件”)出台,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关于宗教问题的纲领性文件,科学总结了党在宗教工作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精辟阐明了社会主义时期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政策,重申了宪法以及党提出的并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科学处理宗教问题的观点和政策。甘肃省委省政府克服困难,严格落实中央文件精神,许多被毁、被拆、被占的寺院得以重建迁建还建;各类寺僧各归其位,一些曾经流亡和出走的藏传佛教僧人也纷纷回

作者简介:闫脑吾,男,甘肃社会主义学院民族宗教教研部副教授,博士。

曹永萍,女,甘肃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副教授。

归,寺院组织逐步建立;被停止的传统宗教活动也逐渐恢复;广大信教群众的宗教生活逐步回归正常。1982年拉卜楞寺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寺院逐步交由僧人管理,1986年,夏河县成立了甘肃省佛学院。

2.恢复寺院民主管理制度

藏传佛教寺院的基本格局得到恢复后,实现寺院民主管理成为重中之重。这一阶段的主要举措是:恢复藏区民主改革时期建立的寺院民主管理制度,经过民主协商,选举成立贫苦僧尼和爱国守法的宗教界人士组成的民主管理委员会,对各寺的经济、行政和宗教事务进行民主管理。

3.恢复活佛转世制度

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一种制度,是保持藏传佛教传统和进行人才更替的主要宗教仪轨,是藏传佛教非常重要的内容。甘肃省对这一制度给予高度重视,一是组织人力物力对现有活佛及待转世活佛开展了扎实的调研核查工作。二是为一大批在文革受冲击并在政治方面表现良好的活佛恢复了名誉和地位,给予生活和政治待遇,将其中德高望重的活佛充实到各级政协、人大和佛协中,使他们能够充分体验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三是拨出一定的经费帮助活佛恢复寺院建筑。通过这些举措逐渐去除了文革造成的人民政府反对宗教的负面影响,使活佛们对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充满信心,并通过活佛在藏区的权威地位,对藏区广大信教群众宣传和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藏传佛教寺院依法管理的探索和实践:1991年—2008年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宗教领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和情况。为此,中央进行了相应的调整,1991年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6号文件);1993年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做了关于宗教工作的讲话;2005年又适时颁布《宗教事务条例》(简称“条例”);2007年9月1日由国家宗教事务局颁布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施行。这些政策、会议及条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宗教管理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主要是确立了新时期宗教工作的指导思想和重要原则,指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理宗教问题的大方向,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1.建立和完善法规制度,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

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需要,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是指政府依据有关宗教的法律、法规对宗教事务和宗教政策的贯彻落实进行管理和监督。一方面使宗教活动纳入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另一方面也不能以行政手段干预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宗教团体的内部事务。

自1991年6号文件发布以来,宗教工作实际上在积极探索如何进行规范化、法治化的管理进程。尤其是2005年《条例》颁布以来,政府对宗教的依法管理进入快车道并且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中央层面,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的规定》等两部行政法规,国家宗教事务局出台10多部部门规章,地方制定60多部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全国性宗教团体制定了系列与《条例》相衔接的管理制度。宗教事务管理实现了有法可依,宗教事务的法律框架进一步建立,成为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成部分。

其中,理顺藏传佛教寺院财产归属问题是最主要制度改革之一。这一时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宗教事务局关于《寺院房屋产权归属问题的报告》中提出的意见,明确规定“寺院除了个别确实系私人出资修建或购置的小庙,仍归私人所有外,其他房屋的性质均属公共财产,其产权归宗教团体佛协会所有。僧侣一般有使用权,但无权出卖、抵押或互相赠送。任何使用、占用单位或其他机关团体都不能任意改变其所有权,按照有关精神落实政策,产权归还各宗教团体”。这就从法律上确定了藏传佛教作为组织团体对寺院及其公共财产的所有权与使用权,以物权形式保证了藏传佛教对寺院的自我管理权。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据政教分离的原则,必须落实寺院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产权政策,以维护其合法权益。

2.充分发挥藏传佛教爱国宗教团体的作用

充分发挥藏传佛教爱国宗教团体的作用,是进行藏传佛教管理有序进行的重要环节。甘肃省在宗教管理中把宗教团体的建设作为重要一环落实。一是引导宗教团体与党和政府在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支持和帮助他们加强自身建设,按照自身的特点和规章自主地开展活

动。二是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鼓励和支持他们办好以自养为目的的生产、服务和社会公益事业并帮助他们解决办公用房、经费以及一些地方教职人员生活方面存在的困难,为他们开展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三是指导宗教团体加强思想建设、制度建设和组织建设,鼓励和支持宗教团体更积极、有效地参与宗教事务管理,发挥协同和自律作用。四是通过培训等教育手段,经常对教职人员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时事政策、国家法律法规等教育,强化僧人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坚持宗教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的自觉性。

3.健全藏传佛教寺院管理机构

宗教组织按科层体制进行管理,其内部组织具有科层制的典型结构,其运转也是由科层制“逻辑”所控制的。藏传佛教寺院在寺管会以下设置了两个类型的科层管理模式。一个是具有现代组织特征的机构和部门,如财务管理委员会。另一个是具有传统特点和内容、专门负责寺院佛事活动的管理序列,这个序列与当代管理模式相匹配相衔接进而形成了类似现代的科层制。除了内部科层制管理外,从外部对藏传佛教寺院进行管理和引导以形成长效管理引导机制,也是宗教管理中国化的实践探索。在党和政府的管理下,从省级到寺院所在地的基层政府,均逐级建立了完善的管理网络,形成了与之对应的管理科层制,实现了党和国家对藏传佛教管理的长效机制。

由于宗教政策贯彻得当,这一时期藏传佛教发展积极健康。1999年底全省藏传佛教信教人数为50万,2008年增至59.5万,占全省总人口的2.05%;1999年底全省藏传佛教传统寺院已全部恢复开放,共有藏传佛教寺院271座,2008年增至277座。与建国前相比较,这一时期,藏传佛教内部基本不存在教派纷争,各教派能相互尊重,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经历了文革之后的拨乱反正,这段时期的藏传佛教各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自觉接受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积极参加社会建设事业,开展佛教文化活动,赞助公益事业,积极适应新形势,实行自养,藏传佛教和其他宗教和谐发展,与政府关系趋于和顺。

(三)藏传佛教寺院管理的创新与发展:2008年以来

2008年西藏拉萨“3.14”事件之后,根据中央决策和省委安排部署,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加强党委

政府对藏传佛教寺院的管理,引导藏传佛教寺院管理向制度化方向发展。尤其是十八大以来甘肃省委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治藏兴藏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了藏传佛教寺院管理的新发展。

1.理顺完善藏传佛教寺院管理体制

2008年3.14事件发生后,甘肃省委省政府开展了对藏传佛教管理的大调研和大走访,梳理了藏传佛教寺院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漏洞并制定相应的对策,使得寺院管理具有科学、严谨、务实的程序和依据,从源头上预防类似事件再度发生。

一是强化寺院和宗教部门的管理职责。强化统战部门作为党委职能部门的责任,为把握好党的民族宗教方针、政策的执行,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供政治保证。宗教部门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是行政执法主体,要切实负起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责任。二是实行传统与现代结合的二元化管理。根据藏传佛教发展的长期性和特点,吸收藏传佛教传统的管理模式和当代组织管理模式,对藏传佛教寺院进行有效管理。积极引导藏传佛教寺院以寺养寺,鼓励和扶持寺院发展生产自养事业。三是理顺管理机制,实行属地管理。把宗教实体作为一个社会单位,纳入地方管理,通过这个机制逐渐将寺院和僧人纳入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范畴,赋予基层政权组织对寺院的管理权限,使藏区对藏传佛教寺院的管理实现了县、乡、村三级宗教事务管理网络。在此基础上进行属地责任管理,形成了由党委政府负总责、统战部门相协调、民族宗教及各相关部门依法管理、各乡镇村组织属地管理的“以块为主、条块结合、明确职责、分工协作,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社会管理工作格局。除了大型寺院归县、市政府管理外,小寺院由乡政府直接管理。如夏河拉卜楞寺院由夏河县人民政府直接管理,其它寺院则由所在乡政府管理。乡政府所在寺院设有乡政府驻寺院工作组,负责寺院的法制宣传和政策引导。藏区工作领导小组和市、县级统战部门定期到寺院就宣传政策、依法管理、公共服务、联系僧众、指导工作等五项职能的履行情况进行检查和督导。

2.创新藏传佛教寺院管理模式

藏传佛教的特殊性在于其宗教仪轨等内部管理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和传统特征,这是保证其自身传承的内在特性。但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组织实体,要

融入现代社会就要求在组织形式方面必须进行创新,因此引导藏传佛教寺院以现代组织的规范性参与社会成为了一项重要任务。

(1) 完善寺院僧人信息管理

实行僧人住寺和“两证”制度。对于现有活佛实行常住寺院管理,颁发活佛证。积极做好宣传引导工作,提高广大僧尼和信教群众对“两证”的认知度;加强“两证”的管理与使用,使其在宗教活动、社会保障和教职人员生活补助费发放等方面发挥作用。不断完善信息资料,对符合信息采集要求的教职人员的信息资料进行全面调查和补充完善,如建立僧人档案、请销假、外来僧人登记等制度。做到应办尽办、即办。

(2) 积极探索藏传佛教寺院制度化管理

依据宪法和相关的法理法条,推动藏传佛教寺院管理进入制度化、法治化、科学化的轨道。帮助和指导藏传佛教寺院建立健全民主管理制度、学习制度、财务公开制度和文物管理制度,形成按制度办事、按制度管人的机制;加强寺管会班子建设,强化寺管会职能作用,确保寺院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爱国爱教人士手中;认真落实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央关于正确处理宗教矛盾纠纷的要求,建立矛盾纠纷挂牌销号制度、信息报送制度、督察落实制度;实行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严格落实责任,力争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处理在基层;坚持在打击和抵御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活动进行渗透上下功夫。

另外,为了加强藏传佛教寺院佛事活动管理,甘肃省探索和完善了藏传佛教法会管理制度。小型法会由寺院按藏传佛教惯例自主选择自行管理。对大型宗教活动,完善其管理机制,建立健全备案制度。对法会的审批、主持人员、参加人员、法会举办场地设施条件、预案制定等方面进行了相应规定。坚持属地管理、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在具体管理上又采用了“群众管群众,僧人管僧人”的自治管理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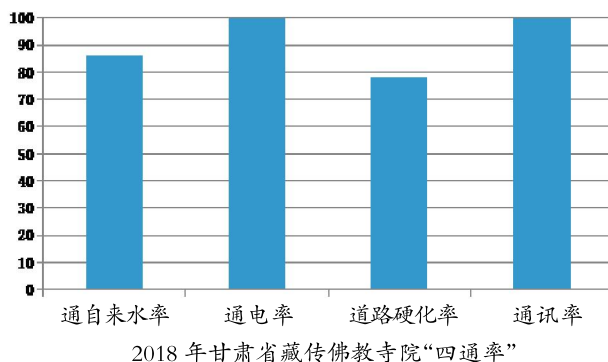
(3) 提升藏传佛教寺院社会化管理水平

藏传佛教寺院管理模式从传统到现代的主要表现便是实行社会化管理。一是将藏传佛教寺院全部纳入公共服务范围,提升对寺院的公共服务水平。如甘南州信教民众约有40万人,住寺僧尼10331人。当地2015年启动“舍舍通”项目,总投资884万元人民币,总共在全州的115座寺院,实施了6299

户僧舍的覆盖,每户配制了一套村村通设备和一台28寸的液晶电视机,僧侣们可以收到54套电视节目和20多套广播节目。全州藏传佛教寺院实现了广播电视100%覆盖。

三是将寺院以单位对待。明确提出把寺庙作为基层社会单位对待、把僧人作为普通公民对待、把寺管会按照村级组织对待、把寺管会成员按照村组干部对待等“四个对待”要求,以社会事业单位对寺院进行管理。并以此要求寺院建立规范的事业管理规章制度,使之既承担社会责任又相对享受社会服务权利。

四是为教职人员提供社会保障。按照国宗局等五部委《关于妥善解决宗教教职人员社会保障问题的意见》(国宗发[2010]8号)精神,为全省藏传佛教僧人全部办理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参保率达100%,将43%的僧人纳入“低保”和“五保”,实现了应保尽保,僧人养老问题得到基本保障。甘肃省天祝县首创老年僧侣退寺养老机制,对年满60岁的僧侣办理了退寺养老手续,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或纳入“五保”范围。



3. 加强教育培训

对藏传佛教僧人尤其是寺管会成员进行教育培训,培养更多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刻起作用的宗教界代表人士。一是以开展普法“六进”活动为契机,组织僧尼学习《宪法》《刑法》《宗教事务条例》等法律法规。二是结合十九大精神的学习宣传,在全省宗教界开展“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中华文化、学习法律法规,做合格宗教教职人员”的“三学一做”学习教育和“宪法和法律法规、国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宗教活动场所的“四进”活动。2014年—2017年每年通过中央、省、市、县参加政治培训的藏传佛教教职人员在2500人以上。三是通过建立寺院学习小组,定期开展集中学习、座谈讨论、辅导讲座等政策

理论学习。通过这些学习活动帮助宗教界人士树立遵纪守法、爱国爱教意识,引导宗教界坚持中国化方向,不断树牢正确的国家观、宗教观和文化观,为维护藏区稳定奠定牢固的思想基础。

二、政府管理藏传佛教寺院的政策特点及逻辑

(一)从粗放型向精细化管理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藏传佛教寺院管理较为松散和粗放,一方面未形成有效的一级管一级、层层抓落实及条块管理的科层级别的管理体系,在管理权限和行政隶属等方面无具体规定,许多管理工作无具体对应的管理单位,因此相应的责任和权限不明。另一方面缺乏具体的法律法规作为依据和参照。很多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大型宗教活动管理都无章可循。随着藏传佛教管理领域内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凸显,藏传佛教管理必须实现科学化、精细化。甘肃省吸收藏传佛教传统的管理模式和当代组织管理模式,在藏区探索实践形成了县、乡、村三级宗教事务管理网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属地管理。通过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使藏传佛教管理更加规范化,寺庙管理水平显著提高。

(二)从单一管理向多元主体治理迈进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了“社会治理”的理念。“治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建设和管理的模式,追求的最高目标是“善治”(good governance),即在现有的社会关系中运用行政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及其社会组织等各种活动,并让这些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其中也包括宗教活动,最大限度地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这种治理方式以其多元主体参与、分享其治理智慧,社会交往优势明显,通过提高治理主体的素质和主观能动性,极大地减少了社会资源的浪费。过去对藏传佛教的管理大部分靠政府的强力推动,造成政府管的过多过宽,还养成了藏传佛教自我管理的惰性。新时代条件下,宗教管理改变了传统的将政府管理机构看作藏传佛教管理的唯一主体的观念,注重发挥藏传佛教寺院自身及一些相关宗教团体的主体作用,让这些组织在宗教事务管理中扮演和发挥政府所无法起到的角色和作用,有助于促进藏传佛教寺院管理向现代治理方向发展。其中,政府只需做好方向引导、政策指导以及为宗教活动提供相应的社会化服务等功能。如寺院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责是认真落实僧尼持证住寺、寺院定员管理、宗教活动审批、寺院财务监

管、寺管会班子考评五项制度。通过民主选举,实现了僧人自治,降低了因少数人垄断形成管理层固化而对寺院造成损失的寺院管理风险,也为将优秀管理人员选择到管理岗位创造了制度保障。

(三)由依赖政府管理向培育内生动力方面转变

藏传佛教的一些宗教传统和观念造成了藏传佛教对于现代管理的疏远,由于藏传佛教管理的大部分工作依靠政府的强力推动,导致政府对藏传佛教寺院管理过多过细,有些难免存在政府管理越过宗教事务界限的问题。过于依赖政府管理的局面促成了藏传佛教自我管理的惰性,造成了事倍功半的管理困境,导致藏传佛教寺院内部无法培育形成现代管理的内生动力。加之寺院管理中存在一些不良影响问题,比如寺院的管理组织和规章制度不健全,管理不规范,未能真正履行职责;少数教职人员爱国守法的意识淡薄,受境内外分裂势力的影响,与党和政府离心离德;有的寺院盲目发展,超出了自身容纳限度以及自给自养能力,给当地信教群众造成了较大的经济负担,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藏传佛教宗教活动的正常秩序,扰乱了藏传佛教寺院开展的正常教务活动,使信教群众的宗教生活受到一定影响。这些问题的凸显提示人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藏传佛教寺院作为一种社会组织,要在党和政府的管理引导下发挥藏传佛教寺院管理的主观能动性,培育激发其内生动力,转变单方面依靠政府管理的被动局面,是实现宗教事务管理良性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政府要引导藏传佛教寺院向制度化、规范化发展,政府只需提供相应的社会化服务即可。当前藏传佛教寺院良性发展的局面正在逐步推进,但提高包括藏传佛教寺院高水平的自我管理能力,尚需要藏传佛教寺院自身和各级管理部门持之以恒不懈努力。

(四)从人治管理向法治化管理挺进

受计划经济体制下传统行政思维及我国宗教法律法规不完善的影响,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藏传佛教寺院管理存在着人治现象。一些管理缺乏科学严谨的调查论证,缺乏稳定性、长期性、战略性的研究,致使藏传佛教管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管理混乱且可持续性差。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断健全和完善,藏传佛教管理逐渐走上了制度化、法治化的科学路径。具体实践中,首先是召集藏传佛教管理部门、藏传佛教界人士参与制定研究普遍适用于藏传佛教各教派寺

院的制度,通过这些制度规定寺院组织行为和个体应该遵循的集体标准。其次,督促寺管会将这些制度上墙并跟进学习,使这些制度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保证寺管会机构的正常运行,有助于实现组织的规范化运作。比如建立财务管理制度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藏传佛教寺院管理机制是由政府上下级隶属管理与属地管理相结合的科层制管理和寺院主持佛事活动的传统管理模式的结合。完善、健全的管理机制是实现藏传佛教和谐稳定发展的体制保障,对于促进藏区长治久安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四、经验与启示

(一)构建组织载体,加强党对藏传佛教工作的领导

随着时代的发展,广大僧俗群众信仰需求趋向多样化,藏传佛教寺院管理法制化、民主化、科学化的需要日渐突显,特别是互联网的广泛运用,对党和政府提出了互联网时代加强藏传佛教管理的新课题,对政府加强引导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对治理新理念的接纳,将使原来依靠行政命令的传统管理模式向社会化协同化治理转变。当前,藏传佛教寺院管理工作已经成为党和政府开展新时期藏区群众工作的重要载体,藏传佛教寺院管理已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党的政治领导、密切党群关系、更好地体现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新领域、新途径,成为维护藏区稳定,实现藏区长治久安的有力抓手。可见,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新形势下加强藏传佛教管理工作的现实需要。改革和优化藏传佛教寺院内部管理,提升寺院领导班子现代管理水平和能力素质,除了依靠藏传佛教本身的提升力和推动力外,最关键的还是要发挥党和政府在佛教管理方面的领导力和引导力。为此,要完善组织载体,建立健全藏传佛教寺院“分级负责、属地管理”的新机制,加强党对藏传佛教工作的领导,使基层党组织在藏传佛教寺院管理中更好发挥作用。

(二)优化顶层设计,强化对藏传佛教寺院管理的引领和保障

顶层设计由于其高屋建瓴的战略眼光,往往成为某一行业发展的体制性推动力。甘肃藏传佛教管理所取得的成绩,与党中央审时度势准确研判宗教发展的形势任务,并及时制定出台相关政策息息相关。如2005年出台的《宗教事务条例》,明确规定了宗教团体的职能,为党和地方政府服务管理好宗教

事务、贯彻落实好党的宗教政策提供了明确依据,是甘肃省依法管理藏区藏传佛教寺院、制定各项规章制度、规范化运作的参照系,改变了宗教管理因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而陷入被动的工作局面。又如定期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及时对边界安全和发展及藏区的发展进行全局性研判和布局,将甘肃藏区作为边疆整体发展战略中的重要部分,为甘肃藏区及藏传佛教寺院管理在大一统国家边界中发挥应有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战略性的思路,促进了甘肃藏区与其他藏区及边疆的协调发展。

(三)发挥统一战线优势,创新藏传佛教寺院管理体制

统一战线的主题是大团结大联合,求同存异是其基本原则,在创新社会管理中能够起到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的作用。一方面,运用统战工作的艺术和策略,体现亲和力,多做解决困难的实在事,使藏传佛教教职人员和信众真心认同党和政府。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人大、政协、佛协等平台引导广大寺院加强沟通、协商,增进共识,更好地促进寺院治理和谐稳定,有助于确保藏传佛教寺院社会管理的效果更加深入、更为持久。为此,要坚持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统战宗教部门协调和寺院管理委员会、政府有关部门依法管理的领导工作机制,充分发挥统战、宗教部门统筹、协调和组织作用,会同州、县佛教协会,与政府其它部门建立健全会议议事制度,通过联席会议集中智慧,统筹推进寺院管理创新。

(四)加强宗教管理干部队伍建设,提升藏传佛教寺院管理水平

提高藏传佛教寺院管理水平,重中之重是需要一支懂宗教熟业务的管理干部队伍。尤其对于民族地区,一把手是否懂宗教工作、懂民族工作,对于民族地区宗教治理乃至社会综合治理关系甚大。习近平总书记说,“要加强对党关于宗教问题的理论和方针政策的学习,加强对宗教基本知识的学习,把党关于宗教问题的理论和方针政策纳入干部教育培训计划,使各级干部尽可能多地掌握”。

一是充分利用媒体及相关宣传阵地,开展学习宣传工作,切实提高各级干部、各界群众对宗教政策法规的认识,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二是通过定期培训、研讨、年度闭卷测试等多种方式强化各级宗教管理干部的学习动力, (下转第41页)

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及其培育路径

——以安徽省阜阳市为例

彭建涛

【摘要】党的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是改革的痛点,也是发展的难点。乡村振兴,不仅是物质的振兴,更是精神的振兴。乡贤文化是一种软实力,一直以来在促进乡村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我们必须重视新乡贤文化的建设,发掘新乡贤的时代价值,探索新乡贤文化的意义和培育措施,对于当下乡村治理和基层文化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乡村振兴 新乡贤文化 时代价值 培育路径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宏伟目标,描绘出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大美图景。乡村振兴的关键不仅在于人才振兴,更是文化振兴,激活精神。当下,用好新乡贤资源,发挥新乡贤群体作用,激活乡村文化建设,对助推乡村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乡村振兴下新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新时代,如何发挥新乡贤的积极作用,探索新乡贤文化的意义和培育措施,奋力书写让人民满意的时代答卷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必考题。

(一)新乡贤概念的提出

乡贤这个名称最早出现于东汉末年,乡贤文化建设在这个时期渐渐进入了自觉阶段,一些在乡村社会建设、民风教化等乡村公共事务中有作为、有担当、有贡献的乡绅或贤良人士,被称为“乡贤”。正如明代汪循所言,“古之生于斯之有功德于民者也,是之谓乡贤。”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乡贤文化,不仅是地域性的精神文化标记,还是连接故土、维系乡情的精神纽带。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即这支队伍不

仅包括有一技之长懂农业善致富的能人,更包含一腔热血爱农村、一片仁心爱农民的心系乡土的贤人,他们与我国古已有之的乡贤群体有高度契合之处。“新乡贤”一词是近几年才兴起的新词。“新乡贤”一词始于韩雨村2011年发表的《新乡贤治村》一文。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在对《“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进行讨论时,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钱念孙提出让官员、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告老还乡”助推乡村振兴,引发社会对新乡贤的热议。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培育“新乡贤文化”。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更是对深化村民自治实践明确提出“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民革中央提交了“关于进一步发挥新乡贤作用,促进乡村振兴”的提案,提案指出“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人才振兴,新乡贤作为一支德才兼备的贤能人士队伍,具有突出的人力资本优势。”2019年安徽一号文件也明确提出“发挥新乡贤作用”。由此可见,党中央国务院和地方都是高度重视新乡贤文化,也反映出新乡贤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二)新乡贤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

新乡贤文化是以新乡贤为基础,以政府和地方组织为主导,以贤、德、能为核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作者简介:彭建涛,男,中共临泉县委党校高级讲师。

价值观服务于乡村振兴的新生文化。它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对焕发乡村社会活力,激发乡村振兴建设的热情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1. 弥补“两委”不足,优化乡村自治结构

在乡村治理中,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逐步推进,村“两委”掌握的资源日趋丰富。乡贤参与到村务监督,能充分发挥乡贤在村级事务中的监督作用,在规范基层治理、资源管理中起着重要作用,切实维护村集体和广大村民利益,促进村“两委”工作高效率开展。同时,新乡贤具有“地熟、人熟、事熟”优势,能充当村“两委”的沟通者,第三方角色有助于化解村支部和村委会工作中的不和谐因素,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增强村“两委”的工作协同性。再者,新乡贤主体身份覆盖面广,在村民中有一定的威信,深受村民信任,有些事情交给新乡贤来处理,往往比行政层面的推动更有效。

2. 弘扬“主流”价值,推进乡村文化发展

一是传承和发展新乡贤文化,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新乡贤文化与乡贤文化一样,不仅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保护者和弘扬者。乡贤文化中蕴含的仁、义、礼、智、孝等观念,在非常大程度上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传承和发展新乡贤文化,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也是乡村文化建设的现实需要。二是传承和发展新乡贤文化,有助于重塑文明乡风。当下,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使原有的乡村文化日渐衰微,乡村社会精神信仰缺失、人际关系走向冷漠、生态问题较为突出,而封建迷信、铺张浪费、赌博等传统陋俗时有发生,如农村婚丧嫁娶大摆宴席、铺张浪费等频频出现,这与当下乡村振兴建设要求不符。新乡贤凭借在乡村的威望,其“嘉言懿行”又接地气、扬正气,可以引导和影响乡风文明,使村民在潜移默化、你效我仿中延续农耕文明、涵育文明乡风。

3. 推动“三农”发展,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新乡贤文化从文化内核出发,逐渐延伸到乡村的政治治理、社会风气、经济结构等多个方面,形成了全方位、全领域的新型文化氛围。从农业到工业再到服务业,新乡贤给乡村注入了更多新鲜的力量和创新的想法,在乡村创业创新发展中发挥着主力作用。同时,新

乡贤文化加速了农村的新旧动能转换,在融入产业发展新鲜活力的同时,也解决了贫困地区的人才储备问题,对于解决贫困地区内源性发展能力的缺失问题具有重要作用。新乡贤文化的发展,可以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理念带回乡村,新乡贤能够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帮助农民了解国家的最新乡村政策,传授最先进的生产经验和技巧,帮助农民接受新思想、新技术,带领乡村走向现代化的道路。

二、培育和发展阜阳市新乡贤文化存在的主要问题

良好的文化环境是推动新乡贤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提。推动新乡贤文化建设发展的目的正是在社会中形成一种对新乡贤的积极的、正面的、统一的认识,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但文化建设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新乡贤文化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转变社会观念、政府行为、个体行动等多方面入手,解决新乡贤服务于乡村治理和乡村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问题。

(一)传统乡贤认识观念与新乡贤文化建设需求之间存在矛盾

中国的乡贤文化已经存在了数千年,其传统认识观念对人们的思维影响根深蒂固。乡贤是从乡村走出的成功人士,其学识水平、道德水准和成就令乡人敬仰,但由于他们长期远离故土,与故土的很多关系例如土地关系、户籍关系早已断裂,他们回归乡村,如无特殊情况,对于乡村中的事务多抱以“旁观”态度,其参与是缺位的。有些被称为新乡贤的人士只是“挂在墙上”,发动并借助新乡贤力量真正推进乡村振兴的平台载体不多、实效性不强。而从村民视角看,也多视回村乡贤为“客体”,虽有敬仰之心,却并无心理相通之感。村民与乡贤之间疏离的关系若不能及时得到改善,将会影响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如期完成。可见,传统的乡贤观念认识囿于自发性,已不能很好地服务于新型乡贤文化建设的需求。

(二)传统乡贤服务方式与新乡贤文化服务要求之间存在矛盾

长期以来,传统乡贤在服务于乡村的形式上虽然不断变化,但归结起来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通过自身的道德情操和成就为村民树立精神典范,影响村民的道德水准,激励村民努力上进,从精神引领上为乡村服务;二是通过提建议、做参谋的方式为乡

村建设服务。这两种方式虽然曾对乡村发展产生过一定的作用,但并没有充分发挥乡贤的主观能动性,更没有尽其才、展其能。乡贤的传统服务渠道单一,很多时候服务渠道并不畅通。服务平台缺乏、服务方式僵化单一的状况,禁锢了乡贤们充分发挥自身信息、资源、技能方面优势的积极性,无法达到乡村振兴战略中充分调动利用一切力量的要求。目前全市只有少数乡镇推进开展,村级层面只有颖泉区闻集镇大钱营、阜南县王化镇王赛村等个别村在自主开展,新乡贤群体无法形成助推乡村振兴的整体合力。

(三)传统乡贤激励机制与新乡贤文化发展需求之间存在矛盾

传统乡贤回归故里多是告老还乡,都有退隐的心理,加上又有稳定的收入,因而更希望自由自在,并不愿意过多地承担乡村具体事务。即便是他们愿意对乡村建设作出贡献,也仅仅是出于乡情。当前由于乡贤工作机制不健全,目前阜阳市市级层面没有出台与新乡贤相关的指导意见、实施方案等设计规划,基层在新乡贤的培育、选拔、认定、树立上缺乏统一标准。由于乡贤激励机制的缺失,导致传统乡贤主动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不足。而根据人本主义者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们都有获得他人尊重和社会认可的心理需要,他人的尊重和认可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激励机制。可见,传统的乡贤激励机制的缺失不利于吸引更多的乡贤参与乡村建设,不能有效地激励乡贤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潜能。这与让新乡贤在乡村建设过程中带动农村精神文明和经济建设、引领乡村建设等目标相距甚远,不符合现代乡贤文化发展的要求。

三、阜阳新乡贤文化培育和发展的措施

(一)建立健全“引得回”长效机制,要抓好顶层设计要及时研究出台新乡贤文化培育工作指导意见,制定年度工作规划,健全新乡贤文化建设机制;要确保在市、县和乡镇层面分别成立新乡贤工作服务中心、各行政村建立联络处有专人负责和落实。通过优惠的政策、精简的审批、精细的服务,吸引在外打工的“候鸟”回乡创业,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二)积极打造“留得住”创业环境

一是研究制定优惠政策。根据本地资源、市场、交通等综合情况编制投资项目,为返乡创业人员在投资项目审批、用地、税收、金融等给予优惠政策,为项目推介、创业培训等提供优质服务。二是优化配套

服务政策。建立健全新乡贤住房保障机制,在住房申请、环境美化、公共服务等方面优先考虑新乡贤,让他们居有定所。建立健全新乡贤就医保障机制,协调建立医疗保障绿色通道,提供文化娱乐场所,尽可能地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为新乡贤发挥作用创造条件、铺平道路。

(三)有效提供“信得过”工作平台

一是参与乡村社会治理。以共商、共治、共享为目标,探索建立“村两委+乡贤会”的村庄治理模式,优先选拔各方面均突出的新乡贤进入村“两委班子、担任村“两委”顾问等制度。二是参与农村产业振兴。积极动员引导新乡贤以项目回迁、资金回流、智力回乡等方式反哺家乡投身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以产业、项目、就业等方式与经济薄弱村开展对口帮扶,加强农村乡土人才培育。三是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积极发动新乡贤争做移风易俗、乡风文明的模范,组建“乡贤宣讲团”,开设“乡贤讲习所”,开展“乡贤精神进礼堂”等活动,提振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精气神。

(四)努力营造“传得广”文化氛围

一是建议由相关部门牵头成立乡贤文化学术社团,专门挖掘整理本地乡贤文化史料,出版相关专著、研究专著,对本地先贤编史立传,提炼乡贤文化精粹,加强乡贤遗迹整修保护。二是加强舆论宣传引导。大力宣传展示新乡贤风采。举办主题展演活动,以小品、戏曲、电影等喜闻乐见文艺形式再现新乡贤的嘉言懿行。三是推进乡贤风尚传承。建议建立本地名贤名人馆等,集中展示本地古今名贤风采。同时,结合传统节日开展瞻仰乡贤故居、探寻乡贤足迹、弘扬乡贤精神等活动,营造崇贤尚德氛围,提升群众对乡贤文化的认知与传承。

(五)处理“干得好”几个关系

一是新乡贤与村民、村“两委”的关系。新乡贤是乡村治理的一种有益补充,在操作层面要定位好新乡贤与村“两委”的地位和关系,既要防止村民只接受新乡贤意见而完全忽视村“两委”作用的倾向,也要防止新乡贤及乡贤组织替代村“两委”的倾向。二是新乡贤治理与乡村法治的关系。新乡贤治村更多地是依靠伦理道德等非权力影响力,而乡村治理关键还要依靠制度、法治,因此要防止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以言代法、以道德影响力代替法律的倾向。三是富乡贤、官乡贤与文乡

贤、德乡贤的关系。富乡贤、官乡贤在推动乡村振兴方面的作用相对明显而往往更受重视,而文乡贤和德乡贤的作用往往因不能立竿见影而受到忽视,这有违当前推行新乡贤文化的初衷。因此,要引导基层全面认识各类新乡贤作用,充分运用好各类新乡贤资源优势,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

乡村振兴,不仅要振兴产业、振兴生态、振兴社会,更要振兴文化、激活精神。新乡贤文化集中体现了乡村社会的传统人文精神和历史文化底蕴,并且蕴含时代发展的力量,只有培育新乡贤文化,重视乡村文化,才能为乡村振兴提供持续不断的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马瑞.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新乡贤参与路径研究[J].改革与开放,2018(21).

[2]祁红亭.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与思考——以浙江省海宁市为例[J].贵阳市委党校学报,2018(12).

[3]梁新莉.新乡贤反哺:乡村治理文化路径选择[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

[4]张露露,任中平.乡村治理视阈下现代乡贤培育和发展探讨[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8).

[5]张福如.论乡贤资源的有效运用——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视角[J].岭南学刊,2018(2).

[6]王泉根.中国乡贤文化研究的当代形态与上虞经验[J].中国文化研究,2011(4).

[7]石珍.“新乡贤”对乡村发展的价值[J].党政论坛,2017(4).

责任编辑:常海哲

(上接第37页)

提高业务水平,突破工作瓶颈。三是民族地区州、县、乡级一把手和宗教部门负责人的配备至少要有一名懂民族宗教工作者。可在任用前通过适当方式考察宗教政策理论和相关知识,将其作为任用的基本条件之一,彰显政府对社会治理科学化精细化的目标要求。

(五)建立联合调研机制,推动藏传佛教寺院管理向纵深发展

当前统一战线和藏传佛教寺院管理每年都面临大量的新情况、新问题,而政府相关咨询和研究机构的课题和调研在选题和研究上不能有效对接,无法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撑,使宗教管理实践和相关政策理论研究呈现两张皮,一定程度上造成国家资源的浪费。建议每年年初举办由政府管理部门和甘肃社会主义学院等教学科研单位参加的协调会,政府宗教管理部门列出需要调研和解决的问题清单,结合省级、国家社科项目申报工作,对未入围国家社科的选题,可以匿名评审择优选择那些切中我省宗教管理实际问题和解决方案的选题,加以适当资助,引导科研机构和人员加强对宗教管理实践相关问题的关注和研究。

(六)强化互联网应用,探索寺院管理新路径

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是一个自媒体,都是一

个移动的宣传平台。微信朋友圈中随处可见的佛教文化教义宣传、经文讲解、网上祈福等个性化的活动,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藏传佛教寺院管理。积极研究和探讨互联网时代藏传佛教寺院管理模式的路径,既是党和政府的任务也是寺院自治必须予以应对的问题,在运用互联网进行寺院管理的同时,要注意防范和抵制不利影响。一方面要通过加大教育和宣传力度,使每个僧人树立良好的应对互联网信息流的基本素养,提高其对政治和社会谣言以及不良信息的鉴别能力。另一方面,通过互联网学习国家方针政策和佛学知识,并与外部社会进行学术、思想方面的交流,使广大僧人真正成为互联网的受益者。同时,要积极利用互联网促进寺院管理方式的创新,提高寺院管理现代化、科学化水平。

基金项目:2018年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课题《川甘青接合部藏区藏传佛教寺庙管理现状、困境及对策的实证研究》(ZK20180207)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闫丽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 的必要性及路径研究

汪倩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十九届四中全会分别提出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会议上的讲话,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显得尤为必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我国宗教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浸润滋养与丰富建构的双向互动关系。目前学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文化母体浸润滋养我国宗教的分析尚有不足。本文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的必要性进行深入挖掘,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是有特点、有优势、有贡献的,并且在具体坚持路径上总结六个方面的现实做法。

【关键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浸润 宗教 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古老中华文明的精华部分,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并持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人文精神、厚德传统为底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滋养着宗教,是文化复兴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增强文化自信,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必然要求;当今社会面临西方文化侵略、意识形态渗透以及打着宗教旗号的“三股势力”的威胁,要团结群众尤其是信教群众,亟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讲好中国故事、树立好中国形象,也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包容性滋养性匡正性等特点优势,在外来宗教文化进入时不排他,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也有一定的贡献。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的必要性分析

(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是文化复兴

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增强文化自信、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必然要求

文化复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又是文化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人文精神、厚德传统为底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文化母体始终浸润滋养着宗教。

从政治文化层面来说,先秦时期的文化就具有协和万邦之特色。周朝自建立起,它的政治理想就是一个中心王朝和四周封建诸侯之间的互相协调,这是包容精神在早期社会政治文化层面的反映。正如唐君毅所说:“周代之书中,更多有‘仪刑文王,万邦作孚’(《诗经》)、“万国咸宁”(《易》)、“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易》)之语……此种政治意识之本身,有一艺术性之和谐精神灌注。”^[1]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鲜明特点带有和谐的艺术精神,宗法伦理在现实生活中,都在遵循一种有礼有序的规则。宗教文化方面也不例外,尤其对待外来宗教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样起着一种包容滋养匡正调节的作用。

此种意义上,从宗教自身发展来说,用中华优秀

作者简介:汪倩,女,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讲师、博士。

传统文化浸润宗教,是给予宗教一种滋养,提供一个沃土,让宗教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之下,具有中华文化的精神烙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德包容品质也影响给宗教,从而更加增强宗教的文化内涵和生命力。

(二)当今社会面临西方文化侵略、意识形态渗透以及打着宗教旗号的“三股势力”的威胁,在团结群众尤其是信教群众方面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曾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从国家文化安全角度来说,文化具有意识形态性,意识形态是文化的政治观念形态,是文化发展的一种高级形态。而文化具有意识形态性,主要就是从政治和宗教意义上来说的。宗教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可以跨国的,这和国家意识形态不同,但却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国家间意识形态冲突,也会造成严重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问题,进一步会影响到国家安全。亨廷顿曾指出的,最危险的冲突是沿着文明的断层线发生的那些冲突^[2]。比如2013年夏天发生在埃及的世俗力量和穆斯林之间爆发的冲突最终导致的国家危机就属于这一类型。

回想上个世纪西方列强在蚕食侵吞中国时,他们也并没有放松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侵略,列强往往通过所谓“教育”的方式,进行文化侵略、思想控制。据有关数据显示,光绪二十六年(1900)天主教在华已有代牧区37个,教徒74万,教士1356人,其中外国传教士886人。这些外国传教士大多披着宗教的外衣,向当时的中国人民灌输奴化思想,使中国人民“服从基督”,忍受列强的侵略而从心底不反抗。为什么教育文化成为列强侵略的重要的方式之一?美国传教士曾说过:“不论哪个社会,受高等教育文化的人都是已有势力的人们。”正是因为这些人“能控制社会的感情和意见”,如同“一支燃烧着的蜡烛,别的人要跟着他们的光走”。光绪三十二年(1906),伊利诺大学校长德蒙詹姆士在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也曾说:“如果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

这一代的中国青年人,哪个国家就将由于这方面付出的努力而在精神的和商业的影响上得到最大收获。”^[3]通过宗教进行思想的麻痹和控制,是西方列强霸权主义、侵略行径的一种方式,有时候甚至比武力侵略造成的损害更大,范围更广。

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这所谓的“三股势力”站在世界人民的对立面,是当今国际社会和许多国家都曾普遍遭受到的安全威胁。比如“东突问题”,就是利用宗教的外衣,对新疆进行渗透,鼓吹战争,这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宗教文化安全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有研究者曾指出这种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途径,传播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煽动宗教狂热,利用宗教冲击国民教育……利用现代传媒手段加强从国外向境内进行各种形式的宗教文化宣传渗透……境外敌对势力利用伊斯兰教对新疆进行规模渗透,鼓吹排斥异教徒和与异教徒进行斗争^[4]。这里涉及到话语权的问题。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其演讲《话语的秩序》里所述:“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掌握了对世界秩序的整理权。”^[5]而掌握话语权,同样需要一种文化精神的引领。毋庸置疑,如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就会使大批迷惑其中的信教群众,看清是非、不被利用,将社会危害减至最低。

(三)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讲好中国故事、树立好中国形象,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习近平总书记站在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高度,围绕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坚定文化自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增强国际话语权、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诸多问题,就讲好中国故事这一主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就是让讲话精神更好落地实施。

正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和根基,宗教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厚德向善为主要精神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的宗教,是被赋予鲜明民族特色的,成为中华民族文化气质与精神支柱的重要组成部分。

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在国际交流中,有助于我们把握时代大势,不断提升国际的传播能

力和水平,更好向世界介绍中国,更好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能够更好地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讲好中国故事、树立好中国形象的指示。

(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容滋养,在面对外来宗教文化进入时不排他,与宗教共同发展延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曾反复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钱穆曾认为“文化传统,便是民族一部生命史”^[6]。

中华民族主体文化具有包容接纳的特征,仅从宗教关系来说,也是用文化精神协调各宗教关系,主流社会以儒家温和兼容的人文主义宗教观对待宗教并协调宗教关系,各教以温和包容的宗教思想发展自己和对信仰的他者,形成宗教多样性和谐共处模式^[7]。这种和谐共处模式实际上也与中西文化精神的形成有一定的关系。唐君毅在《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书中认为:战争与商业模式影响了西方文化精神的形成,农业与和平模式影响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形成^[8]。从中西文化精神形成的角度来说,向往和平、渴望安定的农业生产生活模式影响了中国文化包容厚德特质的形成。与以战争和商业模式影响的西方文化精神相比,中国文化精神本质上不具有侵略性,相反它具有接纳包容性,当外来文化输入时,它是在用自己的文化精神包容外来文化,匡正不符合中国文化传统的极端方面,影响外来文化并与其共同发展。

这种滋养是相对柔和与乐于接受的。历史上,那些企图以非本土的带有掠夺和占有欲甚至邪恶用心的某些外来宗教,或打着宗教幌子的某些“教义”,从古至今也没能在中国发展起来,甚至出现信教群众集体反对的现象,这种“宗教”在中国必定没有出路。今天,在团结信教群众、更好地服务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征程中,中华文华包容滋养外来宗教的特性,应该得到关注。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的特点优势

(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有特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具有鲜明的特点,不是强制输入,不是凌驾之上,更不是委曲求全,而

是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柔性魅力,将更符合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思想理念浸润宗教。中国历史上延续至今的几大宗教在遇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均展现出巨大张力,主动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在丰富自身的同时丰富并建构了中华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具有柔性浸润、主动接受、丰富建构的特点。具体体现为:

1. 柔性浸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与厚德传统,具有有容乃大的个性。作为中华文化母体中的精华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宗教的浸润往往是无意识的,以慈爱、贵和、尚德、忠恕^[9]等思想无意识地浸润宗教。无论是本土宗教还是外来宗教,都不可能屏蔽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过程是浸润,是缓慢地给予滋养。

2. 主动接受

这里的主动接受,主要是指宗教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动接受。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宗教为了自身发展,总是在不停地发展信教群众,拓展更广的活动空间。作为影响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和观物方式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更多数人认可的一种准则,那么合乎人们观物方式生活方式的宗教自然会得到更多人的信奉,相反不符合或站在中华文化对立面的宗教往往也不被中国信教群众接受。

历史上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就印证了这一点。佛教,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滋养打磨下,以更具中国文化特点的宗教赢得了发展的空间,并且影响了日本韩国等东南亚诸国。近代史上基督教曾作为列强蚕食中国计划的一种手段,终究为当时的人们抛弃。伊斯兰教也是如此,明清回儒们提出“二教同源”说,认为伊斯兰教的教义与儒家的纲常伦理同出一源,把伊斯兰教忠于真主的教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忠君忠父结合起来,才是穆斯林的义务和对真主的功业。有学者曾指出:中华文化所提倡的“和而不同”并非毫无原则的折中主义、大杂烩,也不是各种文化平排并列、无序堆积,而是有明确的主体性的,即必须符合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10]。总之,外来宗教在尊重中华文化的基础上便能很好地得到发

展和延续,倘若强硬地抛弃中华传统一味散播扩张理念注定步履维艰。

3. 丰富建构

这里主要指宗教在中华传统文化浸润滋养的基础之上也丰富建构了中华传统文化,有些还成为了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曾指出:“能够延续至今的宗教,都经历了与所处社会文化的深度融合。一部中国宗教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宗教逐步融入中华文化的历史。”^[1]自封建社会,儒释道三家文化就在不停地与中华文化碰撞融合的过程中,摒除掉被中华文化淘洗掉的部分,参与丰富建构了中华传统文化。

(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有优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的特点也决定了其优势。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与厚德传统,更注重文化的教育感化作用,更为关注人自身的觉悟和修养。在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里,开明君主亦大多重视文化发展。同为文化的一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一种柔性浸润的方式,让宗教主动接受并积极参与到中华文化的建构当中去。这正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的优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的一个最大优势,就是既不希望流血牺牲的强性输入,也不一味排他,而是春风化雨地向一种更高文明学习与提升。牟钟鉴在解释中国宗教“多元通和”模式的时候,他说“中国宗教之间总体和谐,中国没有发生过流血的宗教战争,没有宗教裁判所。”^[2]甚至各种类型和各种层次的宗教在中国还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彼此沟通、彼此学习。在这个意义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是对世界的贡献、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助力。

(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有贡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的特点和优势,又决定了这种浸润对世界文明做出了贡献。

1. 坚持文化本位,发扬真善美的价值追求。在中国,宗教一般不介入政治、商业等。宗教亦坚守文化本位,积极弘扬宗教文化中的艺术、民俗、文学等人类文明,主要进行真善美的价值宣传。

2. 致力于慈善,有利于人自我价值实现和社会健康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德观念,和宗教义理中的惩恶扬善、慈悲观念共同致力于社会和谐健

康发展,成为积极正能量的宣扬者和践行者。

3. 丰富发展社会科学,繁荣社会主义文艺。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实现这个伟大事业,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下,宗教界人士可以更深厚的宗教学识及文化自信,更积极地发展文化艺术,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

4. 展示中国形象,增强国内外文化交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对内能加强包括港澳台的整个中华文化的交流,以此增强国家、民族、文化的认同。对外,一方面吸收学习国外优秀的人类文明成果,一方面有助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性传播,增加和平的意愿,增加团结的愿景,展示好中国形象。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的现实路径

(一) 依法规范宗教义理阐释,重视中华文化沃土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支持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的同时,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宗教文化作为中华文化和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依规对宗教义理进行阐释,是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也是延续中华文明和宗教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宗教义理阐释,是推动宗教发展,争取信教群众的重要环节。宗教义理阐释是否依法依规,深刻影响着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幸福。但规范宗教义理阐释,应是一种新的诠释,是做到宗教教义教规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水乳交融^[3]。中国宗教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社会文化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启示着宗教义理,宗教义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找寻文化根源,必然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认同。

(二) 加强人才培养,建立文化界与宗教界沟通交流机制体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必须重视人才和交流体制机制。文化需要交流,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如何发掘其中既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能浸润滋养宗教的部分,需要相关人才;研究宗教追求真善美的文化价值属性,以及宗教界推

出更多的文化艺术家学者等,需要相关人才;在灿若星海的文物典籍中,发现整理研究我国宗教文化也需要相关人才。比如今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中医药在这场人民抗击疫情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宗教典籍中对很多中医治疗疫情经验的记载,需要专业人才进行梳理整理,这既是一笔文化资源,更是一份社会责任。

另外,我国宗教文化资源涉及到民俗学、艺术学、文化学、社会学、医学、哲学、文学等各个领域,对于满足人们群众的精神需求而言,需要相关人才。整理文化、传播文化、弘扬文化都需要人才,而人才需要交流。定期召开文化与宗教的学术交流、学术会议,加强研究人员之间的流动平台建设,需要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使真诚从事传播宗教文化的教徒、研究宗教文化的学者和弘扬宗教文化的艺术家们,向人们和社会贡献更多的文化文艺佳品,发挥宗教追求真善善美的价值效应。

(三)以宗教文化促进社会文化繁荣,推进宗教活动社会公益化发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若宗教能够有效地发挥其文化属性,则有益于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繁荣。有学者认为,重视宗教的文化属性,能够拉近宗教和社会的距离,使远离烟火的宗教找到适宜发挥作用的领域,尤其在哲学、伦理学、生态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等领域^[4]。宗教界信教人士和相关学者,在推进服务社会的公益慈善事业方面可以大有作为。比如鼓励宗教界人士、相关学者和信教群众等在政策和法律范围内进行敬老助残、爱心助学、扶贫济困、生态环保等方面的工作。

传统宗教道德注重行善积德的正功能,以真善美为价值导向,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步骤一致,追求相近。推进服务型社会建设,扩大志愿者队伍,使宗教活动的社会公益化倾向进一步发展。

(四)宗教界活动和对外交流需以中华文化为认同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宗教界对外交流需要以中华文化为认同。这种文化认同是具体的,是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比如宗教活动应重视中华传统节日的文化底蕴。世界上很多节庆大典都起源于宗教,中国许多传统节庆也和原始宗教信仰是分不开的。像春节、

元宵节、灶神节、腊八节、中元节、中秋节等等,在我国传统文化中都是影响范围比较大、影响时间比较久远的受宗教信仰影响的节日。“腊八节”就受影响于佛教的佛成道日;“元宵节”受影响于道教的上元日;多数的“庙会”来源于道教集会或者道教的法事活动等。在宗教活动中,重视中华传统节日的文化底蕴也是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渠道之一。

(五)有层次有区域有针对性地开展宗教文化艺术活动

从人类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宗教,让宗教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契合的部分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可以有层次有区域有针对性地开展宗教文化艺术活动。有学者曾指出,“宗教不单是一种精神信仰,还是一种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是社会历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要从人类文化发展史研究世界宗教,从中华文化发展史研究中国宗教”^[5]。文化界与宗教界沟通交流要以讲座、演讲、参观等活动方式丰富之。以文化艺术活动的方式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宗教之间的默契,是一种温和的能够充分引起情感认同和提高艺术美学修养的方式。通过艺术活动的方式,找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德包容与宗教积德扬善的主流价值观念的有机连接点,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六)努力打造正能量的宗教新闻传媒及网络平台建设

随着时代的发展,新闻传媒与网络平台的建设,使地球成为一个信息传播上的村落,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更加便捷也更为直观。积极正能量的信息能够带来交流和进步,负面消极的信息则会催生社会矛盾,增加不稳定因素。规范化的宗教网络平台,对于团结群众,惩恶扬善功能的发挥具有重要意义。而缺失规范化管理的宗教新闻传播途径也面临着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甚至会成为蛊惑人心、煽动群众,造成社会动荡,影响人们幸福生活的罪恶之源。为此,努力打造正能量的宗教新闻传媒及网络平台建设,显得尤为紧迫。

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实现文化复兴乃至民族复兴的一个重要环节;

(下转第50页)

崆峒山《老子八十一化》及壁画的文化意蕴

于贵平

【摘要】陇山支脉崆峒山主峰老君殿内的《老子八十一化》壁画,极具深厚的文化意蕴,值得人们深入研究并加以阐发。笔者初步认为,其文化意蕴体现在:《老子八十一化》及壁画蕴含了高超的绘画艺术和审美价值,是道、佛两教和儒学深度融合的文本依据,记载了中华先民的生活情状和劳动创造过程,文字和构图有极其丰富的想象元素,包含了民族和国度间大融合的思想,突出了道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核心地位。《老子八十一化》及壁画在陇山支脉崆峒山的存在,明示陇山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先河地位。

【关键词】崆峒山 《老子八十一化》 壁画 文化意蕴

陇山支脉崆峒山主峰老君殿内,有制作精美的壁画,其内容反映的是《老子八十一化》的全部内容。尽管年代久远,但色彩仍不失绚丽,线条仍不失优美,且形制宏伟而生动。将化名、画作、化文三者对照,对化文原文加以翻译并做阐释,我们发现,《老子八十一化》及其壁画具有极其深厚的文化意蕴,其文化价值值得人们深入研究并加以阐发。

一、崆峒山及《老子八十一化》壁画

崆峒山是道教圣地,距甘肃省平凉市区12公里,传说黄帝问道于在崆峒山修仙的广成子,因此被称为道家第一山。崆峒山大面积的伏羲故里平凉市静宁县成纪文化城,是中国人文发源地之一。崆峒山海拔高度在1456—2123.5米之间,垂直高度为667.5米,是陇山的支脉,属于上三迭系紫红色尖硬砾岩构成的丹霞地貌。崆峒山是天然动植物王国,森林覆盖率达90%以上。其间峰峦雄峙,危崖耸立,似鬼斧神工;林海浩瀚,烟笼雾锁,如缥缈仙境;高峡平湖,水天一色,有漓江神韵。

因此,早在秦汉时期,崆峒山已有了人文景观。以后历代陆续兴建,亭台楼阁,宝刹梵宫,庙宇殿堂,古塔鸣钟,遍布诸峰。明、清时期,人们把山之名胜景观称为香峰斗连、仙桥虹跨、笋头叠翠等“崆峒十二景”,基本恢复了历来所称的“九宫八台十二院”中四

十二处建筑群。其峰林耸峙,危崖突兀,幽壑纵横,涵洞遍布,怪石嶙峋,蔚岭郁葱,成为既有北国之雄,又兼南方之秀的自然景观,被誉为陇东黄土高原一颗璀璨的明珠。《史记·秦始皇本纪》说:二十七年(前220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焉”(鸡头山、千头山、笋头山为崆峒山之别称)。贞观二十年(646年)十月,唐太宗李世民来陇山视察马政。《新唐书·太宗本纪》记载:“丙戌,陇山头,次瓦亭,观马政”。李世民看到崆峒山佛事大盛,御赐明慧禅院田宅,这是崆峒山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情。

值得一提的是,在崆峒山最高峰,有一座老君殿,内有年代久远的壁画,它就是《老子八十一化》图,壁画作者无从考证。《老子八十一化》图源于“老子化胡”说,在崆峒山最初绘制于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道光19年可能进行过一次修复,因为北壁几处画面色调与原色调不符,距今已有400多年,修复后也有170年。现存老君殿南北两壁的壁画,是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老子八十一化》图道教文物之一。2013年5月3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老子八十一化》图诞生于13世纪。它以图像的方式诠释了被道教引以为豪的“老子西出化胡”的故事,成为老子化胡说在金末元初新的传播形式。《老

作者简介:于贵平,男,中共平凉市委党校教授,统战理论教研室主任,《平凉论坛》副主编。

子八十一化》图因《老子化胡经》而声名彰显,也因在1255年佛道辩论失败后遭受禁毁而一度从世人的视野中消失。百余年后,复出的《老子八十一化》图带着新的特点在一定区域内流传着,今天还能见到为数不多的版刻经本、壁画、石刻等遗存。目前,以胡春涛于2011年所著博士论文《老子八十一化图研究》的综合性研究成果较为全面。该著作系统观照了这套图的遗存状况、源流关系、历史脉络、图像结构、宗教内涵等;在大量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从《老子八十一化》图的实物资料出发,结合历史文献,综合其他宗教故事图像,在佛、道消长关系的背景下以及道、释两教与儒学的融合过程中,重构《老子八十一化》图产生、发展、隐退、复出的历史;以图像的存废、复出为脉络,展现这套图像与宗教、政治和人们信仰之间的关联;揭示这套图在图像特征、叙事方式等方面与佛教故事的密切联系;同时展示道教图像和佛教图像在表现方式上的互动关系。此前,由平凉市文化局原局长甘成福,于2006年4月主编的《崆峒山道教八十一化壁画》画册,以彩绘版展示了《老子八十一化》图的全貌,由化名、图画、化意原文、化意今释四部分构成。有幸的是笔者曾以主要作者之一,参与了该书的责任编辑和化意今释的写作。

这就是说,佛教早期依附于道教,演化成“老子化胡”说,肇始于东汉末年。对《老子化胡经》,道、佛两教时断时续地争论不休。到宋代,宋真宗袒护《老子化胡经》,又使之兴盛一时。至宋末,有人据“化胡说”附会出“八十一化图”。已知图中第42化为老子化“摩尼图”。摩尼教也称“明教”、“明尊教”、“末尼教”、“牟尼教”,乃古波斯宗教,武则天时,传入长安。自42化出现后,摩尼教更加依附道教,及至将其教义经典接二连三地混入了宋代官方的《道藏》。另一则为第15化“住崆峒”,由此可见崆峒山在道教中的特殊地位。

2006年,我们编写《崆峒山道教八十一化壁画》画册时,对老君殿化名画幅拍照后,多方寻找《老子八十一化》化文未果,当时,百度网上也只查到前四十化的原文。所幸在天水市玉泉观找到所编《太上老君八十一化》石刻本,于是,我们将名、画、文三者对照,断句并翻译编成该书。

有意思的是,崆峒山《老子八十一化》壁画并非八十一化,而是八十二化,第八十二化因文字脱落不知化名,画幅似道士携儒释两者向东方朝拜什么,在此留疑供有心者考证。另各版本化名与化意差异之处甚多,在编写画册时,化名化文以天水市玉泉观所编《太上老君八十一化》石刻本为主,参照百度网据语义修改成文。

二、《老子八十一化》及崆峒山壁画的文化意义

《老子八十一化》图是根据老子的形象,想象生发塑造的,主要讲述老子的生前、诞世、仙后三个阶段五个方面的内容。即开天辟地——历为帝师——降生尘世——化胡归道——羽化显圣。现在,我们从化名、画幅、化文三方面切入,认为《老子八十一化》及老君殿壁画的文化意义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美学意义——《老子八十一化》及壁画蕴含了高超的绘画艺术和审美价值

《老子八十一化》图色与线的运用非常纯熟和精练,在人物的行、住、坐、卧的举止言谈中展示人的心灵境界,从面部、眼神、姿态、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人物与环境的关系、局部情节与主体人物的关系等方面,表现出人物发自内心的神情风采,塑造了大量富有艺术生命的人物形象,营造了引人入胜的艺术境界,创造了中国式绘画的写实风格。具体体现在:一是造型与变形。壁画中有神灵形象和俗人形象之分。这两类形象都来源于现实生活,但又各具特点。从造型上说,俗人形象富于生活气息,而神灵形象则变化较少;从衣冠服饰上说,神和俗人都为中原汉装。壁画继承了传统绘画的手法,巧妙地塑造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动物和植物等形象(如第二十七化)。变化的方法是夸张变形,以人物原型进行合乎规律的变化,额骨显露,眉目间距加大,显然区别于黄色人种。嘴角上翘(如第三十六化),画像横向夸张,加粗肢体,缩短脖项,头圆肚大,棱眉鼓眼,强调体魄的健硕和超人的力量。二是线描和赋彩。线描和色彩作为我国传统绘画艺术的语言,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和表现力,用多色繁杂的笔墨,塑造出个性鲜明和内心复杂的人物形象。壁画全面继承了中国工笔绘画传统,肢体用秀劲圆润的铁线描,厚重的衣纹用折芦描,蓬松的须发用游丝描,以不同的线描表现不同的质感,

增强了形象的真实感。壁画继承了传统的赋彩规律,着意表现物体的固有色,追求复杂的光化色;强调色彩装饰美,追求色彩的真实感;在复杂的色彩中,精心设计了对比、衬托以及叠晕,使彩色交光互映,相得益彰。晕染是老君殿壁画使用色彩表现立体感的重要方法,画面有凸有凹,丰富了笔画的技法,创造了兼有装饰性和立体感的人物形象。三是装饰性构图。壁画装饰性构图总的特点是“满”。所谓“满”,就是结构复杂,很少留有空白,类似西洋油画特点。但是,满而不乱,井然有序,每化都有整体结构,主题画摆在易于观赏的重要画面,其余内容互相配合,构成一个完整而有节奏的立体艺术结构。

(二)宗教意义——《老子八十一化》及壁画是道、佛两教和儒学深度融合的文本依据

《老子八十一化》第三十四化“说浮屠”是老子讲佛经,第四十七化“叹犹龙”是孔子赞老子,第四十八化“扬圣德”是老子扬儒学。这表现了中国儒释道之间的深度融合,堪称世界文化之奇迹。儒释道有一个共同点,是相融因缘之,这就是一元化的思考,一统的观念,即“和为贵”和而不同。正因为这样,所以对所谓的“终极关怀”我们都不是先验的,不是“预设”的,而是从实践中总结提升的。例如孔夫子把人生中最高的境界定义为圣人,要做到圣必须高而又高,他则“若圣与仁,则吾岂敢”,直到死还在努力地践行着,追求着。道教最高的境界是真人,在道教经典中,道家对真人的要求也和儒家对圣人的要求相近。而佛教,它的最高境界就是佛。佛教讲应该“十行”、“十住”,攀登“十地”,只有到“十地”才可以和佛陀接近。第四十六至第八十一化,说的是老子在春秋战国、汉魏、唐朝时期显化异像,弘道度人,传经说法,济世拯民等。大致是春秋战国时期显圣8次,汉魏时期显圣11次,唐代显圣17次。这些故事主要讲的是:孔子问道于老子;度阳子、沈羲、李真多、王岩冲等成仙;与四大真人、五世神君等神仙交往;授道于吉、张道陵、寇谦等经卷戒录传道;还与汉唐帝王神交,并应帝梦降圣阁、现三泉、云龙宫、传古砖等无处不显,以示神灵,以彰神通。由此,我们看到了道、佛两教和儒学深度融合的文本依据。

(三)历史意义——《老子八十一化》及壁画记载

了中华先民的生活情状和劳动创造过程

第六化至第十七化,说的是太上老君历为帝师,上三皇为玄中法师,下三皇为金阙帝君;伏羲时降于田野,号郁华子;祝融时降于恒山,号广寿子;神农时降于济阴,号大成子;黄帝时降于崆峒,号广成子;少昊子复降崆峒,号随应子;颛帝时降于衡山,号赤松子;帝喾时降于江滨,号绿图子;帝尧时降于姑射山,号务成子;帝舜时降于河阳,号尹寿子;夏禹时降于商山,号真行子;殷汤时降于潜山,号锡则子。传真经,授隐文,判阴阳,分道化,造书典,教稼穡,制礼乐,造器皿,叙人伦,感文明,推动历史发展,促进社会进步。

(四)文学价值——《老子八十一化》及壁画的文字和构图有极其丰富的想象元素

俄国作家冈察洛夫说:“想象力是结合艺术品里一切因素的能力,它把各个不同的因素塑造成一个整体。”美国哲学家杜威说:“想象永远是艺术家的手段。”想象可以把抽象的哲理或感情变成具体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来,通过想象创造出的艺术形象可以突破概念语言的束缚,把不可言说或言说不尽的领悟和感情倾注于其中。在《老子八十一化》壁画中,一个个生动具体的艺术形象又以其感性形态激发着读者的想象,给人们以暗示和启迪,将观赏者带入形而上的层面,从而进入到从“有”到“无”又从“无”到“有”的境界。而《老子八十一化》的文字则使读者产生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历其事、如触其物的真切感受。想象能够深化和强化审美情感,将人的情感与生命意识移注到这些审美对象上,将不具有人性、人情的对象通过想象外化为作家自己的心理感受。在此,作为文学创造客体的社会生活已被知觉化、情感化、生命化了。因此作家笔下的生活就不那么“客观”了,而是经过作家感觉的折光、情感的涂染、想象的修饰、心智的灌注、理性的过滤之后的社会生活。《老子八十一化》从化文到图画,使极其丰富的想象元素得以充分体现。

(五)民族融合价值——《老子八十一化》及壁画包含了民族和国度间大融合的思想

民族融合是两个对等的民族经过长期的共同性增长融为一体,民族差别得以最终消失,相互融合成

新的民族。迁移杂居互相通婚,各民族互相学习共同发展。也指全世界民族消亡的途径和方式。是全世界实现大同以后,民族特征和民族差别逐渐消失,形成一个没有民族界限的人类整体的历史过程。第二十七至第四十五化,说的是老子化胡,游诸国,集诸圣,演创教,降外道,施法术,赐丹方,使佛教邪途归伏。先后在月支国、迦夷国、天竺国、舍卫国等地显圣斗法,授书说道。《老子八十一化》及壁画全方位体现了不同国度和民族融合的思想,这就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

(六)哲学价值——《老子八十一化》及壁画突出了道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老子的《道德经》、孔子的《周易·系辞传》,都源出《周易》,《易》被列为中国文化的源头。换言之,道儒同源。在中国哲学中,道是寻求宇宙与人生的终极依据,是人类普遍性的精神需求。而中国人依据对此终极思考而形成道论。道作为宇宙万物赖以依托的终极存在,是中国人建构文化知识的逻辑起点,是支

撑价值体系的坚实根基。与其他文化体系中的终极依据不同的是,中国哲学之道具有天人一体、体用一源、古今一贯的思想特色。故道论体现了中国人对宇宙与人生的终极依据的独特思考。第一化至第五化,说的是太上老君,生无始,起无因,先天地,凝真气,自然而成,是混沌的祖宗、天地的父母,历经劫道,开天劈地,位列三宗,具有历史神话中所说的盘古的功能。这就是说,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形态。

小结:

综上所述,《老子八十一化》壁画在陇山之脉崆峒山的存在,明示陇山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先河地位。陇山不仅是地理上的界山,也是文化意义上的名山,如果说秦岭是中国南北的分界线,那么陇山则是中国东西文化交融的分界线。陇山文化作为丝绸之路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分界线,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这就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构想找到了文化(本)根据。

责任编辑:张敏芳

(上接第46页)

是区别打着宗教旗号的破坏势力,争取信教群众共同建设美好社会的现实举措;是讲好中国故事,树立好中国形象的关键步骤;是滋养与建构的双向互动。我们要准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的自身特点优势及贡献,繁荣中华文化,增强中国宗教的文化内涵和生命力,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 [1][8]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9、9.
- [2]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7.
- [3][4]胡惠林,胡霁荣.国家文化安全治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362.
- [5]米歇尔·福柯[法].规训与惩罚[M].刘北城,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29-30.
- [6]钱穆.中国文化精神[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9.

[7]牟钟鉴.继承中华人文主义优良传统建设当代中国特色宗教理论[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26.

[9]沈桂萍.用“团结统一”的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浸润宗教[N].中国民族报,2019-7-2(06).

[10]张践.和而不同与中国的宗教和谐[N].中国民族报,2019-5-14(06).

[11][13]王作安.涵养我国宗教的中国文化气质[N].人民政协报,2019-5-30(08).

[12]游斌,牟钟鉴.多元通和、经典互读与中国宗教间对话[J].民族论坛,2011(10):8.

[14]牟钟鉴.宗教要回归文化本位——宗教文化论述要[N].中国民族报,2013-11-19(06).

[15]牟钟鉴.宗教文化论[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33-40.

责任编辑:常海哲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日经贸合作

刘巍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为中日合作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机遇,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海上安全等领域的合作空间广泛。日本的产业界和企业界对合作持务实、积极的态度,希望分享经济利益,今后双方需要进一步改善双边关系,构建公开、透明、合理、有序的管理体制和合作平台,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加强经贸合作。

【关键词】“一带一路” 中日 经贸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在自身经济崛起和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出现调整的背景下,提出的新时期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新思维,更是实现“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构想。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经国务院授权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该实施细则明确了“一带一路”的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以及各地方的功能、定位。以此为标志,“一带一路”建设进入全面实施推进阶段。

众所周知,“一带一路”是以中国和周边相关国家强化经济合作为基点,并不断的向西延伸、拓展合作范围,直至与欧洲、非洲形成新的合作区域,它包含了东南亚、中亚、南亚、西亚以及俄罗斯、蒙古等国家和地区。但实际上,日本、韩国等东北亚地区也是“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对外经贸合作的主要方向。历史上,中国丝绸通过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分支—东北亚丝绸之路,从长安经由龙泉府(今珲春市),越过日本海到达日本国。而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除“南海丝路”,即从东南沿海经东南亚、南亚后延伸到西亚直至欧洲的海上贸易黄金通道外,另一条重要的路线就是通向日韩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即从山东半岛直通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直至东南亚的黄金通道。从历史脉络的延续

和传承的角度而言,日韩理应包括其中。从现实角度而言,尽管“一带一路”倡议意在向西,但其开放性和包容性决定了无法将日韩排除在外。中日、日韩之间虽然由于历史和领土纠纷摩擦不断,但中日韩三国间的经贸合作在三方的对外经济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中日两国利用“一带一路”融合,在区域合作框架下增信释疑,有利于中日在东北亚乃至亚太地区的利益诉求和互利共赢。

一、中日经贸合作现状

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中日两国经贸往来十分密切。近年来,中日两国贸易额不断攀升,2018年,中日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3175.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6.8%,中国已成为日本的第一大出口国和进口国。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整体也呈现上升趋势,中国成为日本海外投资第二大对象国。而中国对日本投资更是逐年递增,且上升势头强劲。两国人员往来密集,2018年,中国赴日游客人数超过800万人。应该说,中日的经贸合作处在较高的水平。

但随着中日关系的持续紧张和地缘政治的加剧,中日经贸合作水平呈现下滑趋势,特别是日本对华投资和来华人数明显减少。从2012年开始,中日双边贸易额连续三年下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更是急转直下,2014年大幅减少38.8%,下降至43.3亿美元,重回金融危机时的水平。近年,随着中日关系

作者简介:刘巍,男,中共辽宁省委党校(辽宁行政学院、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

的缓和,虽有所恢复,但总体而言不温不火。受中日关系恶化和厌华情绪扩散的影响,日本来华游客数量连续多年下降。与之相对照的是,中国对日直接投资迅速增加,当然与日本对华投资相比,中国对日直接投资整体水平还比较低。

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从日本方面来看,除了中国生产成本的上涨外,日本政府积极推进“中国+1”战略布局,有意引导企业投资转向是主要原因。例如,日本加快构筑珠三角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地区生产网络。对于纺织服装类企业,日本采取关停珠三角地区企业,将产能转移至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等国家;而对于打印机、复印机、照相机等电子产品,日本在维持珠三角地区原有产量不变的情况下,将新增、扩大的产能转移至周边国家,将珠三角地区定位为东南亚地区的零部件供应地。这样,日本对华投资减少及伴随而来的中日贸易额的下降也就成为必然。同时,日本民众受媒体渲染和政治气候影响,来华意愿和热情也在减弱。而很多中国人对于日本的现代化成就,解决资源短缺、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社会秩序等方面的良好示范高度赞赏,希望有机会到日本一探究竟。特别是对高质量、多功能、人性化的日本产品十分青睐,加之日元贬值赴日费用下降,中国人赴日游热情空前高涨。随着中国企业的成长壮大,走出去已成必然趋势。日本成熟的市场、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成为吸引中国企业赴日投资的有利条件,中国企业对日实际投资也水涨船高。

应该说,错综复杂的中日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日经贸合作,特别是日本对华合作态度,但双方仍然有较大的合作空间,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双方合作的领域、对象、方式、空间呈现多样化和扩大化,为中日合作提供新的机遇。

二、“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日经贸合作的广阔空间

回顾丝绸之路的历史,日本国内有一种说法,认为古代丝绸之路的东端一直延伸至日本。在丝绸之路发展最鼎盛的唐朝,日本的学者和僧人就曾远渡大唐,将中国隋唐时期的先进技术和卓越文化通过这条线路传到日本,并且带回很多中亚、西亚等地的宝物和艺术品,至今仍保存在日本古都奈良的古寺庙里。20世纪80年代在日本举办的“丝绸之路系列

展”吸引了众多日本民众的参观,而日本放送协会摄制的纪录片《丝绸之路》更是获得高收视率,引起不小的反响。可以说,日本与丝绸之路颇有渊源,日本国民对“丝绸之路”也有着美好的回忆。中日两国本身就存在着巨大的合作空间,如果从进一步扩大中日经贸合作等正面角度去思考和认识“一带一路”倡议,就会发现,“一带一路”倡议为中日开展合作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机遇,两国可以探讨加强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开展在亚洲金融货币、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等领域的合作,这样的合作会给日本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和好处,可以实现中日共赢。

(一)中日两国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有着广泛的合作空间

与美国企业没有太多的基础设施领域相关技术不同,日本是最具有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和经验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亚洲国家,日本都有合作项目。例如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就是中日在基础设施领域合作的典型。2013年日本政府提出的“日本再兴战略”和2014年日本政府公布的“新经济成长战略及长期政策蓝图”中,都将海外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今后日本获取效益的领域之一,日本企业也希望能在亚洲地区继续扩大相关业务。像日立、东芝、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日本企业的盈利重点都是基础设施领域。日立在欧洲、亚洲获得大量的高铁项目,东芝及三菱重工在海外频频拿到发电厂建设项目订单。此外,日本企业还积极参与项目的运营、管理、维修保养以及更新业务等。“一带一路”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先行。今后,“一带一路”沿线上,将会有大量社会基础设施项目开工,中日两国企业可以共同参与开发合作,将中国的价格、高效等竞争优势与日本的工程、运营管理技术优势相结合,形成合力走出去。例如,在高铁领域,中国在车厢、铁轨、桥梁建设等方面具有优势,而日本在车辆的牵引系统、制动系统等核心部件制造以及高铁运营、管理等方面竞争力强,双方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共同承担高铁建设工程。另外,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国在积极探索多元筹资的PPP模式,欢迎国内外民间资本投资“一带一路”PPP项目,日本民间资本也可以参与其

中,获取收益。

(二)中日两国可以充分利用“一带一路”的物流通道扩大经贸合作

长期以来,日本一直致力于在亚洲各地通过政府援助(ODA)和利用民间资本改善当地的公共基础设施,进而改善当地的投资环境。而“一带一路”倡议正是致力于通过完善基础设施而实现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这一点两者并无二致,“一带一路”将促进日本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海外贸易。例如,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已经启动“一带一路”合作,建立了物流基地,该基地货物三成是来自日本的汽车零部件和电子元件,为日本企业进入中亚市场,扩大市场份额提供了便利条件。而随着“辽满欧”、“渝新欧”、“苏新欧”等连接中国、中亚和欧洲的物流通道的开通,日本到中亚、欧洲的物流又有了新的更好的选择。与传统的海运相比,日本利用海铁联运通道,到达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以及欧洲的运输时间将从3周缩短到5天以内,极大地提高了运行效率,并且降低了运输成本,增强了产品的竞争力。对于中国而言,更有加强中日合作的理由。目前,“辽满欧”、“苏新欧”、“渝新欧”等物流通道面临着盈利问题,要提高盈利能力,需要增加国际班列返回时的运量,因此,可以考虑充分借助这些物流通道,发挥部分港口向日出口的中转功能。例如,欧洲的产品可以通过“辽满欧”海铁联运通道运至辽宁营口或大连,再通过船运方式将产品运至日本,这种合作对于中日是双赢的局面,对于日本而言缩短了进口时间,对于中国而言增加了跨国铁路的盈利能力。

(三)中日两国可以加强海上安全合作,确保海上物流通道安全

以马六甲海峡为中转的亚—非—欧路线是日本海上国际贸易的主要通道,日本也希望确保该通道的安全与稳定。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海上贸易之路,即开通和开拓海上贸易之路,确保海上交通运输的安全通畅。中日两国完全可以在从日本到西亚地区的广阔海域上,打造出利益共享的安全与合作机制,这符合域内各国的利益,有益于促进区域的和平与稳定。具体而言,双方通过参与沿线各主要港口的公共设施建设,形成新的海上

基建回廊,从而形成支撑经济发展的海上物流系统,并从港航联通法律保障等多个层面对通航条件进行保障,构建海上丝绸之路的互联互通网络,推进通道更加顺畅、高效。而这一切有赖于中日两国的相互合作而非拆台或窥伺。日本有建设社会基础设施的先进技术和经营亚洲开发银行的丰富经验,现在欠缺的是与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共同构建互利共赢、和平合作的地区秩序的意愿。“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日本国内媒体虽然报道相关内容,但多从负面角度分析其风险和难度,日本精英界也尚未形成针对该议题的理性讨论氛围,总体来说反映冷淡。但近来,日本政府在态度上出现了积极的变化。随着特朗普“美国优先”的贸易保护主义大行其道,日本需要加强和中国合作来缓解来自美国的经贸压力。而在日本学术界和企业界,应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的声音更加强烈。日本国际贸易投资研究所首席经济师江原规由就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对于日本企业来说是不可错过的机会,中日两国都与东南亚、太平洋地区有着密切的经济合作,如果能集合两者之力,共同发展将是利好之事。今后,中日企业联合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值得期待。以三菱为代表的部分企业也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表现出浓厚兴趣,并关注“一带一路”所带来的商机。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企业活力增强,结合中国内地的广大市场和雄厚的资金实力,中日企业之间可以在更加广阔的领域里开展合作,实现共赢。

三、“一带一路”倡议下加强中日经贸合作的建议

日本国内对于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尚未形成理性、积极的讨论氛围,政府也没有明确表态,因此,我们不必过于期待,但可以积极布局,静观其变,等待其出现态度转变。对此,中国可参考实施以下对策:

(一)积极争取和日本经济界的合作,让合作范围符合日本国内改革需要

鉴于日本产业界和经济界对“一带一路”构想持积极态度,中国可以有针对性地邀请日本财经界、商界领袖来华访问,向他们介绍“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和实施细则,消除他们的疑虑和困惑,并重点宣传“一带一路”倡议如何为中日合作提供平台,为日本企业制造商机,表达借助“一带一路”推进中日经贸

合作的意愿和诚意。在微观具体操作层面,中国有必要从日本国内政治利益角度出发,使中日合作领域尽量靠近日本国内试图实施改革的议题,使外部合作被日本内部有效借用,从而增加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无论是“一带一路”还是亚投行,我们有必要细致研究如何让中国的战略构想和日本国内正在推行的经济改革的某些领域产生共鸣和契合,这样会令中国向日本推销“一带一路”构想事半功倍。

(二)加强中日两国之间在经济、文化和民间等多领域、多层面的交流合作,增进理解,加强互信

通过交流缓解紧张、对立、抵触情绪,增加相互认同感和亲近感,通过交流打开合作的大门,防止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根据第一部分的中日贸易数据分析不难发现,中日关系的恶化,造成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日本来华游客人数(包括商务来华)大幅减少,而中国对日投资和赴日旅游人数却不降反增,这说明中日交恶,至少从经贸统计的层面,似乎对中国的影响更大,这是我们过去很少分析和触及的。因此,中国有必要阻止中日关系进一步紧张升级,防止“政冷经冷”局面。我们可以充分借助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日中投资促进机构、日本商工会所、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日中经贸中心、日中经济协会等团体组织,畅通合作渠道,依托他们向日本企业界积极宣传“一带一路”构想,并邀请日本企业参加“一带一路”相关推介活动和研讨会,争取在日本企业界扩大影响,促进经济合作。

(三)积极构建公开、公正、透明、合理、有序的管理体制和合作平台

日本消极对待“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原因之一就是担忧其组织管理问题、不透明和易滋生腐败。这确实是有可能存在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很好解决,不仅日本,欧洲国家、韩国、澳大利亚等也会提出质疑和反对,不利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效推进,所以中国必须致力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同时,以此为契机,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具体而言,对外资要降低申报门槛、简化审批手续、提高工作效率;保持外资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

一致性和透明度,避免朝令夕改;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健全政府、企业与个人诚信体系;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微观干预,将政府工作重心转移到加快基础配套设施、物流平台、公共信息平台等服务体系建设上,同时,通过改善和加强市场监管,为外商提供有基本信用的、可预期的、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重点提升执法水平,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为中日经贸合作创造有利条件,解除日本企业的后顾之忧。

(四)加速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

由于中日关系、韩日关系的持续紧张,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但随着中韩自贸区谈判完成,日方压力陡增。中韩自贸协定一旦签订,在汽车、电子及家电产品等日韩企业竞争激烈的领域,日本企业将面临不利的局面。我们应抓住这一时机,加快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争取早日取得突破。中日韩自贸区一旦建立,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关税将大幅降低,投资开放范围和领域将进一步扩大,中日双方的利益汇合点、合作诉求和合作意愿将空前增加,同时,双方都致力于为对方提供一个更加便利、公正、平等、优惠的投资合作环境,有利于推进中日两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

参考文献

- [1]国晖.中日对外援助悖论向发展研究——以经济治国论为视角[J].日本学刊,2018(10).
- [2]孙才志,刘天宝.东北地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的多重背景、核心目标与行动策略[J].经济纵横,2019(9).
- [3]吴可亮.东北亚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问题研究[J].东北亚经济研究,2017(6).
- [4]笄志刚.任晓菲,李扬[J].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解读与应对分析[J].当代韩国,2017(2).
- [5]成新轩.东亚区域产业价值链的重塑——基于中国产业战略地位的调整[J].当代亚太,2019(3).

责任编辑:张敏芳

构筑阿拉善国际经贸新通道 打造新的亚欧大陆桥

陈 岩

【摘 要】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内蒙古阿拉善盟在国家对外开放中的地位 and 作用日益凸显,有条件实现由开发开放腹地到开发开放前沿的转变,为国家承担更为重要的责任和使命。为此,要依托阿拉善的方位和资源优势,拓宽和深化与阿拉善地域和经济有关联的经贸联系,构筑阿拉善国际经贸新通道,优化内蒙古开发开放布局,完善我国经济总体布局,深度推进我国“一带一路”倡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 阿拉善 国际经贸新通道

内蒙古阿拉善盟大部与甘肃省接壤,经济文化来往密切,交通便利,策克、乌力吉和甘其毛都等口岸距甘肃较近,策克口岸有铁路直通酒泉,依托阿拉善的方位和资源优势,进一步拓宽和深化彼此经贸联系,构筑阿拉善国际经贸新通道,打造新的亚欧大陆桥,会对甘肃的北向俄蒙开放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对外能西进北上,对内辐射全国,甘肃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中的战略地位会得到大大加强。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内蒙古阿拉善盟在国家对外开放中的地位 and 作用日益凸显,有条件实现由开发开放腹地到开发开放前沿的转变,为国家承担更为重要的责任和使命。为此,我们提出,要充分发挥阿拉善盟的区位等独特优势,以乌力吉等口岸为重要节点,以乌力吉至巴彦浩特至中卫铁路建设为突破口,加快南北通道中轴贯通,实现国内外重大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打造新亚欧大陆桥,构筑并形成以阿拉善为战略枢纽的国际经贸新通道,向北经蒙古国和俄罗斯联接欧洲腹地,向南打通与中原经济区和长江经济带的经济联系,向西对接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向东延伸至京津冀及环渤海经济区的综合立体国际经贸通道,推动形成我国区域协同、国内外有效衔接的大物流网络。

一、战略意义

(一)深度推进我国“一带一路”倡议

阿拉善盟处在中国版图的“几何中轴”上,历史上就是古丝绸之路北通道的重要节点。打造新的亚欧大陆桥,构筑以阿拉善为战略枢纽的国际经贸新通道,有利于在更大范围内促进国内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及互联互通,为构筑“一带一路”特别是中蒙俄经济走廊安全高效的经贸能源大通道提供新的选择;有利于将中蒙俄经济走廊与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和中巴经济走廊链接起来,将国内经济腹地串联起来,增强“一带一路”建设新的合力;有利于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经贸合作,深化在生态、文化、旅游、科技等方面的合作,在规模、质量和效益上迈上新的台阶。

(二)完善我国经济总体布局

目前,我国对外开放呈现“东强西弱”的格局,打造新的亚欧大陆桥,构筑以阿拉善为战略枢纽的国际经贸新通道——西翼通道,有利于助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在更大范围内流动和配置,促进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在更深层次上的融合和利用;有利于一体化发挥乌力吉等口岸的龙头带动作用、重点城市的

作者简介:陈 岩,男,内蒙古社会主义学院教研室主任、教授。

支点作用、交通干线的贯通作用,将为宁夏、甘肃、陕西、青海等西部省份提供一条通往蒙古国、俄罗斯和欧洲最为便捷的通道,全面提升“一带一路”建设对西部大开发的带动作用,推动西部地区参与国际分工协作,构建东西“双翼”互补的双向开发开放新格局;有利于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国家发展战略,推动东部、中部和西部发挥各自优势,形成“东中西部互补、南北协调”的经济发展新局面;有利于加强阿拉善盟与成渝、关中天水、呼包银榆、兰西格、宁夏沿黄、陕甘宁、滇中等西部经济区的协作,畅通西部地区与环渤海经济区、中原经济区等国内经济腹地全方位联系。

(三)优化内蒙古开发开放布局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提出,要“加快形成北上南下、东进西出、内外联动、八面来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目前,经由满洲里、二连浩特形成了两条欧亚大通道,其中,经满洲里口岸出入境的东通道主要经京沪、哈大、滨州等铁路干线,重点服务于东北、华东、华中等地区;经二连浩特口岸出入境的中通道主要经京广、集二等铁路干线,重点辐射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区。上述两条欧亚大通道有力地带动了内蒙古东部和中部的对外开放,而拥有策克、乌力吉和甘其毛都等口岸的西部地区开放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以阿拉善盟为窗口,与蒙古国进行矿产资源合作,与俄罗斯开展石油、天然气、水资源等的合作,共同进行资源勘探、采掘、开发和利用,相比我国到世界其他地方开发、购买和运输,无论在开发成本、运输距离、来源稳定,以及便利和安全诸多方面,都有明显优越性。通过构建一条从乌力吉口岸出入境,经蒙古国与俄罗斯通达欧洲的新的欧亚大通道,不仅可以发挥内蒙古西部口岸集聚和辐射带动作用,形成东西中口岸发展互补的格局,带动内蒙古西部地区开发开放,而且能够有效服务西北、西南、华中等地区,从而进一步完善内蒙古对外开放格局。

(四)推动沿线经济发展

以阿拉善为战略枢纽的国际经贸新通道覆盖了我国西部地区的大部分省份,辐射全国。通过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形成带动沿线中心城市、重点城镇及所有陆路口岸的开放与建设,推动全境通过、全面覆

盖、全线连通的新的经济轴带,有利于推动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向沿线集中集聚,激发沿线地区发展活力,提升辐射带动能力;有利于提高贸易畅通水平,加快能源、矿产等战略性资源南下东输,加快我国纺织品、机电、建材、装备制造和高技术产品北上西送,降低产业发展成本,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优化沿线地区产业分工协作,加强农业、能源、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产能合作,带动沿线地区经济繁荣。

(五)能够为蒙古国南部提供一条新的便捷的运输通道

乌力吉对外辐射蒙古国巴音洪格尔、南戈壁、前杭盖、后杭盖和戈壁阿尔泰等5个矿产资源比较丰富的省。不仅拥有富集的煤炭资源,多金属、天然气、油页岩等稀缺资源蕴藏量也十分丰富,拥有全球最大之一的铜矿(OT矿)和未开采的煤矿(TT矿)。构筑以阿拉善为战略枢纽的国际经贸新通道,将有效满足蒙古国南部开发开放的需求。同时,乌力吉口岸对内辐射宁、蒙、陕、甘、青等重要的蔬菜农副产品生产省份,由乌兰巴托至莫斯科沿线辐射蔬果农产品消费人口达5000万左右,通过该通道建设,能够满足沿线地区生活需求。

二、基础条件和优势

(一)区位交通条件优越

阿拉善盟地处祖国正北方,内蒙古最西端,北与蒙古国交界735公里(约占中蒙边境线总长的六分之一),西与甘肃省的河西走廊主要城市毗邻,南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沿黄城市群相连,位于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两大国际走廊和国内陇海兰新经济带、呼包银榆经济区的交汇处。经由乌力吉口岸出境的北向通道,只需要途经蒙古国和俄罗斯两个国家即可抵达欧洲,途经国家较少,且文化上较为相近,政治上好沟通,技术上可实现,协调成本较低,经济性和可控性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境内乌力吉口岸处于三大欧亚大陆桥和“一带一路”的重要枢纽节点,通过国内便捷的公铁路实现与东部沿海港口、西部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等重要口岸连通,南向可延伸到陕甘宁青川渝等省区,是实现“北开南联”“西进东出”重要枢纽。

临河至哈密铁路横穿阿拉善盟北部,架起了新疆与华北、环渤海地区的铁路运输新桥梁,向西可通过阿拉山口直抵中亚乃至欧洲,向东可抵达天津港,是阿拉善最便捷的出疆达海通道;即将通车的临哈高速公路大大缩短了阿拉善与内陆省区以及华北,与中亚、欧洲的时空距离。同时,阿拉善盟是全国首个通勤航空试点和县县通飞机的地市级行政区,盟内三旗通勤机场和军用鼎新机场与周边银川、中卫、乌海、巴彦淖尔机场共同形成了八个机场互补的空运网络。随着北京至新疆高速公路、巴彦浩特至银川快速铁路、通勤机场升级国家支线机场等一大批规划项目的落地建设,阿拉善的区位优势将会更加凸显。

(二)口岸地位重要

阿拉善盟拥有策克和乌力吉两个对蒙口岸,对内辐射陕甘宁蒙青五省区。策克口岸是国家一类、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大常年开放陆路口岸,主要功能是进口蒙古国的煤炭资源,开关24年来累计过货7700多万吨,实现贸易额40亿美元。乌力吉口岸是双边性常年开放公路客货运输口岸,距首都北京1200多公里,西侧和东侧380公里处分别与策克口岸和甘其毛都口岸相呼应。与策克口岸相比,乌力吉口岸的开通,不仅可缩短内陆货运距离400公里,而且运输条件极为优越,通过蒙古国境内200公里的自然公路,可直接进入蒙古国南戈壁省腹地。

(三)土地资源丰富

阿拉善盟国土总面积2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2个山东或5个宁夏的面积,未利用土地面积21.6万平方公里,人均土地面积1.125平方公里。乌力吉口岸所处的乌力吉苏木面积14347平方公里,人均拥有国土面积7平方公里,地广人稀、土地开阔平坦,为发展航空物流、保税园区、物流中心等占地规模较大产业提供了独有的立地条件。

(四)运距和成本优势明显

阿拉善盟重庆—西安—中卫—巴彦浩特—乌力吉—乌兰巴托—莫斯科—鹿特丹(欧洲)的通道,是从俄罗斯乌兰乌德和蒙古乌兰巴托进出口货物最短的通道,运距比从重庆—兰州—乌鲁木齐—阿拉山口—俄罗斯卡尔塔雷与俄罗斯远东铁路相连少2400多公里,运输成本每吨减少500元至1200元

左右,陆运时间缩短50小时左右。从俄罗斯卡尔塔雷建输气管道经哈萨克斯坦到新疆再到宁夏中卫全长4600多公里,而从蒙古国南戈壁省建输气管道到宁夏中卫仅需600多公里。蒙古国煤炭资源开采成本低,按2016年底数据测算,从蒙古经阿拉善运至重庆,焦煤价格比当地均价低285元/吨,动力煤低50元/吨。如果在蒙古国内建坑口电厂,以那林苏海特优质弱粘煤为例,发电成本仅为0.063元/千瓦时,加上输送成本,到重庆仅为0.203元/千瓦时,比重庆火电上网成本低0.287元/千瓦时。

(五)合作机制初步建立

早在2014年3月,阿拉善盟与蒙古国南戈壁省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与蒙古国南戈壁省建立友好地区意向书》《中国内蒙古阿拉善盟行政公署与蒙古国南戈壁省政府会谈纪要》,确立了阿拉善盟与南戈壁省友好地区关系,商定双方今后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旅游及医疗卫生等方面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地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做出了积极贡献。

三、主要建设内容

(一)建设新通道

打造新亚欧大陆桥,构筑并形成以阿拉善为战略枢纽的国际经贸新通道——西翼通道,是以阿拉善盟为新的国际枢纽,以乌力吉口岸为主要节点,以贯通南北综合立体交通走廊为重点,加快推进对内对外的公路、铁路、航空、特高压、油气通道的互联互通,推动实现与俄罗斯跨欧亚大通道建设、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蒙古“草原之路”战略对接互补。

1、公路通道

境外公路:从乌力吉口岸出发,向北经蒙古国南戈壁省达兰德嘎德、中戈壁省曼德勒戈壁、首都乌兰巴托、色楞格省苏赫巴托尔,最终到达俄罗斯的乌兰乌德与东西向横贯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国家公路相连,总里程1350公里。全部在既有的低等级公路基础上扩能改造。

境内公路:从乌力吉口岸出发,向南经巴彦浩特、宁夏银川市、陕西西安市、四川广元市、重庆市、贵州贵阳市、广西南宁市,最终到达湛江港等东南沿海地区,总里程3325公里,全部为既有的高等级公

路(高速公路、一级公路)。

2、铁路通道

境外铁路:从乌力吉口岸出发,向北经蒙古国南戈壁省达兰德嘎德、中戈壁省曼德勒戈壁、到达首都乌兰巴托接入俄蒙铁路,沿色楞格省苏赫巴托尔,最终到达俄罗斯的乌兰乌德与东西向横贯俄罗斯的远东铁路相连,总里程1340公里,既有铁路540公里,需新建铁路800公里。

境内铁路:从乌力吉口岸出发,向南经巴彦浩特、宁夏银川市、陕西西安市、四川广元市、重庆市、贵州贵阳市、广西南宁市、最终到达湛江港等东南沿海地区,总里程4324公里,既有铁路3841公里,需新建乌力吉—巴彦浩特—中卫铁路483公里。

3、航空通道

建设乌力吉国际航空货运专用机场,依托物流保税区、集散中心、分拣分包转运中心等细化功能,对外开通乌力吉口岸至乌兰巴托、莫斯科、柏林、安卡拉、开罗、卡拉其等国际空港航线;对内开通乌力吉口岸至北京、西安、重庆、广州、上海等核心城市空港航线,打造以专业航空货运快递为特点的国际航空货运仓储配送基地。

4、特高压通道

主要建设“乌力吉口岸—敖伦布拉格工业园区—华东(华中)±800千伏直流”特高压外送通道和“乌力吉口岸—包头—乌兰察布—北京”交流特高压两条通道。目前,阿拉善盟规划到2020年,风光热综合新能源基地新增装机2260万千瓦,包括风电1220万千瓦、光伏510万千瓦、光热530万千瓦。

5、油气通道

主要建设“蒙古国南戈壁省艾马克区域—乌力吉口岸—宁夏中卫市”天然气管线,与建成的西气东输一线、二线、三线和规划在建的西气东输四线在宁夏中卫市汇合;建设“蒙古国南戈壁省艾马克区域—乌力吉口岸—长庆油田”石油管线,与中哈管道共同构成我国西油东送的战略通道。

(二) 发展大物流

依托交通运输通道,构建以阿拉善为战略枢纽的“一纵三横”大物流网络体系,与国内外各大经济体、经济区搭建起全方位、多角度、宽领域、高密度的

运输网络体系,满足“零换乘、无缝隙”的运输需求,实现物流畅通、物资快捷转运的目的。

纵向中轴:以乌力吉口岸为节点,向北经蒙古国达兰德嘎德、乌兰巴托、色楞格省苏赫巴托尔,到达俄罗斯的乌兰乌德与东西向横贯俄罗斯的远东综合交通走廊相连;向南经巴彦浩特、西安、重庆、南宁,最终到达湛江港等东南沿海地区。中轴重庆—西安—中卫—巴彦浩特—乌力吉—乌兰巴托—莫斯科—鹿特丹(欧洲)的通道,自北向南依次与三个横向路线在乌力吉口岸、西安和重庆交汇,形成“丰”字型物流网络格局。

横向路线:一横交汇点为乌力吉口岸,东向联系临河,与包兰铁路接轨,至京津冀经济圈、环渤海地区;西向联系哈密,与新疆霍尔果斯丝绸之路新通道接轨,进入哈萨克斯坦等国家。二横交汇点为古城重镇西安市,通过陇海综合交通走廊,东向联系中原、华中、华东地区,西向联系青海、甘肃等地区。三横交汇点为山城重镇重庆市,通过长江沿线综合交通走廊,东向联系长江经济带,进入水运,西向联系云贵地区。

加强沿线地区的物流合作,主动加强与国内沿线交通枢纽和重要节点城镇交流协作,重点建设综合物流园、现代物流园、临路经济开发区,打造综合性物流枢纽,构建公路港、铁路港、航空港综合配套、联动运作、国内国际沟通的现代物流网络。

(三) 搭建开放平台

高起点规划建设乌力吉口岸,加快实施策克、乌力吉口岸及相关园区的水、电、路、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口岸保税仓库、互市贸易区、信息化工程、开发区陆港配套工程。加强内陆口岸同沿海沿边通关协作,有序推进“一站式”通关。依托策克口岸、乌力吉口岸和阿拉善经济开发区陆港,规划建设策克口岸跨境经济合作区、乌力吉口岸自由贸易区、敖伦布拉格国际物流保税区,推动设立特色边贸市场、边民互市贸易区,形成“两口岸三园区一陆港”的空间布局。加强口岸和国际物流园区协同发展,不断完善提升口岸功能。创新贸易方式,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等新的商贸业态。搭建贸易平台,举办中俄俄特色商品展销会等。

(四) 加强经济协作

按照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优化产业分工协作,推动沿线国家和地区在能源、矿产等传统产业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领域的深入合作,扩大服务业相互开放,推动跨境旅游业加快发展。加强沿线西部省区与发达地区的交流合作,重点推进在关键技术设备、人才交流与培养、信息咨询服务等方面的合作。促进环渤海经济区、长江经济带等发达地区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鼓励国内外资本到西部地区发展“飞地经济”。推动阿拉善与宁夏、甘肃等周边省区合作向纵深发展,共同打造蒙宁、蒙甘经济合作区。

四、推进意见

(一)坚持规划先行

成立专门推进机构,研究编制“打造新亚欧大陆桥,构筑以阿拉善为战略枢纽的国际经贸新通道—西翼通道”战略规划,尽快将其纳入国家战略规划大盘子中,并做好各类型规划间的衔接、统筹和细化工作,提高规划的可操作性。在国内外广泛征集高水平的工程编制设计单位,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策划阿拉善战略枢纽“新通道、大物流”设计方案。认真研究并解决规划制定、实施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为今后规划实施、项目设计、工程建设排忧解难。

(二)健全协同机制

按照《中蒙关于建立和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和《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的要求,利用好中蒙俄政府及各部门之间现有的合作机制和平台,加强与蒙俄对话合作,推动重大事项提交两国高层会晤解决。完善旗县与蒙古国地方政府、政府部门间合作机制和定期会晤机制,推动旗县与蒙古国南部地区建立友好关系。建立与国内经济腹地常态化合作机制,实现政策共享、资源共享、信息共享,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建立与国家有关部委合作

机制,定期召开会商会议,推动政策落实和项目落地。推动与俄蒙的物流合作,共同推进建立统一的全程运输协调机制,实现国际运输便利化。综合运用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协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建立沟通协调机制,研究解决工作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和困难。

(三)加强民心相通

推进与蒙古国南戈壁省达兰扎德盖德等城市结对友好工作,发挥与蒙古国历史渊源深厚、民间交往密切的特殊优势,增进友好感情,搭建人文交流平台,加强科教文卫生等领域的合作。加快额济纳旗中蒙友好蒙医综合医院建设,成立中蒙科技合作中心,推动我盟精细化工孵化园在蒙古国设立孵化分园,与蒙古国共同打造农牧业科技示范园联合基地。加强阿拉善盟与南戈壁省在民生工程建设、易货贸易及公路建设等方面的合作,加快推进循环经济示范园区合作建设,继续加强在教育、卫生、旅游等方面的交流合作。

(四)加大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

推动策克口岸早日升格为国际性口岸。切实抓好产业、财税、土地、金融和人才等领域扶持政策的争取与落实,减免收费、减少审批、简化程序,为企业入驻口岸、园区有序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加强资金对外的支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援助资金、优惠性质贷款、区域性投资基金和国内企业力量,协同蒙方共同推进乌力吉至乌兰巴托铁路建设。积极发挥丝路基金在投融资方面的支持作用,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互联互通建设提供支持,加快推进境外北上项目建设进度。

责任编辑:张敏芳

“一带一路”与西部发展新机遇

李晓艳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国家和地区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开启了新的机遇之窗,西部地区应依托自身优势和禀赋差异,发掘区域内市场潜力,调整产业结构,推动相关产业发展,探索自身发展模式转型和发展方式新定位,提高区域经济增长速度,推动西部地区经济全面、健康、协调发展,缩小同东部、中部发达地区的差距,实现西部经济腾飞。

【关键词】“一带一路” 西部 新机遇

“一带一路”这一伟大倡议,为沿线国家和地区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开启了新的机遇之窗。西部地区应当依托自身优势和禀赋差异,顺势而为,发掘区域内市场的潜力,调整产业结构,推动相关产业发展,探索自身发展模式转型和发展方式定位,提高区域经济增长速度,推动西部地区经济全面、健康、协调发展,缩小同东部、中部发达地区的差距,实现西部经济腾飞。

一、“一带一路”倡议下西部地区发展的优势和机遇

(一)“一带一路”实现全球化再平衡、东西部协调发展的路径,为西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带来新机遇

从国际视角来看,传统全球化由沿海地区、海洋国家先发展起来,内陆国家较落后,形成巨大的贫富差距。传统全球化由欧洲开辟,由美国发扬光大,形成国际秩序的所谓“西方中心论”,导致一系列不平衡不合理效应。如今,“一带一路”鼓励向西开放,带动西部以及中亚等内陆国家和地区的开发,在国际社会积极推行全球化的包容性发展理念,推动全球经济再平衡;同时,“一带一路”是中国主动向西推广中国优质产能和比较优势产业,将使沿途、沿岸国家首先获益,也改变了历史上中亚等丝绸之路沿途地带只是作为东西方贸易、文化交流的过道而成为发展“洼地”的面貌。“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在于实现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重构区域乃至国

际间经济贸易、思想文化、价值体系等方面的合作新格局。这为解决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重构东西部现代化空间结构创造了良好契机。^[1]

从国内视角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重心在东部及沿海地区,并先后设立了一些特殊政策园区、经济特区、沿海港口城市,使东部及沿海地区经济迅猛发展起来,而西部地区由于自然环境恶劣、自我发展能力较弱以及历史原因,总体经济水平长期落后于中东部地区,始终扮演着“追随者”的角色。1999年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虽然改变了西部地区整体落后面貌,但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没有获得实质性的改变,“一带一路”的出台和实施让西部地区一跃成为经济发展的前沿地段,为西部大开发建设能力的提高以及实现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带来了新机遇,是我国东西部区域发展战略的重大布局。同时,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煤炭和天然气含量,分别占全国储量的39.4%和87.6%。西部地区可利用“一带一路”这一巨大的政策平台,立足资源、能源和产业优势,主动“走出去,请进来”,加强与中亚、西亚、欧洲等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各方面合作,拓展对外开放空间,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对外开放程度。由“内陆腹地”向对外开放的前沿迈进,进而建构起统筹海陆、东西互济、面向全球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作者简介:李晓艳,女,新疆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

(二)独特的区位优势,为西部各省市重构对外开放新格局带来机遇

“一带一路”倡议西部地区覆盖新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等西北6省,广西、云南、西藏等西南3省,以及内陆地区重庆。土地面积为69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71%;人口约3.9亿,占全国总人口的29%。从地理位置上看,西部地区连接中东部,与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印度、缅甸、越南、阿富汗等14个国家接壤,陆地边境线长达1.8万余公里,^[2]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通往中亚、南亚、东南亚以及俄罗斯、蒙古的重要通道,地理位置意义重大,地缘优势十分突出。

而西部各省市因地理位置、经济发展、历史文化特点不同而各具发展优势,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具有不同的功能定位。比如西北地区新疆,拥有5600多公里的边境线,占我国陆地边境线的1/4,国土面积占全国的1/6,与8个国家接壤,具有东进西出的开放优势,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教和医疗服务中心,被定位为丝绸之路核心区,同时,新疆煤炭、天然气储量均为全国首位,石油资源、太阳能、风力能源等也非常丰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将进一步深化新疆与中亚、南亚、西亚等国家的交流合作,促进新疆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能源优势转化为生产力;陕西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是我国中东部与外界交流的重要枢纽,是促进国内外市场发展的中坚力量,借助“一带一路”,陕西可以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科教文化优势,把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优先领域,构建对外开放大通道,大力推动与沿线各国进行文化、人才、科技方面的交流合作;甘肃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省会兰州是“一带一路”主要纽带城市,依托“一带一路”,甘肃可以发挥综合经济文化优势,形成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通道、商贸物流枢纽、重要产业和人文交流基地,构建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和次区域合作的战略基地;宁夏是我国与阿拉伯国家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一带一路”的实施为进一步推进中阿深化合作带来了重大机遇;青海是贯穿南北丝绸之路的桥梁和纽带,是我国联通南亚国家的重要走廊和通道;内蒙古是连接我国内

陆地区与俄蒙两国的重要通道,“一带一路”的实施将促进我国与俄蒙两国的经贸合作以及资源开发。^[3]

西南的广西,是我国西南地区向南发展的有力的交通要道,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广西要加快北部湾经济区和珠江经济带开放发展,加强与东盟地区的深化合作;云南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相邻,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国际运输通道建设,打造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西藏要把握机遇,全面推动与南亚贸易陆路大通道建设,推进与南亚国家边境贸易和旅游文化合作;重庆具有接南转北、承东启西的重要区位优势,借助“一带一路”倡议,重庆将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支撑,沟通境内外的一个重要支点。

二、“一带一路”推进西部地区发展的制约因素

(一)基础设施滞后

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地区发展的最根本保障,同时也是推进其他领域合作的基本前提,基础设施滞后已成为很多落后地区发展的桎梏。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20年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但是与东部及沿海发达地区相比,仍然处于落后地位。在公共交通工具、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公园绿地以及用水用电燃气普及率等方面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4年西部地区的交通资源里程仅仅相当于东部地区八十年代的水平,铁路、航运等基础设施亟待进一步完善。薄弱的基础设施影响着与中部、沿海地区、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流,各类优势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无法满足沿海企业、外资企业在投资方面提出的要求,不利于带动区域相关产业发展,不利于加快经济快速发展。加上西部地区生态脆弱,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很容易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同时,西部地区地理环境复杂多样,严寒高拔,地域辽阔,资金需求比较大,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了难度。

(二)民族问题复杂

西部地区分布着众多少数民族,是我国少数民族分布最集中的地区,思想文化及社会认同呈多元化趋势发展,交通、教育、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低下导致少数民族地区市场化进程缓慢。长期以来,民族问题处理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西部地区各民族的和谐稳定是保障“一带一

路”倡议实施的基础。不可否认,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扶持下,西部各少数民族在经济、社会、教育、科学技术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由于传统因素的影响以及地域差异,其在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科学文化素质、适应新环境的素质以及创新性素质等方面依然存在很大差距,从而成为阻碍其社会发展的力量。同时,民族问题又与宗教信仰问题息息相关,每个民族都有各自不同的文化体系和价值标准,由此引发的差异性使得民族关系进一步复杂化,这种种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给“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带来了一些不稳定因素。

(三)周边局势不稳定

周边环境的和平稳定是“一带一路”倡议顺利实施的基本保障。西部地区与诸多国家接壤,周边地缘政治环境复杂敏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政局不稳、自然条件差、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等问题;近年,伊朗核问题冲突加剧、叙利亚局势复杂、美国加大对俄罗斯制裁、俄罗斯与乌克兰对立明显,对周边局势影响不容忽视;一些大国对盟国施压,暗中抵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倡议和合作项目;我国向西开放周边国家大多是伊斯兰国家,是宗教氛围最为浓厚的地区,是宗教极端主义和暴力恐怖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近几年来,宗教极端势力利用国内地缘政治因素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渗透。以上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处理,都将对“一带一路”的实施产生重大干扰,阻碍项目实施的进程。

三、西部地区融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策略

(一)科学调整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强化相关产业的互补性,鼓励优势产能走出去

按照《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和行动》,“一带一路”建设分别向西和向南延伸,贯穿整个欧亚大陆,涵盖中亚、南亚、西亚、东南亚和中东欧等国家和地区,沿线 53 个国家、94 个城市,总人口约 44 亿人,经济总量约 21 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的 63% 和 29%,是目前全球贸易和跨境投资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和我国有很强的互补性。^[4]“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主要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这些沿线国家城镇化程度不

高,存在较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为国内的优势产能如高铁、核电、通讯、电力设备、家电制造业提供了重要机遇。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也是能源储备丰富、开发潜力巨大的地区,如里海沿岸的哈萨克斯坦、土库曼、乌兹别克,都富含石油和天然气,中亚地区被称为第二个波斯湾,能源管道和油气设备制造业面临较大的机遇。西部地区具有较强的装备制造业优势产能和研发能力,有能力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基础建设和装备制造业方面的产品供给。我国西部地区自身具有丰富的太阳能、天然气资源,有着较好的农业、畜牧业发展基础,应当以本地优势产能为突破口,利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的互补性,强化相关产业的互补性,强化相关产业的研发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依托区域互联互通的发展机遇,在开放的竞争性市场中形成比较优势,进而转化为区域的竞争优势,通过与东南亚、中亚、西亚、南亚地区项目跨国合作,有效利用国内外资源和国内外市场,提高参与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的能力,从而实现自身产业结构的转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5]同时,西部地区要加大与中部地区、沿海地区经济方面的合作,在客观分析自身各方面现状的基础上巧借自身具体优势,吸引中部与沿海地区大型企业到该地区投资建厂,进一步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在深化产业结构过程中更好地贯彻落实“一带一路”倡议。

(二)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优先发展领域,“一带一路”将构建现代化物流大通道,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发展带来机遇。过去,中国就有“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的说法,改革开放又有“要致富,先修路;要快富,修高速;要闪富,通网路”的脱贫致富经验。我国西部地区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与我国周边 14 个国家接壤,直通中亚、南亚,通过中东地区连接非洲和欧洲;通过航海运输沟通东南亚、南亚。要以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发展的突破口,优先打通缺失路段、瓶颈路段,重点建设铁路、公路、航空、航海等运输,建立互联和移动通信、电子商务等信息基础设施、物流配送设施及高新技术园区和自贸园区的设施建设,打通信息通道,构建西部地区交通枢纽,形成和沿线国家交通一体化,成为发展互

联互通的交通枢纽,实现东西对接,南北贯通,以此来提高其对外开放水平。比如处于“一带一路”“黄金段”的甘肃省,就要充分发挥甘肃连接欧亚大陆桥的战略通道和沟通西南、西北的交通枢纽作用,增强交通运输对甘肃打造国家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和次区域合作战略基地的支撑能力。大力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6873”交通突破行动,加快推动建设形成较为密集的高速公路网,特别是要加快民族地区、落后地区高速建设进程。同时要建设陆上丝路桥头堡,努力构建铁陆航多式联运、服务全国、面向中亚西亚及欧洲的大兰州国家综合交通枢纽、国际货运班列编组枢纽和物流集散转运中心。^[6]另一方面,西部地区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充分考虑投资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避免盲目建设、重复建设,要总揽全局、协调发展。

(三)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加大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

民心相通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社会根基。西部地区不仅是“丝绸之路”的起源,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地,在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西部地区深厚的文化与沿线国家与地区较为相似,有很多跨界民族的存在,宗教信仰相同,可以充分依托西部地区潜在的历史文化资源优势,打破民族意识和宗教文化的束缚,加强民族之间的合作,积极寻找和探索与沿线国家及地区在文化、经济、学术等方面交流合作的新方式,举办“一带一路”文化、旅游、宗教、艺术等各类论坛,构建人文桥梁,使中国逐步发展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中心,进而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间、国家间的互动合作,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产业合作和文明互鉴,从而改变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被动局面,缩小区域差距,使各民族地区在“一带一路”大背景下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架设通向合作共赢的“连心桥”。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关系及局势较为复杂,仍然存在着一些摩擦和不稳定因素,增进各国人民互助互信是促进各国和平发展的根本途径。“一带一路”倡议将使西部地区与国外的联系更加紧密,这样可以加快西部民众的人文、经济交流,打破其长期存在的传统、保守的思想,使其朝着开放性、国际化的方向发展,最终实现互利共赢的局面。

(四)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提升西部地区文化软实力

文化产业是西部地区整体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带一路”涵盖亚洲、欧洲和非洲六十多个国家,44亿多人口,“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技术、资本、贸易文化等内容,都需要大量熟悉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的专业人才。目前已有一些具前瞻性的高校着手开设“一带一路”的相关课程,以培养“一带一路”急需的人才,如北京大学从2015年秋季新学期开始,面向本科生开设40门“一带一路”系列课程;清华大学也开设有“丝绸之路大篷车课堂”。西部地区要抓住机遇,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发挥高等教育在高素质人才培养、高层次科研开发、高质量社会服务和高水平文化交流等方面的优势;进一步完善引进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人才和海外高层次人才配套政策,妥善解决高层次人才在科研、住房、待遇等方面的实际问题,设立专项资金用于高端人才培养、紧缺人才引进、杰出人才奖励和重点人才项目建设;加强国际科技合作,改变东西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现象。

同时,西部地区有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资源,“一带一路”的实施为西部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产业升级、资金扶持,以及人才培养等机遇。西部地区要加大文化与教育、旅游、体育、科技等融合发展力度,不断拓宽文化发展空间,创新“文化+”模式,引领产业融合发展,解决好东西部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稳步提升西部地区乃至全国的文化软实力,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共识和文化认同感的形成,从而更好地服务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五)发挥旅游和文化资源优势,推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

旅游业是促进经济合作和民心相通的重要抓手,旅游合作可以加深互相了解,消除偏见和误解,西部地区旅游和文化资源丰富,其自然风光、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独特的民族风情使得西部地区具有独特的地域优势。

西部地区政府部门应充分利用自然条件以及人文资源,客观分析旅游经济发展现状,融入“核心区”“黄金段”“新起点”等品牌元素,与周边国家加强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打造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吸引世界各地游客前来观光,有效刺激地区旅游业 (下转第65页)

以“飞地经济”模式设立兰州—白银都市圈 国家东西协作产业转移试验区的建议

民革甘肃省委会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十四五”规划的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决策部署,科学谋划和编制我省“十四五”规划,探索解决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突出问题的有效路径,于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寻求调整优化国家经济布局的平台抓手,建议借鉴东西扶贫协作的成功实践和建设国家级产业转移示范区的做法经验,创新融合国家推动西部发展的政策举措,争取国家支持,研究采取“飞地经济”模式,设立兰州—白银都市圈(以下简称兰白都市圈)国家东西协作产业转移试验区。

一、主要理由

(一)“飞地经济”模式已由多地探索实践,上升为国家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创新区域合作机制,通过发展“飞地经济”、共建园区等合作平台,建立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互助机制。2017年,国家发改委等八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支持“飞地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近年来,长三角、京津冀、皖江城市带等多地探索“飞地经济”发展模式,“飞地经济”已成为推进区域合作与发展的突破口。

(二)设立兰白都市圈国家东西协作产业转移试验区,是新时代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和现实需要。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两个大局”战略思想为国家区域发展政策布局指明了方向。今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但西部与东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我国发展已经到了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阶段。采取“飞地经济”模式,设立兰白都市圈国家东西协作产业转移试验区,是新时代贯彻落实“两个大局”战略布局的现实需要,更

是解决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创新举措和必然选择。

(三)设立兰白都市圈国家东西协作产业转移试验区,对新时代调整优化国家经济布局、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当前国家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设立兰白都市圈国家东西协作产业转移试验区,将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的价值链、高端环节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向西部转移,形成产业、产能备份,以此调整优化国家经济布局,拓展国家战略回旋空间,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四)兰白都市圈区域完全具备设立国家东西协作产业转移试验区的条件。“一带一路”倡议将我省推到了向西开放的前沿,兰白都市圈战略地位重要,是西部重要的交通、物流枢纽,是进藏入疆和国家向西开放的战略要地,是保障国家国土、生态、军事、经济安全的重要区域。兰白都市圈国土面积大,人口密度较小,经济欠发达,尚有较大的环境容量;区域内以黄土低矮山丘为主的未利用土地资源丰富;水资源保障条件较好,近期可通过对引大入秦供水工程挖潜改造来解决用水需求,远期可通过实施大面积节水措施和国家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来解决;该区域是我国西气(油)东输、西电东送的骨干通道,石油化工、有色冶金、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有基础优势;陇海、兰新、包兰等铁路和正在建设的中兰、兰张三四线高铁穿境而过,G30、G6等高速公路和多条国道穿境交汇,兰州中川机场三期扩建工程正在建设。

二、具体建议

(一)尽快规划兰白都市圈国家东西协作产业转移试验区承接区域。建议打破行政区划边界“藩篱”,

统一编制兰白都市圈涉及的国土面积、国土空间规划和承接区规划。建议以150平方公里左右为单元,规划总面积1000平方公里左右的兰白都市圈国家东西协作产业转移试验区承接区域。

(二)以“两山论”为指导,力争将兰白都市圈国家东西协作产业转移试验区规划建设成“荒坡荒山”向“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转化的示范样板。从兰州新区调研了解到,采取工程措施将荒坡荒山治理成区域“小平原”或“台地状平原”,每平方公里治理成本在7500~8000万元,成本还是比较经济的。建议借鉴兰州新区这一创新实践,以“两山论”为指导,筑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科学规划建设,将建设用地指标严格控制在40%以下,确保生态用地超过60%,力争将兰白都市圈国家东西协作产业转移试验区建成“荒坡荒山”向“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转化的示范样板。

(三)争取将兰白都市圈国家东西协作产业转移试验区作为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标

志性工程,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兰白都市圈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经济实力相对较弱,靠自身实力难以完成国家赋予的战略任务。建议争取将“以‘飞地经济’模式,设立兰白都市圈国家东西协作产业转移试验区”作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标志性工程,争取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同时,争取国家支持,将建设任务下达给东部沿海各省市,列入各省市“十四五”规划实施。

(四)争取国家出台鼓励支持东西协作发展“飞地经济”的相关政策。争取国家出台鼓励支持东西协作发展“飞地经济”的指导意见,要求东部发达地区积极响应和行动,在兰白都市圈发展“飞地经济”。争取国家支持,建立完善东西协作发展“飞地经济”的制度机制,从规划建设定位、转移产业要求、财政支持政策、经济统计核算、税收利益分配、管辖事权、服务保障、责任机制等方面明确规范各方职能职责。

责任编辑:张敏芳

(上接第63页)

发展,也使地区已有的文化资源得以高效利用,发挥区域文化优势。与此同时,西部地区政府部门要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自然环境的保护,避免破坏生态环境,更好地发展地区旅游产业,从而促进经贸合作发展,推动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

(六)走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

“一带一路”对中国东西部地区的发展有如下定位:构建从东部向西部的产业转移,实施梯度发展的经济模式。相对于东部地区来说西部地区有着资源富集的优势,但由于其多处于高原、沙漠等生态脆弱地区,受自然环境的约束很大。因此西部地区要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思维,用新的视角看经济发展,坚决摒弃唯GDP论的发展观、政绩观,摆脱“速度情结”和“换挡焦虑”,调整发展思路,转变发展理念,从绿色发展的角度出发,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利用后发优势,真正适应发展新常态新时代的发展变化,走一条比传统发展道路更绿色、更环保的经济发展道路。重点发展技术

密集型产业和信息化先进技术产业,这样可以让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科学的完成产业升级,最终与沿线各国一道,合力打造开放多元的世界经济,携手开辟崭新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 [1]竺彩华.“一带一路”引领全球化再平衡进程[J].和平与发展,2017(05).
- [2]曹刚,赵坚.“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西部地区物流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9(02):171-176.
- [3]严妮飒,王亚东.“一带一路”战略对我国西部地区发展的机遇与挑战[J].北方经济,2015(07):50-52.
- [4][5]雷德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的西部经济发展[J].经济研究参考,2016(08).
- [6]王华存.“一带一路”建设重大机遇下甘肃产业发展的思考[N].甘肃日报,2017-06-09(10).

责任编辑:张敏芳

关于制定我省“十四五”规划的几点建议

民盟甘肃省委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是我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加快转型发展、乘势而上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的关键时期。编制符合甘肃实际、体现人民期盼、引领高质量发展的规划,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当前,针对“十四五”规划编制,省上从目标设定、发展导向、重点选择方面已经有了明确的意见。下面,结合前期调研和思考,就提升城市功能、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做大做强中医药产业和加快现代丝路寒旱农业谈几点具体意见。

一、坚持“城市更新”理念,完善城市功能配套

东南沿海很多发达地区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启动较早,比如说上海、江苏、浙江等城市从上世纪80、90年代就已经开展了这项工作。而我省受多重因素制约,此项工作相对滞后。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是一项重大惠民利民政策,是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重要抓手,对我省而言更是一次难得的重大利好,既能扩大有效投资,又可以解决许多地方街老、院老、房老、设施老、生活环境差、城市管理水平跟不上等老大难问题。因此要紧紧抓住机遇,用好政策红利,因地制宜、尽力而为,全面做足项目储备,持续加大力度,打造一批功能全、特色足、风景美的新型街区,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加舒心。关于工作重点、具体内容,建议关注以下几个点:

第一,注重资源要素的“腾笼换鸟”。要以服务性功能提升为突破点,在建筑体量上做减法,在公共空间服务上做加法,着力“利用好现有空间、挖掘出潜藏空间”。要坚持“联动改造”理念,将具备条件的相邻小区统筹考虑,实施片区统筹、项目打包、合理拓展,充分利用公有住房、社区居民委员会办公用房和社区综合服务设施、闲置锅炉房等存量房资源,增设各类公共服务设施、拓展公共活动空间。

第二,注重民生项目的完善配套。综合改造老旧小区,除了统筹考虑“水、电、路、气、消、垃”等项目配套升级外,还要紧盯民生领域短板弱项,着力解决好“一老一小”问题。一方面,要整合小区及周边存量土地资源,通过增设中小学校、托幼机构数量,有效扩大教育资源供给,切实解决城市大班额及入园难、入园贵等痼疾顽症。另一方面,由于老旧小区改造资金投入量大,可以运用市场化方式吸引有实力的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增加和优化养老、托幼、医疗、助餐、保洁、家修等服务供给,方便群众生产生活。

第三,注重消费板块的提档升级。老旧小区改造提升涉及面广,包括抗震结构加固、节能保温改造、更新水电气热、加装电梯,完善车行步行系统、停车场和无障碍设施,等等。这些不仅有助于拉动房地产开发、市政基建投资,促进住户户内改造并带动相关消费,也有利于加快连锁便利店、餐饮店、菜市场、中央厨房、快递等社区商业发展。同时,可以借机打造一批特色精品文化街区,通过深挖品牌内涵,丰富功能层次,实现文化、商业、旅游深度融合,综合体现文化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带动提升区域品位。比如,我们目前正在推进建设的读者精品文化街区和去年点亮“夜间经济”的一系列举措,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这方面还是大有可为,有很多文章可做。

第四,注重区域环境的生态宜居。要始终把群众的需求和满意作为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群众营造更加舒适宜居的生活环境,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规划建设时,要坚持以下原则:其一,环境美。尊重自然,反映自然,让城市与山水林田湖草有机融合,建设人居、自然相得益彰,百姓“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的美丽小区。其二,文化浓。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传承城市人文精神,在不破坏老街区人文原貌的基础上,尊重民

俗,延续文脉,保留年代感、归属感,在改造设计上下足功夫,最大限度体现历史记忆、地域特色。其三,建设好。多采用“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精品建筑,发展新型建造方式,加强对城市的空间立体性、平面协调性、风貌整体性的引导和管控,努力让今天的城市建设成为明天的文化景观。

二、强化“基本单元”支撑,加快县域经济发展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小康提速、绿色崛起,基础在县域,难点在县域,潜力也在县域。长期以来,我省自然条件严酷,产业重化特征明显,新兴产业占比小,与发达地区相比,县域经济发展滞后是最明显的差距。建议在规划编制中,要把县域经济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第一,县域经济发展的方向是衔接乡村振兴战略。在后脱贫攻坚时代,县域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的衔接至关重要。乡村振兴对县域经济发展具有引领作用,县域经济发展对乡村振兴具有支撑作用,县域经济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阵地、主战场。因此,在规划编制中,一定要把握好两者间的关系,做好相关工作的衔接对接,实现互补促进,协同发展。

第二,县域经济发展的核心是坚持城乡区域统筹。实现城乡统筹发展,要优化城镇与农村一二三产的空间布局,合理引导城乡产业分工和产业转移。在制定县域经济发展目标和思路上,要以自身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历史文化资源的现状和特点为基础,突出工业化和城镇化对农村经济的“双带动”,按照县域经济工业化、城郊农业特色化、城乡建设一体化、三产服务现代化、经济模式多元化、发展主体民营化的目标,以加快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城乡结构和投资结构调整为主线,以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县域经济发展质的飞跃。

第三,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是促进三产深度融合。在发展格局上,要以工业化思维、农业现代化理念调整改造农业,接续二产、连接三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在产业培育上,要突出产业开发抓调整、增优势,大力培育区域首位产业、县域主导产业,引导相近、相关产业在县域内聚集,培育县域重点特色产品,带动物流集散、电子商务、农村新兴服务业等三产的发展,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和板块经济;在实现路径上,要加快国内外先进技术的引进和推广

应用,发展技术高、效益好、市场前景广阔、能推动工业经济向资源深度开发和低碳、循环转型的产业。

第四,县域经济发展的捷径是抓好特色小镇建设。结合中心乡镇、特色小镇和产业园区建设,加快补齐中心乡镇、镇村、居民点基础设施短板,优化农村生活安居区、产业功能区、农田保护区、生态保护区和公共基础设施区布局。以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为突破口,坚持错位发展,突出特色,重点发展加工生产、商贸物流、休闲养生等名优特色小镇、中心乡镇和产业园区,尽最大可能吸纳就业、加快劳动力转移,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

三、放大中医资源优势,做大做强中医药产业

中医药产业发展可以说是一个老问题了,近年来,我省一直把中医药产业作为重要优势产业来培育发展,但由于缺乏对中医药产业发展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等全产业链中关键要素的整合,中医药产业小、散、弱的特征十分突出,无法形成完整的有规模的产业及产业链,导致中医药资源优势尚未转化为产业优势。因此,建议将中医药产业发展作为我省“十四五”时期产业发展的重点,全力支持中医药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实现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具体有以下建议:

第一,深入挖掘中医药康养特色资源。一是加强中医药关键技术和方药名录的深度挖掘,收集民间和官方的中医药验方秘方和技法,汇集应用成果,充分利用中医药大数据资源,推进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应用,为全省中医药行业发展提供数据支撑。二是对分散、闲置的中医药治疗技术和可转化落地的科技成果,特别是中医药传统的汤、丸、丹、膏、散等进行有机整合,连接成果的互联、互通与资源集聚。三是促进科研成果及转化落地政策、区域、方向与市场进行有机匹配,建立多层次合作开发和利益“共存、共享、共生”机制。

第二,提升中医药产业研发创新层次。一是借鉴和吸收发达国家或地区临床研究资源的共享机制,依托甘肃中医药大学、省中医院、中医药研究院、佛慈制药等单位,吸纳省内相关高校及科研院所,建立多学科融合的中医药创新平台,布局一批重点实验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和技术创新中心,进行多学科交叉有机联合研究探索,以跨学科协同创新模式融入产学研一体化快速发展,研制高科技含量的中药

制剂或创新药物。二是依托中医药高校,建立服务陇药产业发展的公益性研究专项基金与成果转化科研平台,组建陇药产业创新研究院。加快中医药转化医学中心等中医药研发平台建设,培育一批中医药科技创新团队。建设产品中试和产业化载体,集中优势力量突出科研成果原始创新。三是设立中医药研发风险基金,加大对中医药科技的经费投入,积极承接中医药关键技术装备重大专项,进一步扩大科研自主权,合力推进科技成果转化。

第三,加快推进中医药行业增量整合。一是借鉴宁波市“蓝源模式”,结合我省实际,探索建立政府扶持、科研技术、产业经贸、金融资本等广泛参与机制,构建中医药“政学研产工贸资”一体化中医药生态圈,形成有效满足患者需求和市场消费需求的中医药产业链条。二是充分发挥甘肃省中医药文化底蕴深厚、大宗地产中药材核心产区的优势,结合目前推进的大宗中药材、道地药材原产地初加工补助项目,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基地”生产经营模式,吸引和支持全国有实力的中药企业,在我省主产地建立规范化种植基地和产地加工车间(工厂),统一规范种植、收购储运,统一生产工艺、质量标准,统一检验检测和管理销售,实现中药材由农户分散种植向合作社集中统一种植和企业规范统一管理转变,着力打造以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基地为依托、现代生产要素集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群众共享发展红利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中药饮片、中成药质量标准评价和安全评估体系,促进中药饮片和中成药质量提升。

四、立足农业产业基础,加快现代丝路寒旱农业发展

2019年我省出台了《关于发展具有甘肃特色现代丝路寒旱农业的指导意见》,明确了以七大体系(构建优势产业体系、生产组织体系、产销对接体系、风险防范体系、改革创新体系、绿色循环体系、农业保障服务体系等七大体系)为支撑的现代丝路寒旱农业发展的具体路径。在现有基础上,我省“十四五”时期怎样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实更细,提三点建议:

第一,在发展思路上,走园区集约化发展路子。2020年9月22日在庆阳环县召开的全省扶贫产业体系建设现场会上,唐省长提出了农业发展走“产业

集群、龙头集中、技术集成、要素集聚、保障集合”的园区集约化发展路子,并对产业怎样集群、龙头怎样集中、技术怎样集成、要素怎样集聚、保障怎样集合分别作了阐述。下一步,怎样丰富完善这五个“集”的内容,需要相关部门和有关科研院所加紧研究,在理论支撑、措施支撑、项目支撑方面下功夫,并在此基础上将这一思路上升为省委省政府推动现代丝路寒旱农业发展的总思路。

第二,在示范带动上,走企业集团化发展路子。近年来,我省投入很大资金引进培育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取得了显著成效,特别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实现了贫困村全覆盖,已经由“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这些新型经营主体必将在“十四五”时期和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进一步释放巨大作用。但同时,也要看到我省农业方面大型的带动性龙头企业很少。建议省里聚焦已经形成规模的“牛羊菜果薯药”等优势产业,引导龙头企业采取兼并重组、股份合作、资产转让等形式,分类探索建立大型农业企业集团,不断提升我省农业企业在现代丝路寒旱农业发展中的辐射带动能力。

第三,在品牌打造上,走整体营销的路子。目前,国内已有一些省区结合区域特色,在现代农业基础上提出了个性化农业形象定位,如青海称作“高原特色青海特点现代农牧业”,贵州称作“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云南称作“高原特色农业”,广西称作“现代特色农业”,黑龙江称作“现代化大农业”,西藏主抓“高原特色农畜林产品生产基地和产业带建设”。我省把农业整体形象定位为“现代丝路寒旱农业”,十分有利于打造区域农产品公用品牌,并且与兄弟省区已有定位明显区别,可抢占品牌制高点。下一步,建议省里坚持“大特色”与“小品种”一起抓,特别要在发展好主导产业的同时,加大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重视荞麦、糜谷、扁豆等地方特色小杂粮和兰州百合、临夏啤特果、陇南油橄榄等地方特色名优农产品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以现代丝路寒旱农业为统领,健全农产品品牌目录,在央视等重要媒体上做好整体营销宣传,提升知名度,真正擦亮“甘味”品牌。

责任编辑:马霞

关于我省“十四五”规划编制中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若干建议

民建甘肃省委

营商环境是制约经济活力、影响资本流向和经济发展速度的基本因素,是衡量一个地区核心竞争力和潜在发展能力的重要标志。对此,国家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近年来,我省在优化营商环境与“一带一路”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长期困扰市场主体的“办照难”、“办证难”、“退出难”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但与现阶段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国际国内经济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要求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和不足。根据我们最近调研发现,当前我省市场主体所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市场竞争激烈、经营成本高和融资难融资贵,这些主要困难不是目前的商事制度改革所能够直接解决的。为进一步深入优化营商环境,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 继续深入推进营商环境改善,提升市场主体主观感受

相较于全国平均水平,我省市场主体对营商环境的评价并不高,在“放管服”权限下放过程中,地州市由于专业人才和硬件投资缺乏,普遍存在“接不住”现象,省会兰州以外城市的市场主体对营商环境的评价更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不同规模的市场主体对目前营商环境改善的认可度不同,规模越大的市场主体认可度越高,小微企业的认可度较低;二是较大一部分市场主体尤其是中小微企业认为目前与政府打交道的的时间偏长;三是办理业务的方便程度和快捷程度偏低。建议从省内各城市和各市场主体均衡发展角度出发,公平对待各类市场主体,在项目审批、融资服务、财税政策、土地使用、公共资源交易、人才引进和硬件投资等方面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一视同仁,对本地企业和外来投资企业一视同仁,对大中企业和小微企业一视同仁,

强化政府机关考核机制,建立淘宝式“好中差评”服务评价机制,及时整改群众反映的问题,突破区位优势与商业基础薄弱的局限,从服务做起,从深化市场准入便利化改革做起,不断提升市场主体的获得感。

2. 加大对 2018 年省两办《关于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意见》的宣传、普及和细化实施力度,明确列出政商交往负面清单,厘清党政机关及公职人员与企业交往界限

切实推动政商交往亲而有度,清而有为;既督促公职人员认真履职,主动作为,又能放下思想包袱,推动我省政商关系良性互动,做到政商之间团结协作,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3. 依托省工商联建立民营经济维权服务中心,搭建直接有效维权平台

工商联维权中心可以借助专业力量,依托组织优势,聚合全国全省服务资源,一方面加强政企沟通,定期召开企业座谈会、政银企对接会等,听取民营企业意见和建议,动态解决营商环境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另一方面直接负责受理、协调全省民营企业法律维权业务,这有利于进一步畅通民企诉求反映渠道、及时化解政企矛盾、依法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4. 推进政银企有效对接,精准滴灌实体经济,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世界性难题,广大民营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经营风险高,财务信息不健全,普遍缺乏抵押物,尤其是企业刚起步阶段资金压力大,这些现实情况不符合商业银行集约化经营和有效风控管理的要求,被认为是导致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的主要原因,市场主体普遍认为目前融资政策是“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因此,有效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必然要从节约成本和降低

风险两端入手。从成本端,要精准发现企业的融资需求,通过“多对一”方式,实现最大范围内的银企对接,提升企业融资可得性。从风险端,要通过大数据分析和风险算法改进,引导商业银行重实质轻形式,更多依靠第一还款来源来管控企业融资风险。

5.推进涉政府产权纠纷问题专项治理,尽快清理政府和国有企业拖欠民企、中小企业账款,提升诚信政府建设力度

一是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对剩余的无分歧欠款逐项制定清偿计划,新发现的瞒报、漏报等欠款纳入台账一并办理。省级政府对无法完成清欠任务的市县要统筹制定解决方案,大型国有企业要对下辖企业统筹采取措施,确保完成清欠任务。二是建立清欠与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协调联动机制,清欠资金优先清偿拖欠的农民工工资,以后各类项目建设都要留足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的资金并按合同及时发放,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拖欠农民工工资。三是对零清偿、进度慢的要通报和处罚,对瞒报漏报、恶意拖欠等要加大查处问责力度。对未完成清欠的部门,要在压减一般性支出、降低公务出行标准、严控津补贴等方面采取限制措施。四是督促国有企业强化及时还款约束,将应付账款控制和清欠纳入考核。五是出台及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相关法规。

6.尽力降低市场主体经营成本,让企业轻装上阵,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

目前市场主体反映的经营成本高,除融资成本和物流成本高之外,最大的问题就是用电成本高、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高。一是电价问题。我省电力由于支持了高耗能企业和小部分农业灌溉等,加上总体用电规模偏低,导致大工业用电平均电价高于青海、新疆、宁夏、蒙西等周边地区。建议一方面打破省际壁垒,利用我省风光资源富集优势,增加外送规模,

在全国范围内消纳,增大我省电力生产规模;另一方面进一步推行新能源电力配额制,增大新能源消纳,提升规模效益。二是土地使用税。我省的城镇土地使用税相较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盈利能力而言偏高,譬如酒泉、嘉峪关、张掖等小城市,按照国家城镇土地使用税定额税率规定范围应在0.9-18元之间,而我省实际征税是在4-10元之间,有较大的减压空间,建议省上充分考虑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稳健起步和健康发展需要,进一步降低城镇土地使用税,为企业减负,扶企业轻装上阵。

7.制定具体措施,“稳外贸、保主体”打出“出口转内销”组合拳

近几年来,我省市场主体数量大幅增长,短期内的倍增必然导致市场主体竞争激烈、招工难、税负重,这既是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所取得的成绩,也对营商环境改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是继续深入优化营商环境的方向。“稳外贸、保主体”打出“出口转内销”组合拳,在加快转内销市场准入、促进“同线同标同质”发展、加强知识产权保障、搭建转内销平台、发挥有效投资带动作用、精准对接消费需求、提升转内销便利化水平、做好融资服务和支持、加大保险支持力度、加强资金支持等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根据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的实施意见》,结合我省实际情况确保新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更加精准、有力,全力稳企业、稳就业,帮扶外贸企业渡过难关,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利用财政政策支持企业参加线上展会、入住电商平台等转内销活动;通过电商+直播+商超+展会的模式,帮助外贸企业畅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对冲外需下滑影响;组织内外贸企业对接会、线下特卖展销、线上展会以及开展线上直播等。

责任编辑:马霞

视角与路径: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文献综述

任文启 姚平

【摘要】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有相当强的契合度与可及性,也面临制度、文化等方面的现实困境和发展瓶颈。本文系统梳理了近五年来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相关研究,以期进一步发挥社会工作在精准扶贫中的专业优势,为脱贫攻坚收官以后社会工作助推乡村振兴和农村治理,探索巩固精准扶贫的成果和健全社会工作机制,不断深入推进社会工作理念方法的中国化、时代化和本土化,提供可借鉴之处。

【关键词】社会工作 介入 精准扶贫 对策

党中央要求举全党全国全社会之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社会工作融入和助推精准扶贫自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精准扶贫的关键在于精准识别、精准扶持和精准考核,而以助人自助为宗旨的社会工作因其特有的理念、路径和模式,在许多方面都与精准扶贫有着良好的互动性和高度的契合性,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将梳理近年来社会工作助力精准扶贫的相关研究并以现有研究成果为基础,立足于社会工作与精准扶贫的互动融合发展现状,为社会工作全面有效介入并助力精准扶贫提供启示与借鉴。以“社会工作”和“精准扶贫”为主题和关键词,从中国知网(CNKI)进行综合搜索得276篇文献,考虑论文刊发平台的权威性、专业性以及作者的影响力,兼顾论文引用等相关因素、指标筛选得26篇。结合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重要方面和重大问题,对以上文献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归类以便进一步审视和研究,其中涉及社会工作和精准扶贫定位与关系方面4篇,契合与可及方面5篇,路径与视角方面9篇,问题及对策方面5篇,另外还有类比综述1篇,4篇文献跨两个及两个以上方面的研究。从文献发表可见时间看近三年研究逐步密集聚焦,2015年研究文献1篇,2016年研究文献8篇,2017年研究文献5篇;2018年以来研究文献10篇,几乎接近前几年研究成果总量,占前述

搜索可见重要文献的38.5%,说明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渐成近来学术热点,相关研究正在引起学界、业界和决策管理层普遍关注。

一、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理论场景

精准扶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提出的,是深入推进脱贫攻坚国家战略的重要方略,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社会工作则是以利他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的方法进行的助人活动,故从本质而言社会工作可以作为公共服务减贫扶贫方法,介入精准扶贫政策并助力推动精准扶贫发展。

从社会建设、社会进步与社会发展等社会治理的维度来看,精准扶贫与社会工作都是同向促进社会治理科学化不断提升,是对社会不均衡不充分发展的矫治以及对贫困等弱势群体的救济,精准扶贫在我国当下的治理模式中由党委政府主导统筹,主要着力解决贫困现象和贫困群体的生存发展等问题,社会工作则是由社会组织特别是非政府组织(NGO)作为主体,是对政府治理社会并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补充,包括但不限于对贫困问题的积极治理和根本解决。“审名以定位,明分以辨类”(语出《韩非子·扬权》)。社会工作和精准扶贫各自的功能角色定位,决定了其在社会治理与发展中承担的不同职

作者简介:任文启,男,甘肃政法大学教授,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哲学博士。

姚平,男,甘肃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工作专业学生。

责和相互关系,由此奠定社会工作介入并助力精准扶贫的理论基础。

(一) 价值同向

高飞、向德平在《专业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的可能性与可及性》中指出,精准扶贫和社会工作的契合性表现在二者都高度关注个体疾苦,以及自觉追求社会公正与积极推崇科学方法,从这三个层面能够充分肯定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的可能性。^[1]侯利文也认为,社会工作与精准扶贫之间存在价值亲和,社会工作可以为精准扶贫提供价值理念上的建构;社会工作介入扶贫攻坚可以起到技术靶向的作用,具有方法和角色上的极大优势;社会工作的学术传统与实务进路,积淀了精准扶贫现实推进中的可能线索以及发展空间;基于上述理由可见,社会工作应当也可以成为精准扶贫的重要建构性力量。^[2]

(二) 方法可鉴

顾东辉认为,社会工作实务的各方面要素特点,社会工作实务的需求评估、方案制定、计划推行和评估总结的阶段技术,均可以成为精准扶贫达到理想效果的重要参照。^[3]岳天明、李林芳则提出,民族村寨精准扶贫与社会工作在价值理念、工作目标、工作内容、工作过程和社会功能等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民族村寨精准扶贫需要从价值原则、工作方法和评估机制等方面全方位借鉴社会工作。^[4]

(三) 理念契合

王瑜、汪三贵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减贫这一理论概念,对于理解中国已有的减贫成就具有解释意义,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具有内洽性,有助于全面理解现行扶贫框架的福利内涵,对确立脱贫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具有导向作用。^[5]刘春怡指出,农村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时,社会工作者需要链接资源、搭建平台,利用“助人自助”的核心理念,积极促进受助对象自助互助。^[6]

二、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认识视角

经过党和国家持之以恒的强力推动和全国人民的不懈努力,我国在消除贫困的艰苦卓绝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精准扶贫是打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后一公里”的攻坚战。社会工作介入并助力精准扶贫的契合与可及研究,是重估、建构和提升社会工作价值的重要依据。在基于认识论的价值建构中比较有价值的观点是“嵌入论”,也就是说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既要适度嵌入也要及时脱嵌。可及性研究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取向,但有这一方面的文献

不多且仅作为有价值的取向存在,尚未完全深入实务操作层面,理论上也缺少系统梳理提升建构。

(一) 一体化审视

王思斌在《精准扶贫的社会工作参与——兼论实践型精准扶贫》中提出,精准扶贫与社会工作在价值观层面、扶贫力量与扶贫对象的关系层面,以及工作方法层面和对服务对象问题的重视方面具有很高的契合性和一致性。同时他还提出精准扶贫与社会工作具有不同的侧重点,这一研究路向为我们提供了把握二者关系的认识论,也有利于全方位审视社会工作对于精准扶贫的作用、贡献和价值。^[7]王守颂在《社会工作与精准扶贫的耦合性研究》中总结出,社会工作在价值理念、理论思想及实务方法上对于贫困农村的脱贫攻坚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与精准扶贫具有很强的耦合性。^[8]

(二) 全方位覆盖

李迎生、徐向文在《社会工作助力精准扶贫:功能定位与实践探索》中提出,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时可在协调利益关系、化解主体矛盾、收集各方信息、搭建服务平台、践行政策法规、倡导政策革新、激发基层活力和增进社会团结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9]。这一论述的提出明确了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覆盖范围。

(三) 系统性嵌入

刘志燕、西爱琴认为,我们可以将精准扶贫的主体、服务、资源等不断“嵌入”社会工作,同时让社会工作的语境、理念、方法与精准扶贫相互融合,从而有效促进社会工作与精准扶贫的良性互动。^[10]林顺利、孟亚男也认为,以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为线索,本土社会工作实践可以被看作一个顶层、中层和情境多重嵌入的过程,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困境在于形式上的嵌入和实践的脱嵌。他们提出要在地方工作中为社会工作嵌入留下接口,积极营造和改善社会工作在基层的工作情境并强化社会工作的行业能力建设,促进社会工作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系统高效嵌入,有效激发社会工作助推脱贫攻坚的潜能与动力。^[11]

三、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路径选择

社会工作介入和助力精准扶贫研究与其说是一个理论问题,倒不如说是理论联系实践指导实践的实务问题,所有的思想观点必须来源于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契合与可及研究论证了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可能性,那么通过路径与视角研究需要探

析的则是可行性,要从实践层面为社会工作介入和助力精准扶贫提供方法论支持。

思维模式的转变是社会工作助力精准扶贫的前提,与一般社会工作侧重社群运行机理和社会力量介入不同,社会工作助力精准扶贫必须对国家政策有系统了解和精准对接,以激发培育内生动力为主要路径的内源发展思路,就是对政府依赖型精准扶贫主体对象的“再社会化”。不同理念、理论和思维模式无疑会拓展新的思路,为社会工作介入和助力提供新的路径参考。

(一) 内生动力

钱宁、卜文虎认为,农村社会工作应当运用内源发展理念参与精准扶贫,培育农村贫困社区及贫困者脱贫过程中的内源发展策略与方法,克服当前扶贫工作中过度行政化带来的贫困者依赖政府被动脱贫的不良倾向,发展以主体性培育、能力建设、组织建设和文化建设为内容的农村反贫困社会工作。^[12]

(二) 赋权增能

阿马蒂亚·森的赋权增能理论让社会工作助力精准扶贫有了多元选择,程萍在此理论上设想社会介入农村精准扶贫的四条路径,一是从“外力推动”渐变至“内力推动”;二是以精准识别主体需求为起点定制增权计划;三是从文化教育服务出发去提升贫困农民综合素养;四是充分发挥自治经济组织作用。^[13]

(三) 共享参与

脱贫形势和扶贫任务的变化必然要求路径策略调整,也呼唤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主体力量民间组织的转型。高飞认为,反贫困实践与民间组织的阶段性特征紧密联系,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共享式扶贫,与此相应民间组织从“野蛮生长”转型为规范治理,从物质层面的关注、救济转型为能力层面的赋权、发展,从政府依赖转型为合作互补,以此适应反贫困新时期精准扶贫的要求。^[14]

(四) 人文关怀

把精准扶贫和农村社区建设结合起来加以考量,在十九大以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这也与前述激发内生动力、内源式发展思路不谋而合,但是特别关照贫困地区农村留守妇女的赋权增能,则是社会工作助力精准扶贫另辟蹊径却又切合实际的明智之举。岳天明和俞博文的项目实践明确了突出农民主体地位是农村社区建设的关键,留守妇女是农村社区建设中不可小觑的一支

重要力量,对贫困农村社区妇女的赋权增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15]

四、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对策建议

从社会建设与发展的角度全面审视精准扶贫的过程及其效果,或者说按照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思路来观照精准扶贫,对于及时检视精准扶贫存在的薄弱环节和不足之处,推动精准扶贫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来说可谓善莫大焉,因为每一位精准扶贫的对象精准脱贫后都要回归社会,作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食其力的社会成员和社会建设者。

(一) 正视问题与短板

一些长期关注中国社会现实、具有系统思维和战略眼光的学者,虽然对于当前精准扶贫取得的重大进展和成效表示赞赏,但是他们对硬件和民生改善能否带动农村社会建设保持警醒。王思斌在《农村反贫困的制度—能力整合模式刍议——兼论社会工作的参与作用》中提出,在传统的农村扶贫开发中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如粗放选择贫困地区,产生了宏观政治上的“公平”和微观实践上的不公平问题;曾被一度看好的扶贫开发政策涓滴效应^①在实施中出现偏离,扶富不扶贫的现象突出;一村一品策略在国内外市场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政绩主义影响一些地方的扶贫效果表面化,扶贫者仅关注于扶贫目标而不是区域总体脱贫状况,扶贫效果难以持续;贫困人口缺乏足够的摆脱贫困的内在能力,他们更多的是靠外出务工解决经济上的贫困问题,但这又衍生出复杂的留守问题。^[16]左停、杨雨鑫、钟玲也认为,精准扶贫机制的推出在技术层面的靶向,是此前扶贫开发工作中存在的瞄准目标偏离和精英捕获问题;在当前的现实中,精准扶贫还面临着规模控制所引起的规模排斥、乡村内平均主义思想、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市场化背景下的扶贫开发有效手段不足、村庄间贫困户实际识别标准差异等挑战。^[17]

国家战略和政府行为在广大农村落地执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即使顶层设计与制度安排的科学化水平的确毋庸置疑,也会因为地域差异、文化差异和团队差异而导致情况迥然不同。许汉泽、李小云发现在扶贫过程中容易出现“精英捕获^②”与“弱者吸纳^③”;进行阶段容易出现“政策性负担”以及规模化经营不善等问题;项目完成则易面临着后续维护的缺失与农民生计系统的损害。产业扶贫背后隐藏着扶贫济困的社会道德逻辑与产业发展的市场化逻辑的矛盾,前者决定了产业扶贫是以项目为载体,后者则容易导

致规模化的经营方式,两种逻辑之间的张力与冲突增加了产业扶贫项目失败的风险。^[18]岳天明、俞博文的项目实践指出:大多数农民仍未摆脱“靠天吃饭”的意识,且日常生活单调基本没有娱乐活动,社区组织建设存在多重问题并与脱贫思维相悖,不利于相关政策有效落实且有滋生惰性的隐患。^[19]李迎生、徐向文认为政府单一支配的扶贫模式本身存在诸多问题,地方政府在扶贫开发中也存在先天性缺陷。^[20]

为了切实有效破解上述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不同类型的问题,许多学者从理论与实务多重角度出谋划策,竭诚尽智,以期能够不断巩固、深化、保持和扩大精准扶贫的效果。

(二)改进服务与管理

李迎生、郭燕指出针对我国当前贫困“存量”与“增量”的严峻形势,以及行政动员式反贫困存在的各种先天性不足,社会工作等专业力量、社会力量介入反贫困实践十分必要与迫切。从政府的角度出发,政府可以在完善顶层设计、建立机构平台、推进多元合作、健全资金保障等方面加强社会工作助力精准扶贫的配套建设。^[21]敖琪提出,应该从优化就业政策、开发就业岗位、摸清贫困人数、强化职业技能培训、精确配置扶贫资源、深入基层给予贫困对象情感支持、加强村级管理等方面入手。^[22]

在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具体操作和运行层面也有良策,除了前述发挥贫困地区农村留守妇女作用的建议,对老年群体特别是贫困老人生存状态的关怀显示了人性光芒。王三秀、芮冀在《社会工作介入农村老年精准脱贫的困境与出路——基于Z县Y村的调查》中指出,社会工作的方法与过程与农村老年精准脱贫的目标相契合,专业社会工作服务介入农村老年精准脱贫不仅能提供专业高效的脱贫服务,缓解政府工作人员的压力,还能为传统脱贫模式提供新思路、新方法。^[23]岳天明和俞博文的项目实践也明确指出了留守妇女是农村社区建设中不可小觑的一支重要力量,对贫困农村社区妇女的赋权增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四)注重融合与提升

从农村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长远目标考虑,产业扶贫是精准扶贫决战决胜的必由之路和制胜法宝,相应的这也是值得拓展的助力方向之一。宁静、殷浩栋、汪三贵、刘明月在《产业扶贫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及效果——基于乌蒙山和六盘山片区产业扶贫试点项目的准实验研究》中提出,要让贫困

户更多地参与到农业产业链中,同时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并拓宽贫困户增收渠道,培育经营主体和农村的精英人才,增强农户的组织化程度以使其尽快脱贫致富。^[24]

有一些研究试图把社会工作的基本理念和具体方法,引入精准扶贫的相关方面、重要环节和关键流程。袁小平、姜春燕认为,第三方评估作为一种有效的评估模式,在扶贫开发工作绩效考核、贫困县退出评估检查、扶贫成效评估以及其他专项考核评估工作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评估工作仍存在一系列盲点和难点。社会工作秉持“助人自助”理念,以弱势群体为服务对象,坚持价值中立、保密等原则,可在扶贫对象的认定和扶贫成效的评估等方面,探索引进或者借鉴采纳社会工作通行的 CIPP 评估模式,确保精准扶贫评价体系的客观性、公正性和准确性。^[25]

综上所述,社会工作介入和助力精准扶贫的研究目前发展态势良好,主要表现为社会工作专家学者对精准扶贫高度关注,希望在这一重大国家战略和政治任务中有所作为,从社会工作的学科视野审视精准扶贫不断升温,这一学术热点集中聚焦在对精准扶贫的政治图解和诠释。胡志平认为,学界在内涵界定、理论与实际价值、“多维”困境及贫困类型刻画和多维配套路径等方面对精准扶贫研究,取得了较为扎实的研究成果,有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扶贫理论中国化进程,丰富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内容;理论界、学术界对精准扶贫的内涵、理论与实践价值、实践的“多维”困境及贫困类型划分和实践路径等方面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形成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精准扶贫提供了重要参考与借鉴价值。^[26]由于精准扶贫本身具有较强的实践特征,学界对精准扶贫的关注更多在于实践性总结方面,更多关注了精准扶贫的运作逻辑,也更加凸显了案例研究方法的运用。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社会工作介入和助力精准扶贫的研究还不全面,一些文献的学术性、专业性不强而且指导性、操作性较弱,总体来说理论研究还不深入、不透彻、不系统,实务研究还不广泛、不全面、不扎实,二者之间的交叉、互动和融合研究跨学科支持力度不够,社会工作在精准扶贫进程中的存在感、获得感不强。由于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弱嵌入性”特征,社会工作深度参与精准扶贫的实务实践仍然非常缺乏,研究成果大多停留在宏观和中观的体制机制论证,研究大多以“应然性”的理论探讨为主,从

微观视角观察和分析精准扶贫工作具体实践运作的“实然性”成果缺乏,特别是讨论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的个案参与式研究欠缺,使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研究本身的“精准性”受到影响。精准扶贫的理论性总结方面的相对缺失,较少研究精准扶贫的制度逻辑,忽视实证模型的建构与运用,这可以作为今后研究着力探索与发展的方向。

参考文献

- [1]高飞、向德平.专业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的可能性与可及性[J].社会工作,2016(3):17-24.
- [2]侯利文.社会工作与精准扶贫:理念牵引、技术靶向与现实进路[J].学术论坛,2016(11):105-110.
- [3]顾东辉.精准扶贫内涵与实务:社会工作视角的初步解读[J].社会工作,2016(3):3-14.
- [4]岳天明、李林芳.民族村寨精准扶贫的社会工作借鉴——以甘肃文县T乡为例[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6):103-109.
- [5]王瑜、汪三贵.基本公共服务减贫:理论概念、现实关切与评估建议[J].贵州社会科学,2018(9):164-168.
- [6]刘春怡.论农村社会工作与精准扶贫之融合[J].长白学刊,2017(3):134-138.
- [7]王思斌.精准扶贫的社会工作参与——兼论实践型精准扶贫[J].社会工作,2016(3):3-9.
- [8]王守颂.社会工作与精准扶贫的耦合性研究[J].前沿,2016(12):52-56.
- [9][20]李迎生、徐向文.社会工作助力精准扶贫:功能定位与实践探索[J].学海,2016(18):114-123.
- [10]刘志燕、西爱琴.社会工作与精准扶贫的协调联动[J].人民论坛,2018(26):68-69.
- [11]林顺利、孟亚男.嵌入与脱嵌: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的理论与实践[J].甘肃社会科学,2018(3):9-15.
- [12]钱宁、卜文虎.以内源发展的社会政策思维助力“精准扶贫”——兼论农村社会工作的策略与方法[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3):123-129.
- [13]程萍.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精准扶贫:阿马蒂亚·森的赋权增能视角[J].社会工作,2016(5):15-23.
- [14]高飞.精准扶贫与民间组织转型:基于政治-过程的二维分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5):133-137.
- [15][19]岳天明、俞博文.社会工作介入贫困农村社区建设研究——以“D村社区发展与健康教育”项目为例[J].社会建设,2018(4):59-68.
- [16]王思斌.农村反贫困的制度——能力整合模式刍议——兼论社会工作的参与作用[J].江苏社会科学,2016(3):48-54.
- [17]左停、杨雨鑫、钟玲.精准扶贫:技术靶向、理论解析和现实挑战[J].贵州社会科学,2015(8).
- [18]许汉泽、李小云.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产业扶贫的实践困境——对华北李村产业扶贫项目的考察[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9-16.
- [21]李迎生、郭燕.推动社会工作精准介入反贫困实践[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5):92-103.
- [22]敖琪.社会工作如何在精准扶贫中发挥作用[J].法制与社会,2016(4):180-181.
- [23]王三秀、芮冀.社会工作介入农村老年精准脱贫的困境与出路——基于Z县Y村的调查[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1-18.
- [24]宁静、殷浩栋、汪三贵、刘明月.产业扶贫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及效果——基于乌蒙山和六盘山片区产业扶贫试点项目的准实验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9(4):58-66.
- [25]袁小平、姜春燕.社会工作在精准扶贫中的应用研究——基于CIPP评估模式[J].《社会建设》,2018(6):56-66.
- [26]胡志平.精准扶贫:文献综述及研究展望[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9(3).

注释:

- ①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给予贫困阶层、弱势群体或贫困地区特别的优待,而是由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通过消费、就业等方面惠及贫困阶层或地区,带动其发展和富裕,或认为政府财政津贴可经过大企业再陆续流入小企业和消费者之手,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即先富带后富理论。
- ②条件相对比较好的“精英村庄”容易获得更多的扶贫项目和资源,而条件比较差又没有政治资源的贫困村容易被忽略,偏离了精准识别的政策要求,也拉大了贫富差距。
- ③出于“责任连带”的顾虑,很多有实力的企业、公司不会申请扶贫类资源项目,反而被条件比较差的企业和公司所“吸纳”难以发挥带头作用,也背离了涓滴效应。

责任编辑:马霞

社会治理视域下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彭丽丽

【摘要】社会心理服务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系统推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首先要厘清其内涵,其次要深刻认知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对社会治理的推动作用,再次要找准当前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面临的困境。

【关键词】社会治理 心理服务体系 建设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变历程,与改革开放同行。在改革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社会治理的本质认识在不断地深化和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为新时代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方法提供了新的思维和角度。同时,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提出了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将“心理健康服务”上升到了国家战略,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发展

我国的心理学发展虽然晚于西方,但“心理建设”提出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1916年袁世凯死后,孙中山多次发表演讲和谈话:“民国建立5年,虚有其名而无其实,其关键是‘人心’,国民缺乏民主共和的民主意识。”护法运动失败之后,孙中山对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敏锐地意识到,只有切实提高革命党人和民众的思想认识,才能坚定信念,凝聚全体国民的力量实现民主共和。孙中山开始著书立作,将“心理建设”列为《建国方略》内容的首位,“心理建设”和“物质建设”二者相辅相成,是孙中山建国理念的核心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进步,各类心理问题日益突出,已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但是,社会心理服务工作仅仅零散地建于学校的教科书中,并没有进入公众的视野,社会心理服务研究也并没有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关于心理学的权威期刊《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等仅零散地介绍了苏联和

英国的心理服务工作,国内学界并没有对我国的心理服务展开研究。

进入新世纪,在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社会心理服务工作也在不断地发展和进步,心理服务领域逐步扩展。社会心理服务工作从学校拓展到医院、企业、监狱等,心理服务逐渐进入公众视野,相关学者们也开始就心理服务这一主题开展一定程度的研究。经历了2003年的SARS、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之后,政府和心理学研究者们开始关注危机事件中的社会心理问题,包括公共卫生事件、突发灾难事件中的民众社会心态、突发事件的社会心理预警系统建设等问题。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心理学为提升国民素质,加强和谐社会建设服务的宗旨已经凸显出来。2013年5月1日我国颁布实施了《精神卫生法》,第一次从法律层面对心理健康教育做了明确规定。随后,心理健康教育不再局限于学校,开始向全社会普及,心理辅导工作制度逐渐在全社会普及和确立,社会和家庭越来越重视心理辅导工作。当然,心理健康教育还不同于社会心理服务,只是心理健康服务的良好开端,从心理健康教育走向社会心理服务是心理学发展的趋势,也是心理健康发展的趋势,这种发展趋势顺应了心理学精细化发展的态势,顺应了社会治理的发展态势。

作者简介:彭丽丽,女,中共重庆市涪陵区委党校讲师。

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疏导机制、危机干预机制”的决策部署,并由中央综治办在全国选取了12个市、县(区)作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联系点。2016年,国家卫计委等22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卫疾控发〔2016〕77号),这是我国第一个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宏观政策指导性文件,各试点单位的卫生部门按照文件的要求,以预防为主,以人为本;党政领导,共同参与;立足国情,循序渐进;分类指导,规范发展的原则加快实施。组织开展心理卫生知识进机关、企事业单位、社区等活动,普及心理卫生知识,适时地把心理卫生工作和心理健康工作列入全民保健工作的主要内容,将心理健康内容纳入健康体检。

2019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将矛盾化解在基层。”^[1]“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事关社会稳定,是党和国家开展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1月,新冠疫情在全国各地蔓延,严重危害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疫情防控工作不仅仅是政府行为,也是心理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心理学界人士和组织积极行动,在第一时间联合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网络心理服务指南》,通过心理热线、科普教育等多种方式为民众提供心理服务。

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内涵及其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一)相关概念辨析

党的十九大之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经常出现在党和政府的报告中,但学界并没有对其概念完全达成共识,有必要对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相关概念予以界定。

1. 心理健康服务

心理健康服务是以心理健康教育、社会心理学等心理学基本理论和原理为主要依据,运用心理健康的基本方法和技能,对社会成员开展心理健康教育,预防和解决社会成员各种心理健康问题的专业活动。

2. 社会心理服务

社会心理服务对象广泛,包含了全体社会成员,

既包括需要接受心理服务的儿童、青少年,也包括需要心理关爱的孤寡老人;既包含了正常人群,也包括了特殊人群,如服刑人员等。

3.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社会心理服务是针对全社会面临的普遍性社会心理问题而提供的综合式心理健康服务。社会心理服务不仅包含了心理健康服务,也包含了维护社会稳定,创新社会治理的功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包涵了三个层次的目标,宏观层面是实现创新社会治理,解决宏观层面的心理建设问题;中观层面主要是培育积极健康、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对社会各个行业和领域进行心理培育和塑造;微观层面是对社会成员进行心理辅导、心理咨询等活动,帮助其解决心理健康问题。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有着明确的目标导向,即培育国民良好的社会心态,为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帮助,为促进社会和谐发挥作用。

社会心理服务的方式方法多样化。服务方式既可以为采用线上服务,也可以采取线下服务;既可以进行网络化服务,也可以采取现实面对面服务;服务方法主要包括“心理疏导、心理治疗、心理引导、心理防控和心理教育”^[2]。

4.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社会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在本质上是如何合力做好矛盾的调处化解和社会心理服务工作,最大限度做到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全覆盖、无死角。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一个立足于中国实践的系统工程,是与我国具体体制机制相结合涵盖到组织、个人、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各个层级和层面的完整的心理服务体系,“既包括了突发事件后对社会成员的心理危机干预和长期的心理援助,也包括常态生活中对个体的心理咨询、对普通人群的心理健康教育 and 知识普及,以及更宏观层面的社会心理疏导和社会心态塑造”^[3]。

(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对社会治理的作用

1.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新时代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

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来看,是为了更好地缓解社会矛盾,更好地推动社会和谐,改善人际关系,培育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社会心态与社会治理之间紧密联系的耦合关系,决定了良好社会心态能够为社会治理提供精神文化基础。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就是引导社会公众

客观理性对待和分析社会现象,形成“从心”的柔性社会治理新模式,这是对传统意义上刚性治理的有益补充。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能够为社会治理提供‘软件支持’,“能为社会治理体系中刚性的法律和制度提供有温度、柔性化的‘软件’支撑。”^[4]

2. 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新时代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需要

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既要满足人民群众在物质方便的获得感,也要满足其在精神文化需要方面的获得感。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要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在开展疫情防控工作过程中要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为了解决人们在新的时代里可能产生的心理问题,包括心理疾病、情绪上的障碍,也包括一些突发事件造成的震荡和不稳定,有很多工作要做,有必要从民众的心理感受出发,有效提升民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3. 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新时代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

针对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出现的治理失灵,有必要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嵌入社会治理过程的方方面面。一些地方政府在基层社会矛盾化解方面,积极引入了心理疏导干预、心理咨询服务等措施,初步探索建立了基层社会矛盾化解+社会心理服务的治理新模式。作为心理服务的高级阶段,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及其建设覆盖面涉及到了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覆盖的群体也涉及到了社会全体成员,能够与当前社会政策制定实现良好结合和互补,“它基于社会治理视角,将心理学等若干学科融入到了社会建设中,更加注重民众心理建设的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和依法治理,这四个治理理念始终贯穿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进程中”^[5]。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进程也是不断健全和发展社会治理的过程,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社会治理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社会治理视域下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面临的问题及路径探析

(一)社会治理视域下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面临的问题

我国最早开展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从2016年开始的。杭州拱墅区、北京丰台区等12个示

范联系点作为最早的试点单位,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要求,坚持“党政领导,综治牵头,卫计为主,部门协同,社会参与”,坚持以人为本,积极探索实践,全面开展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疏导机制、危机干预机制建设,培育形成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努力建成与当地社会发展和功能定位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全面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经过几年的实践探索,试点单位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整体而言,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仍然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和难题。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思想认识不到位。作为一个新生概念,民众对社会心理服务认识不到位,将社会心理服务简单地理解为解决社会成员的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社会心理服务”对普通民众而言是一个新生概念,很多人对“社会心理服务”、“心理疾病”“精神疾病”等概念没有辨别清楚,甚至将心理服务等同于心理疾病,这就影响到了心理知识的普及和宣传。

第二,人才匮乏。有学者指出,专业人员太少,江湖郎中“抢生意”损坏了心理服务职业的声望,是社会心理服务人才短缺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目前拥有专业精神科医师33400人,心理治疗师约为6000人,能够提供专业服务的心理咨询师不到30000人。”^[6]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每1000人拥有一个心理咨询师是社会健康的平衡点,这样算来,我国的心理咨询师缺口超过了130万人。

第三,系统化建设不够。由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还处在试点阶段,各个地区建设的进度不一,各个部门之间的衔接力度不够,这就导致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还没有在基层形成一个网络化的服务平台。

(二)社会治理视域下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
路径探析

1. 加大心理健康知识普及力度

以社区为单位,加大对基层群众心理健康知识的宣传。通过专家讲座、培训会、印发宣传册等多种方式宣传心理知识,让群众了解心理学、走进心理学,消除或者降低群众对心理疾病的“病耻感”;在中小学开展心理文化课程,将心理学基础知识纳入到国民教育必修课程。此次新冠疫情也告诉我们,要“通过多种途径普及危机下的正常心理反应及应对措施,帮助群众对危机下的心理变化有正确的认知”^[7]。

2. 建立健全社会心理服务网络

第一,建立和普及社区家庭医生制度。上海在建立和普及社区家庭医生制度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目前上海的家庭医生制度基本上已100%社区全覆盖,要充分利用这一资源优势,开展社会心理服务工作,社区家庭医生应该对所联系社区内有心理问题的患者做到心中有数,建立资料,重点关照,及时措施。各级卫生部门制定规划,定期教育培训家庭医生掌握心理服务的专业知识,充分发挥这支基层医生队伍在培养“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社会心态方面的重要作用。

第二,建立健全经费保障制度。鼓励有条件的社区建立社会心理服务场所。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建立以财政投入为主、留存党费和项目整合为辅的经费投入保障机制,积极引导和鼓励驻区单位、企业、社会组织以及个人等社会力量捐赠资助,探索壮大发展模式,增强社会心理服务经费“造血”能力,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心理服务财政支持体系。

第三,立足于基层,搭建服务平台。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要形成一个系统,必然要面向基层搭建平台和载体,从而形成一个系统化的服务网络。一是借助社区的力量,将心理健康服务纳入社区服务的重要内容,为重点关注的群体建立心理档案,为他们提供专业化、个性化的心理服务;二是借助医疗服务机构的力量,为基层群众提供具有服务资质的心理门诊,逐步提高心理门诊的普及率和使用率,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心理服务。有条件的医院还可以设立专门的心理科或心理咨询室,配备专职心理医师提供心理卫生服务,满足人们对心理健康的需求。

第四,积极推动网格化社会心理服务。综合考虑社区地域分布、驻社区单位、企业、行业组织数量等因素,优化网格设置和布局,调整扩大网格辐射范围,着力构建科学合理的网格组织体系。运用大数据和信息化系统对辖区居民的社会情绪及时研判,将行为失常的人员纳入重点关注对象,及时对其开展心理疏导,将易出现的社会问题消灭在萌芽中。

3.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社会心理服务除了要提供技术支撑外,人才队伍建设关系着学科的长期发展,是一项事关成效的保障工作。

第一,加大专业性人才培养力度。根据不同人群

的心理需求和心理健康状况,建立个性化与专业化相结合的心理服务人员培训体系和学历教育;加大高校心理学科建设力度,丰富心理学科设置,不断丰富学科内容。

第二,加强对专业人才的激励力度。畅通社会心理服务人员职称评审制度,对急需的专业人才在职称评审和职务晋升方面予以优先考虑。

第三,不断壮大人才队伍。加强社区志愿者队伍建设。社会心理服务的专业人才缺口很大,急需志愿者和更多的兼职人员参与其中。要实现专业服务和志愿服务人员的良性互补,实现无缝隙对接;专业心理工作者要加大对兼职人员和志愿者的指导力度,使其不断提升专业能力和素质;志愿者和兼职人员要积极主动学习专业知识,使志愿服务拥有更多的技术含量,从而为社会提供更为优质的心理服务。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29.
- [2] 葛明贵,高函青.中国特色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途径分析【J】.心理科学,2020(1):201.
- [3] 陈雪峰,傅小兰.抗击疫情凸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刻不容缓【J】.中国科学院院刊,2020(3):259.
- [4] 林颖,蒋俊杰.从社会疏导到社会心理服务: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大创新【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9(4):75.
- [5] 周芮,闫洪丰,李康震.我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基本构成探析【J】.残疾人研究,2019(4):36.
- [6] 叶霖.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四种关系【N】.安徽日报,2020-3-3.
- [7] 梁乾琳,张鑫,黄维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心理援助服务的应用探究【J】.健康研究,2020(2):136.

基金项目:2017年度重庆市社科规划重大应用项目“十八大以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及其经验研究”(2017ZDYY45)的阶段性成果;2019年度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校级一般课题“政治心理视角下基层党员干部政治能力提升研究”(CQDX2019B-09)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马霞

民革班学习感言

两千里河西走廊气势恢宏,五千年文明创造光耀华夏!2020年9月14日至18日,20名民革成都市委会党员循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来到甘肃。他们进莫高窟看天女散花,登嘉峪关感中华文明。悟萨班率西藏僧众并入大元高瞻远瞩,敬红军践革命理

想无畏献身气贯长虹!

今天,河西走廊钢花飞溅,良田无垠。工业农业共舞,经济文化齐飞。学员身临其境,时时感动着、感谢着、感悟着、感念着,心情久难平静,更有一位学员在返程的飞机上写下了“走——河西走廊”的诗句。

走——河西走廊

任文海

翻开昨日归来的行囊
寻找学习相处的记忆
笑容在激情在
故事依然在
雁阵惊寒诉说千年
刘伶爱酒尤在当下
白登山战场演绎西路军
文成和亲铺就会盟凉州

飞天了吗
敦煌在问
天上人间都有血泪
大漠孤烟并不荒野

嘉峪关坚守成就了天府成都
长江流黄河奔谱写华夏华章

飞天了吗
飞天了
青春在回答
激情在传播
再回走廊
陇原儿女依然热情
放开一声吼
不管东南风西北风
吹生新时代的季风
期待再走,再走,再走!!!

作者简介:任文海,男,四川省人大代表,四川中海天然气有限公司董事长。甘肃社会主义学院、民革成都市委会“民革成都市中青年党员中华历史文化研修班”学员。

来稿格式规范

我院内刊竭诚欢迎广大读者来稿。为使来稿得到迅速与妥善的处理,敬请作者注意如下要求。

一、来稿应依次包括:主题、作者简介、单位、邮编、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如是基金项目,请注明项目编号。

二、作者简介包括:姓名、性别、职称、职务、单位全称、通讯地址、邮编、电话。

三、参考文献统一格式

1、期刊类:[序号]作者.篇名[J].刊名,出版年份,卷号(期号):起止页码。

例如:[1]王海粟.浅议会计信息披露模式[J].财政研究,2004,21(1):56-58.

2、专著类:[序号]作者.书名[M].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起止页码。

例如:[2]葛家澍 林志军.现代西方财务会计理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42.

3、报纸类:[序号]作者.篇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例如:[6]李大伦.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性[N].光明日报,1998-12-27(3).

4、论文集集中的析出文献:[序号]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A].原文献主要责任者(可选)原文献题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例如:[7]钟文发.非线性规划在可燃毒物配置中的应用[A].赵炜.运筹学的理论与应用——中国运筹学会第五届大会论文集[C].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468.

5、学位论文:[序号]作者.篇名[D].出版地:保存者,出版年份:起始页码。

例如:[11]张筑生.微分半动力系统的不变集[D].北京:北京大学数学系数学研究所,1983:1-7.

6、研究报告:[序号]作者.篇名[R].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份:起始页码。

例如:[12]冯西桥.核反应堆压力管道与压力容器的LBB分析[R].北京: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1997:9-10.

7、条例:[格式][序号]颁布单位.条例名称.发布日期。

例如:[13]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科学技术期刊管理办法[Z].1991-06-05.

8、译著:[序号]原著作者.书名[M].译者名.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起止页码。

例如:[14][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M].燕继荣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20.

9、电子文献:[序号]电子文献作者.篇名[文献类型/载体类型标识].文献出处.日期.其中,[文献类型/载体类型标识]为:[J/OL]网上期刊、[EB/OL]网上电子公告、[M/CD]光盘图书、[DB/OL]网上数据库、[DB/MT]磁带数据库。

例如:[15]学术堂.论文参考文献标准格式要求[EB/OL].

<http://www.lunwenstudy.com/cankaowenxian/130239.html>.2018-03-14.

四、注释

注释是对论文正文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进一步解释或补充说明。注释前面用圈码①、②、③等标识,放在加注处右上角。

《甘肃统战理论研究》编辑部

